



北

京

社

区

历

史

社

区

社区历史

北京拉拉社区 发展口述史 · 壹

社区历史

出品：同语

作者：罗名，大拿等

校对：典典

版次：2011年8月，第一版

2021年12月，第二版

© 本书版权为同语所有。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或抄袭。

关于同语

同语是一个民间公益组织，成立于 2005 年 1 月。“同语”音谐“同女”，亦取“共同语言”之义。同语致力于中国的女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的支持、组织与权益倡导，特别强调在不同的人群中寻找共同语言，搭建沟通渠道和合作平台，以期通过公众教育和社会倡导行动推动公众对同志 (LGBT) 议题的认知，消除针对同志的歧视，为同志争取平等权益。

同语的核心价值：平等，多元，和谐。

2008 年，同语获得荷兰妈妈现金基金会“她改变了世界”奖。

同语邮箱：tongyu.org@gmail.com

同语网站：<http://www.tongyulala.org>

新浪微博：<http://t.sina.com.cn/tongyulala>

微信公众号：[tongyulalazixun](#)

同语于 2009 年 2 月开始策划北京拉拉¹社区发展口述史项目，同年 6 月正式启动，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共采访社区活跃人士 24 人，考察了 9 个民间小组 和活动空间，录音资料超过 50 小时。我们主要关注从 1990 年代中期开始的十余年间北京拉拉社区的发展，试图通过重要的事件、个人与时间点来拼接出北京拉拉社区、组织与运动发展的大致轮廓；同时，结合中国近二十年的时代变迁、社会思潮特别是政治环境的微妙变化，反思社会运动的各个影响因素在北京拉拉社区发展中的实际作用，为目前中国大陆的同志运动和相关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

同语
2010 年 12 月



前言

北京拉拉社区纪事年表

08

北京拉拉社区历史

12

人物索引 (按文中顺序)

14

一 . 1997 年以前

18

二 . 1998 年至 2003 年

26

三 . 2004 年至 2007 年

42

四 . 2008 年之后

76

目录

北京女同（双）性恋社区、组织与运动发展	92
---------------------	----

一．前言	94
------	----

二．女同运动萌芽的政治机会	96
---------------	----

三．北京女同社团的动员结构	98
---------------	----

四．女同组织与女同运动的话语策略	100
------------------	-----

五．结语	101
------	-----

致谢	102
----	-----

北京拉拉社区²

纪事年表

作者：罗名
修订：徐玢

1994-1995 年

苏茜开始在她居住的外交公寓定期举行同志聚会；苏茜和吴春生开始在三里屯的酒吧组织同志聚会；苏茜开始召集每月一次的东西方小组女性主义交流活动。

1995 年 9 月

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一批女同性恋者从世界各地来到北京参加大会的非政府组织论坛。会议期间，吴春生等人在北京莱特曼舞厅举办了一次中外同性恋者的聚会，其后吴春生被捕并被驱逐出北京。

1996 年

李京开始以书信往来和走访的形式建立女同联系网络；

1996 年 9 月

何小培在“一半一半”酒吧主持了国内第一次石墙运动的纪念活动，其后该酒吧成为一家同性恋酒吧。

1997 年

夏天，在香港召开第一届华人同志大会；由苏茜、阿平等发起，一些在北京的中外同性恋者做了一个以 BB 机为载体的同志热线；《刑法》将流氓罪分解，从而告别同性恋行为是“流氓行为”被判刑的时代。

1998 年

台湾有了拉拉的 BBS，国内的拉拉通过这些平台以及国内的流动拉拉聊天室了解有关信息、认识彼此；

1998 年 8 月

香港的吴建雄、周华山联合北京的男女同性恋活跃分子在北京西山大觉寺召开了第一次同志大会；

1998 年 10 月

10 月，由李京、何小培、石头等人策划和组织，在北大南门的潜水艇酒吧召开了一次为期三天的女同志大会；



1998年 11月

11月，李京、石头等人组建了北京姐妹小组，开通了热线，组织讨论会，并制作女同杂志《天空》。

1999年

1999年北京的麻雀开了大陆第一个拉拉网站——“拉拉生活广场”；中国第一家拉拉酒吧——枫吧在北京秀水南街开业。

2000年

2000年李玉执导了中国第一部女同性恋电影——《今年夏天》，由潘怡和石头主演；4月，天涯社区同志论坛“一路同行”建立；

2000年 8月

8月，石头参与凤凰卫视的一点两岸三地谈节目，与香港的鲁豫、台湾的阿哲。在那一期节目谈了很多同性恋话题，成为大陆第一个在电视上出柜的女同志。

2001年

2001年两会期间，社会学家李银河发起提案，呼吁同性婚姻合法化；

2001年 4月

4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将同性恋从精神变态的范围中去除；

2001年 5月

5月，北京女同性恋文化节在被警察叫停。同年，北京姐妹小组解散；

2001年 12月

12月，湖南卫视邀请李银河、崔子恩、石头等人做了一期关于同性恋的节目《实话实说——走进同性恋》，这是同性恋者首次在内地的电视上亮相；

2001年 12月

12月，张江南、杨洋、崔子恩等人在北京大学举办了第一届北京同性恋电影节，电影节未能如期完满举行，中途便被迫停止。

2002年

2002年《今年夏天》获得了威尼斯国际电影节艾尔维拉·娜塔莉奖和德国柏林国际电影节青年论坛的亚洲电影特别奖。

2003年

4月，秀水南街枫吧停业；

8月，枫吧在工体的烟斗吧重新开业。

2004年

9月，闲开始考察北京拉拉的状况，着手筹建拉拉小组；

10月，安可和闲一起筹备北京拉拉沙龙活动；

11月20日下午，第一场拉拉沙龙在枫吧举行，话题为拉拉艺术创作，介绍有关影片和戏剧。随即沙龙网站也建立了；

12月，闲在天涯上发布招募志愿者的帖子，为计划组建的拉拉小组招兵买马；12月，中央电视台播出《央视论坛·同性恋：回避不如正视》。

2005 年

1 月 21 日，同语在准备开业的拉拉酒吧“西厢房”召集成立，会后建立了女同资料库和热线；

3 月，中央电视台播出《新闻会客厅·我了解的中国男同性恋》；

4 月，崔子恩、杨洋等人在北大组织第二届北京同性恋电影节，影片放映了半天之后被叫停，随后转移到 798 进行了后面的放映和交流活动；

5 月，北京拉拉沙龙从枫吧搬到了朝阳区丰联广场的金芭蕉餐厅；

6 月，同语首次组织了全国性的拉拉积极分子交流大会，并邀请香港、台湾等地的资深活动人士参加；

7 月，同语由大学生志愿者组成团队，开展女同性恋者健康调查，于同年 11 月完成调查报告；

7 月，由爱知行主办、同语与爱白合作举办了首届大学生同志夏令营，主题是“如何创造对同性恋友好的校园环境”；

8 月，因金芭蕉餐厅停业，沙龙被迫再迁至丰联广场的乐杰士餐吧。沙龙主题从文化议题逐渐增加生活议题，如职场、美容、北漂等等；

8 月，中央电视台播出《新闻调查·以生命的名义》；

10 月，sam 和 gogo 开始策划办一份拉拉杂志《les+》；

12 月，由崔子恩召集、多家组织合作的北京同性恋文化节被警察阻挠而流产；12 月 24 日，第一期《les+》以大折页的形式诞生，印量 1000 份。

2006 年

3 月，les+ 网站建立，但主页为静态页面，内容有限；

4 月，les+ 召集同志小组参加创意集市活动；

8 月，爱知行、同语和爱白组织了第二届大学生同志夏令营，主题是同志和心理学；

2006 年 11 月

11 月，同语、台湾性别人权协会、香港女同盟会、美国华人性/别研究中心等组织开始筹备第一届拉拉志愿者骨干培训营，简称拉拉营；

12 月，《les+》扩版为小开本。

2007 年

2 月 14 日，北京的男女同志首次走上街头送鲜花发传单，为李银河向两会提交的同性婚姻提案造势；

4 月，les+ 博客建立；

4 月，由小刚主持的《同志亦凡人》视频节目开播；

5 月，白咏冰开始制作《同志沙发》视频节目，11 月停；

7 月，由同语承办的第一届拉拉营在珠海开营；

7 月，何小培、安可和 Eva 发起成立粉色空间性文化发展中心，不久安可退出，凌加入；

9 月，同语主办的“蕾丝杯”女子三对三篮球赛开赛；

9 月，乐杰士餐吧合同到期，沙龙迁到丰联广场南侧的百万庄园餐吧；

11 月，由中国法学会反家暴网络资助、同语主持的“中国女同（双）性恋反家暴”项目正式开始运行。

2008 年

《les+》从免费发行转变为义卖；

1 月，在泰国清迈举行了第三届国际男女同性恋联合会 (ILGA) 亚洲区大会，Eva 作为同语的代表被推举成为 ILGA 亚洲区委员会的委员；

2008 年 2 月 14 日

2 月 14 日，北京同志文化活动中心成立，后更名为北京同志中心；爱知行、同语、爱白和 les+ 等共同组织的“同性婚姻立法倡导月活动”当天在中心启动；

2008 年

3 月 3 日，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发出《广电总局关于重申电影审查标准的通知》，将有关同性恋的电影情节列为应删减修改的内容；

3 月 22 日，由同语发起，中国酷儿独立影像小组在同志中心成立；

4 月，由同语和 les+ 主办的第一届中国拉拉独立影展在北京画楼西畔酒吧开幕。之后影展演变为全国巡回的中国酷儿影像巡展，并由中国酷儿独立影像小组加入主办；

4 月 18 日，由于百万庄园的沟通成本太高，沙龙搬到三元桥 J 吧；

10 月，第二届拉拉营开营，同语担任总协调。这次拉拉营分别在五个城市（北京、上海、成都、昆明和鞍山）同时进行，les+ 承办北京营。拉拉营之后的上海会议催生了华人拉拉联盟；

11 月 26 日 -28 日，《朋友通信》10 周年庆典会议，Eva 作为同语代表介绍反家暴项目；12 月 10 日，世界人权日当天，荷兰大使馆举办了一场中国酷儿影像的放映活动，该活动由同语策划并组织，经荷兰使馆官员瑞米鼎力促成。

2009 年 2 月 14 日

2 月 14 日，北京的同志再次走上街头，在前门大街公开拍摄结婚照。此次活动依然是由同语、爱白、les+、北京同志中心、《点》杂志等联合策划和组织的；

3 月，Eva 和小黑合作成立了无界限小组，专门从事双性恋和跨性别人群的工作；

3 月 6 日，长春日报发文指出新的《长春市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条例》将同性家庭的受害人也纳入到保护范围；

2009 年

4 月，les+ 社交网站正式建立；

4 月，同语 - 拉拉文化资讯网上线，专注于拉拉社区组织和文化建设；

5 月 17 日，北京首次举办 517 国际不再恐同日的活动，同语和爱白组织高校学生志愿者组成自行车队，在北京七所高校宣传反歧视和同志相关议题；

6 月 14 日，在克服了重重阻挠之后，“别·性”中国首届多元性别艺术展在北京宋庄平民电影工作室开展，开幕当天约 500 人到场，于 6 月 21 日闭幕；

7 月，同语拉拉反家暴项目完成，成果包括调查报告、反家暴手册、拉拉社区内的教育和社区外的拓展；

7 月，中国同志首次组成代表团，参加了在哥本哈根举行的世界同性恋运动会 (Out Games)；

8 月，工体枫吧停业；

11 月，沙龙举行五周年纪念活动，并与纪安德合作举办了女同发展论坛；

12 月 12 日，枫吧包场在北京簋街重新开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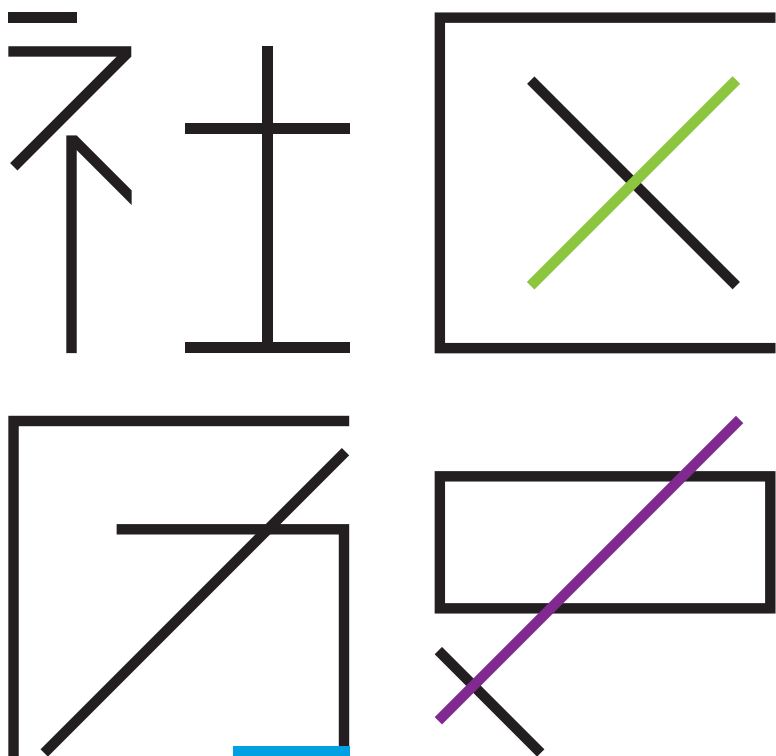
12 月 18 日，伊拉克向联合国大会提交修订案，建议将禁止性倾向歧视的条文从联合国公约中删除，提案最终获得通过，中国投了支持票。

北

京

柜

柜



北京拉拉社区历史

作者：罗名

人物索引 (按文中顺序)

1. **何小培**：资深性权利社会活动家，
粉色空间发起人和负责人
2. **李京**：1990年代北京拉拉圈活跃分子，
北京姐妹小组发起人和核心成员
3. **苏茜**：英国人，性权利社会活动家，
1990年代曾在北京组织东西方女性主义小组和各种同志聚会，北京同志热线发起人
4. **石头**：画家，艺术家，
首位在大陆电视节目中公开出柜的女同志，
主演大陆首部拉拉剧情影片《今年夏天》
5. **吴春生**：1990年代北京男同志活跃分子，
组织各种同志聚会和活动
6. **乔乔**：中国大陆第一位公开出柜的艺人，
中国大陆第一家拉拉酒吧“枫吧”的老板
7. **凌**：曾任北京拉拉沙龙核心志愿者，
粉色空间的发起人和核心成员
8. **Kim**：北京姐妹小组核心成员，
北京女同性恋文化节组织者
9. **闲**：北美紫凤凰小组、
华人性 / 别研究中心和北京拉拉沙龙发起人，
同语创建人和负责人
10. **杨洋**：北京同性恋电影节和
北京同性恋文化节主办者
11. **崔子恩**：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
电影导演和编剧，小说家，
北京同性恋电影节和
北京同性恋文化节主办者
12. **安可**：北京拉拉沙龙发起人和
负责人
13. **万延海**：艾滋病、性少数和人权社会活动家，
北京爱知行研究所创建人和所长
14. **想起**：“花开的地方”网站站长，
上海女爱小组创建人和负责人

15. **追命**：同语发起人和核心成员
16. **宝贝猫**：曾任北京拉拉沙龙核心志愿者和主持人
17. **Sylvia**：曾任同语核心志愿者，拉拉健康调查项目负责人
18. **于是**：成都 les 爱心工作组创建人和负责人
19. **冰蓝**：爱白文化教育中心负责人
20. **杨紫光**：曾任北京同志中心工作人员，“别·性艺术展”策展人之一；
21. **白咏冰**：北京拉拉圈活跃分子，2007 年情人节活动的发起人
22. **魏双双**：曾任爱知行研究所法律项目协调人、同语核心志愿者
23. **sam**：les+ 发起人，轮值主编
24. **gogo**：les+ 发起人，设计总监
25. **大头**：les+ 核心成员，轮值主编
26. **一一**：les+ 核心成员，发行负责人
27. **雪飞**：les+ 核心成员，财务负责人
28. **小黑**：跨性别者，无界限小组创建人，les+ 核心志愿者
29. **Eva**：无界限小组创建人，粉色空间发起人和核心成员，曾任同志亦凡人主持和同语拉拉反家暴项目负责人
30. **罗名**：同语核心成员，同语拉拉反家暴项目调研部分和口述史项目负责人



“即便是在民主的环境里，历史仍会牵涉到权力和排斥行为。

..... 然而，看得见的事实总有办法刻入人心；

..... 确立历史真实这件工作之费工夫，培养了谦虚之心。由于没人能确信自己的解释绝对正确，人人都要听听别人怎么讲。所有的历史都是暂定的；谁也不能自认是定论。”





《历史的真相》 乔伊斯·阿普尔比
林恩·亨特
玛格丽特·雅各布

一．1997 年以前

在中国,尽管同志³现象可以追溯到3000年前的商代(据潘光旦先生考证,商代有“比顽童”⁴的说法),但是同性恋现象和相关问题进入中国的公共领域却只能追溯到公元1981年。这一年,精神医学专家张明园在《大众医学》上发表了一篇介绍《红楼梦》中同性恋现象的文章,认为同性恋是奇异的,但是否是病态张明园未给予定论。这是“同性恋”这个词语第一次出现在中国公众的视野中。而一个颇有意味的巧合是,这一年年底,世界上第一例确诊的艾滋病人——一名美国男同性恋者——因多种感染而死亡。在整个1980年代,“同性恋”还有两次在公开层面的重要“出境”。一次是在1985年所谓的第一次“性学热”中,北京大学的性学专家阮芳斌教授主编了一部总计发行量达到百万册的科普读物——《性知识手册》,其中将同性恋视为“一种变态”。另一次是同年出现在北京大学心理系教授陈仲庚主持编译的大学心理学教科书《变态心理学》中,同性恋被明确列为一种不适宜异性恋生活方式时可以选择的替代生活方式。除了这些在专业学术刊物或出版物中的偶被提及之外,同性恋在公众视野中基本上是不存在



阮芳斌主编的《性知识手册》将同性恋视为“一种变态”



1995 年世妇会在北京召开

的。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之下,更没有公开出柜的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存在于公园、精神病院和警察局⁵;女同性恋者则更多地存在于街坊邻居的闲言碎语之中。

进入九十年代之后,中国的同性恋者却出人意料地来了一次“集体亮相”。1995 年在北京召开了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这次会议是迄今为止参加人数最多的联合国会议和中国承办的规模最大的国际会议。189 个国家的政府代表、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和专门机构、有关政府间和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共 15000 多人与会,而参加非政府组织论坛的更达到 31000 人。而 1990 年代恰是西方女性主义思潮和酷儿理论最为鼎盛时期,许多的女同性恋者也从世界各地来到北京参加妇女大会,尤其是其中的非政府组织论坛。这些国外的女同性恋者在非政府组织论坛上热烈地讨论了同性恋的身份政治和平权问题。但几天之后,中国政府便将妇女大会中非政府组织论坛的开会地点从市区迁到了市郊的怀柔区。

3. “同志”一词意指同性恋者。但“同性恋”这一定义带有强烈的病理学色彩,它是在这一身份被定义成病态和反常时出现的。而在 90 年代由香港电影评论家林奕华提出来的“同志”一词,则强调这一少数群体在身份上的同一性,从而具有更为正面和积极的含义,得到许多同性恋者的赞同,并在政治运动中起到了重要作用。除了“同志”称谓外,中国大陆的女同性恋者还用“拉拉”一词指称自己。“拉拉”、“拉子”这样的称呼首先出现在台湾的女同性恋小说中,是“les” (lesbian) 的谐音,后来它被台湾和香港的女同性恋者广泛使用并传到大陆。本文将交替使用“女同性恋”、“女同志”和“拉拉”这三个名词。



1995 年世妇会在北京召开

何小培：那个非政府组织的论坛就是有很多不同的帐篷，每个帐篷有不同的主题。你想去听什么你就去听什么。我整天在那里乱听。在女同性恋的帐篷里边，听她们谈女同问题。她们有的时候就是玩，有的时候就是那种有主题的讨论了。

尽管政府在后来的公开宣传中对此只字未提，但是这批女同性恋者的出现还是给了许多亲身经历妇女大会的知识分子乃至普通民众以深刻的印象。笔者曾经听到一名中央党校研究党史的历史学教授谈及此事。两名同语的北京志愿者也回忆说，当时北京市民中有一些流言：妇女大会来了一些女同性恋和妓女，还要在北京进行裸体游行。而在同性恋社区内部则流传着这么一则小故事：当时有一名中国的志愿者在女同性恋帐篷外值班，当她被几个外国代表问及是否认识中国的女同性恋者时，这位志愿者说：中国没有同性恋。

当然这显然不能够说明中国没有同性恋者和同性恋现象，只是当时的同性恋人群和现象基本是个体性的、地下的、秘密的，同性恋的聚会是极少的、社群内部的、不为外界所知的。其实在 1995 年前后，中国女同性恋的社区活动已经在一些男女同性恋积极分子和外国人的带领下在北京出现了萌芽。

1990 年代之后，研究同性恋并且不同性恋为变态或某种替代性生活方式的文章、书籍和刊物不断出现，其中较为著名的有李银河的《他们的世界》、方刚的《同性恋在中国》和张北川的《同性爱》、《朋友通讯》等等。这些有限的出版物为女同性恋者的生活带来了一些希望，有些人甚至给作者写信，请他们介绍认识其他的女同性恋者。通过通信介绍，一些女同性恋者开始形成一个以书信往来为形式的交流小网络。为此，这个网络的核心联络人李京（昵称阳阳）在邮局专门订了一个信箱。这个通信小组的成员来自全国各地，后来发展到了三、四十人。除了书信往来，李京还以走访各地的形式开始建立最早的女同志网络。



《他们的世界》《同性爱》等书籍是 90 年代大陆学者研究同性恋的经典著作

4. 潘光旦，《性心理学》

5. 何小培，《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女同志组织》

实地性的女同性恋者聚会也最早出现在北京。1994 年，一个来自英国、名叫苏茜的女双性恋者出现在了北京的同志圈中。在此之前，操一口流利普通话的苏茜就通过别人介绍认识了当时在美国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的何小培。苏茜到北京之后便住在了何小培的家中，同时在家里开起了同志派对，联系了她通过各种渠道认识的中国和外国同性恋者（主要是男同性恋者）到家中聚会。1994 年苏茜在联合国开发署驻北京的办事处找到了一份工作，住进了建国门的外交公寓，同时她的派对也搬到了那里，并发展成了几乎定期的舞会、晚餐会、早餐会。相比而言，外交公寓的空间条件和安全系数都远远超过了私人住宅。许多九十年代在北京同志圈内活跃的人都是在那里互相认识的。据参加过苏茜聚会的石头回忆，这个聚会在当时的北京算得上是“非常火爆”的：

石头：虽然现在我认为她办派对非常有远见，但是我觉得她那个时候好像也不是为了专门北京的同志运动什么的，她更像一个主人，想找一个空间让同志呆在里面玩，交朋友也好聊天也好。她做的就是一个平台，早期（北京同志社区）的那些人都会有去过她家。参加的人都是她用 BB 机什么的一个一个联系通知的。她家比较宽，但还是很挤，因为人太多了。其中女生能有十来个人的样子。当时 Gay 和拉拉都是玩在一起的。本来我就很活泼很野的，一开始去也不知道要干嘛，去了看见有东西吃我就吃，有人跳舞我也跳，觉得很舒服，挺开心的。

这一年苏茜也认识了北京男同性恋活跃分子吴春生。之前吴春生就多次在自己的住所组织男同聚会，也被警察数次阻止。据说有一次，吴春生的住所被十几个警察造访，因为他邀请了 40 多个男同性恋者参加私人聚会。在警察的逼迫下，吴春生不得不用电话在警察面前一一通知被邀请人聚会取消。在那之后吴春生搬到了苏茜家住。苏茜与吴春生发现三里屯是一个外国人和酒吧都聚集的地方，于是决定在三里屯的酒吧街组织同性恋者的定期聚会。但是当时并没有专门的同性恋酒吧，他们的



苏茜（远处左一）

聚会通常都需要事先与酒吧老板沟通，正因为如此，从私人住所走出来的北京同志聚会不得不经常游走在不同的酒吧之间。

何小培：他们俩就说咱们就每个星期三叫大家都去酒吧，就喝酒不说什么。然后每个星期三他们就一个一个打电话说去三里屯那个酒吧街。当时没有几家酒吧，可能就是五六个，就选了一个叫 City 吧的，在那儿聚会。当时 City 吧的老板挺欢迎同性恋去的。一开始老板看出（我们的身份）来了，但是没说什么，那个老板娘就说，没事反正有生意就行，还挺高兴的。后来这个老板娘怀孕了，他们把 City 吧转给了另外一个老板，男的，他不愿意要同性恋，因为他想把那个吧开成小姐的吧。结果特别逗，我们那次一去一看那些女的都特别不对劲，就是穿的特少，然后你看那些男的也特别不对劲。所以就换了地方，换不同的吧，结果变得特别闹，每一次你就不知道该去哪个吧。有的时候酒吧老板也特别不欢迎，有的特别欢迎就是为了钱。反正就是换来换去。



对于这一时期的酒吧同志聚会，我们发现了三种不同的视角和看法。

何小培：刚开始的那么多次聚会吧，一般的都没有女的，然后每一次苏茜都拉着我，来吧来吧假装是女朋友，其实我们俩也不是女朋友。怎么说啊，就是要争取 visibility（可见性），就是让人能看见还是有女的，反正还得假装。每一次一进来人我们俩就要抱在一起，表演给人看。后来一来女的我们都特激动。但是就真的没超过三四个女的。

在何小培的文章中提到了酒吧聚会对于同志运动的重要意义，即这些聚会让同性恋者从个人的住所中走了出来，从一种现象变成了可见的、活生生的人。只有这样才能使孤立而“可怜”的同性恋者“变成有组织、有目标的政治群体”。而对于身在其中的另外一些人来讲，酒吧聚会所呈现出来的同志群体状态却使他们开始怀疑或者否定自己的身份。

石头：真的你一进去，你就发现那些人就是同性恋，好像他们有些玩得很过分。我们后来还去‘一半一半’酒吧，也是 GAY 和拉拉都玩在一起，然后特别亲密。我觉得比现在看起来更亲密，就特别过分的那种玩法，打打闹闹，搂搂抱抱，又要脱衣服又要脱裤子的。所以我很困惑，很纳闷，因为当时我完全不懂这种同性恋文化。我坐在旁边的时候又很害羞，然后我就想我肯定不是同性恋。

而另外一些人感受到的则是区隔与另外一种压力。这些人比较能够适应酒吧那种轻松得有些放纵氛围，但是不会像何小培那样将同志的酒吧聚会作为同志运动的一部分来思考。

乔乔：当时啊我就觉得，拉拉跟 gay 一起聚会，把拉拉给逼到一个角落里，分开，而且歧视拉拉。

当时所谓的大型聚会，最早二三十人，后来慢慢演变到七八十人了。我想，有多少 gay 就应该有多少拉拉吧，也不可能相差这么远。我想，可能是因为我们没有一个自己的地方吧。

三段回忆的提供者有着截然不同的背景和鲜明的性格特点，她们讲述的事实和场景可以互为佐证，但她们身在其中的感受和留下的记忆却迥然不同。从上面三段记忆中我们能够做出这样的推测：1990 年代中期至 1990 年代末，拉拉和 Gay 在酒吧一起聚会，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拉拉和 Gay 的活动有很大一部分都已经分开。尽管随着总体人数的不断增加，拉拉人数也在增加，但是相比而言拉拉在同志公共场所出现的人数还是大大少于 Gay 的人数。而酒吧一直在同志社区中扮演着一个复杂的角色：有人可能在酒吧获得归属感，有人可能找到伴侣，有人可能汲取力量，有人可能开始怀疑自己的性身份，有人可能受到同志社群中其他小群体的歧视和排斥。

这正是历史真实的体现，每一个历史事实并不是整合而统一的，其中充满了偶然、意外、矛盾甚至冲突。而每一个“盲人”所亲手摸到的都是一只“象”的真实的一部分，我们应该尊重每一个“盲人”对于他所知道的这一部分的了解与判断。那么历史的真相是不是就会因此而过于复杂，而变得不可知了呢？笔者认为答案是否定的，复杂与多元带来的应该是“百家争鸣”的文化繁荣，真实的历史是存在的，是可知的，亦是多元的。

私人住所聚会、公共酒吧聚会之余，苏茜组织了第三种形式的聚会——有主题的讨论交流会。1995 年左右，苏茜在她工作的联合国大楼里开始召集每月一次的女性主义读书小组活动，称为东西方文化交流小组，简称东西方小组。东西方小组的活动形式是由来自世界各地的女性每个月聚在一起对某个女性主义话题进行交流和讨论，同志话题也包含其中。东西方小组最为鼎盛的时期，每次参与人数能够达到 20 到 30 人左右。这是我们能够找到的女同议题开始进行“正式”讨论的最早一个时间点。同样重要的是，这些讨论的参与者并不仅仅局限

在同志人群内部，参与东西方小组的有女性主义学者、高校老师以及妇女组织的干部。她们可能成为了首批对女同性恋者有一定认识并态度友好的“直同志”。东西方小组坚持举行了数年，1998年苏茜离开了北京，虽然东西方小组还是继续举行，但活动的频率降低了一些。不过这种讨论会的活动模式已经在北京扎下了根，类似东西方小组活动的女性主义沙龙直到今天仍然不定期举行。

被告知“中国没有同性恋”的外国女同性恋者与萌芽的中国女同社区活动并没有在1995年失之交臂，她们最终还是聚到了一起。世界妇女大会期间，苏茜、吴春生等人在莱特曼舞厅组织了一场中外女同性恋者的舞会。莱特曼舞厅原本就是一家有许多同性恋者出入的舞厅。据何小培回忆，当时从世界妇女大会的会场载来了“两大汽车的女同志”，另外十余名北京的女同志也有参加。那天晚上，舞厅里有男同志、女同志、便衣警察和武装警察。虽然这次大型舞会得以举办，但事后主办者吴春生在寓所被警察逮捕。

何小培：他（吴春生）当时是跟苏茜住在一块，住在外交公寓里面，然后有一个警察就跟他说，哎你出来一下，我跟你说点事。他（吴春生）刚一出那个公寓的门，就有一个车把他抓走，弄起来就走，什么都不说就关起来了。

苏茜立刻开始为吴春生四处奔走呼吁。据何小培回忆，苏茜的父亲利用他在联合国工作的关系直接跟中国的一位高层官员打电话，希望能够尽快释放吴春生⁶。不久吴春生被释放，同时遣返广东原籍，并被告知不得再返回北京。但是警察前脚走，他后脚就坐飞机又回到了北京。

同志聚会（当然也包括女同志聚会）“打游击”的状态在1996年终结。该年6月，为了搞一次纪念石墙事件⁷的活动，苏茜和吴春生找到了一家名为“一半一半”

的偏僻而安静的小酒吧。为了活动能够举行、不受警察干涉，他们决定以办生日聚会的形式来做这次的纪念活动。原本是由吴春生做活动的主持，但是吴春生发现酒吧里面有便衣警察。由于吴春生是“未经允许、擅自回到北京的”，不能如此公开地出现在警察面前，所以活动的主持临时换成了当时刚刚从西藏回到北京的何小培。按照一个生日聚会的模式，参加活动的人唱了生日快乐歌，分了蛋糕。然后何小培请大家猜一猜今天是谁的生日，知道答案的人到她的耳边小声说，猜对了有小礼物（安全套和糖果）。于是参加活动的人开始互相询问，知道石墙事件的人讲给不知道的人听。有一个男同志听完故事后跑到何小培的耳边说：“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今天是我们大家伙儿的生日！”何小培听到后，非常的感动。这一天以后，这家酒吧也成为了北京的第一个同性恋酒吧。同性恋者不仅可以天天都去那里，各种的聚会也开始固定在“一半一半”。既不用每次联系聚会地点，也不用每次打电话进行通知。据说后来一半一半酒吧还增加了变装表演等娱乐项目。

随着同志不定期/定期聚会的发展以及同志场所的出现，逐渐有女同性恋者自己“走出来”或者“被带出来”参加同志活动，并且开始出现女同性恋者自发组合的小型群体。何小培、石头、李京等人就组成了一个名叫“女同志”的形式松散而关系紧密的小群体。这个女同志小组没有固定的领导人，没有固定的活动人群，也没有固定的活动地点。她们经常在一起聚会、去酒吧、跳舞、吃饭、出游或者讨论等等。因为人数和活动的逐渐增多，需要有人负责组织这些活动。于是根据个人意愿兴趣和一定程度的讨论，这个小组有了讨论委员、宣传委员、吃饭委员、体育委员、公园委员等等，负责组织和通知不同的活动。

但是聚会和活动都还是无法有力地解决1990年代女同性恋人群所面临的最大的问题之一——如何发现、认识（更多的）女同性恋者，让更多的人走出来？何小培认

6. 苏茜向编者说明，其父亲并没有在释放吴春生的过程中起到帮助，当时大家只是提议苏茜父亲或许能帮忙，但事实上并没有实行。



石墙运动

为对那时候的大多数同志来说，不仅很难接触获得与同志相关的信息，而且他们也不敢出现在同志酒吧或者舞厅这类场所。因为第一，酒吧在那时候并未被很多人了解和认同，“不正经的人才去酒吧”。第二，出现在同志场所或者同志活动中就等于同志身份的暴露，而很多人对此深有顾虑。在这种情况下，1997 年的夏天，苏茜、何小培、吴春生和 Billy（一位当时在北京做艾滋病工作的英国人）等人在北京开了一次会。他们讨论认为当时建立同志组织和出版同志书籍的时机都不成熟，而当时已经有一定普及程度的 BP 机可能能够作为同志联络、交流的工具。于是他们决定做一个以 BP 机为载体的同志热线，这就是 99575 北京同志热线。

最初，同志热线是由男女同志一起参与工作的，但是这一阶段的同志热线尚未组织化和制度化——既没有固定的工作人员、工作时间和工作地点，也缺乏固定的经费



BP 机

7. “石墙事件”发生于1969年6月27日，纽约市数名警察进入格林威治村一家名为“石墙”的同性恋酒吧进行临检，像以往一样逮捕了几名未带身分证明的男女同志，并驱离顾客。而这一次，同性恋者第一次拒绝警方逮捕，并与警方发生冲突。6月27日之后的连续5个夜晚，同性恋者聚集起来抗议示威并向人们派发传单。同志组织在当年与接下来的一年中开始大量涌现。史称“石墙事件”或“石墙运动”。“石墙事件”被认为是美国乃至世界现代同性恋权利运动的起点。

来源，工作人员也没有得到事先的培训。何小培回忆说，最开始的热线经常就是“一个人拿着 BP 机一个星期或几个星期”，但“遇到寻呼时如果是正在上班，因为工作忙，或怕同事或领导听到，就无法回电话”。初期的热线值班人员比较少，有时还出现找不到人值班的情况。后来，热线才逐渐从不定期变成定期值班，工作时间一般选在下班时段或周末，最多的时候每周值三次班，每次有 1-2 人值班，每次值 4-6 小时。另外，由于当时与男同志相比，拉拉人数较少，所以每周的值班时间中只有一次班是专门的拉拉时间。

同志热线开始后不久，他们也开始了一些不定期的培训，一方面是找到当时的“妇女热线”和“艾滋病热线”等相关人员讲解一些热线工作的基本方法，并购买相关书籍互相传阅；另一方面，在同志热线内部，则开始了热线参与者们自己的讨论和经验交流会。每周日下午，一些热线的参与者们自发地聚在一起，讨论和交流他们在寻呼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并一起寻找答案。讨论的地点有时在私人家里，有时在酒吧或者咖啡厅中。这样的讨论活动也进一步吸引了不同类型的参与者，有热线的志愿者，有“慕名而来”的男女同志，也有“对研究同性恋有兴趣”的异性恋者。而正是通过这些“七嘴八舌”的讨论，最初的热线工作者们总结出了一些基本的工作原则，比如：“为防止警察的干扰，我们不应与寻呼的人见面；耐心倾听；不做任何道德评判”等等。不仅如此，这种讨论也成为男女同志们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认同的重要方式——“经过不断的自我培训，我们更加意识到有一个同志圈子，由我们自己来帮助自己的重要性”，“我们自己教育了自己”，“我们的经历其实就是最好的答案”，何小培如是说。

最初的 BP 机由几个倡议者共同出资购买。至于电话费，由于热线刚开通时寻呼的人不多，这时的电话费是直接

由义务值班的同志自己负担的。不过到后来，随着外地寻呼量大大增加，仅有普通工作收入的个人开始难以承受高昂的长途电话费用。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从 1998 年开始，一些在北京工作和学习的外国同性恋者向热线提供自己住处的电话作为回答热线的电话。随着热线的不断成熟、稳定与发展，99575 热线后来获得了国外的基金支持。

为了找到更多的同性恋者，热线本身面临着如何宣传和扩大影响力的问题。热线的参与者们主要通过印制名片在同性恋酒吧散发，通过在当时还不太流行的互联网发布信息，以及在杂志上刊登广告等方式进行宣传。上面几种方式中，在公开发行的杂志上刊登广告其实是最困难的，然而实际上却成为热线最为成功的一次宣传。1998 年，热线在广东省出版的一份公开发行的生活月刊《希望》6 月刊上登载了广告。在这一期月刊里还刊登了有关同性恋的专题讨论，不仅有来自专家、学者、医生的文章，也刊登了同志自己的文章。这一期的《希望》杂志影响很大，仅在热线广告登出后的一个星期时间里，寻呼同志热线的人数就猛增至上百个。但是遗憾的是，《希望》杂志的领导却因此而受到了上级的批评，而热线也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无法再获得刊登广告的机会。

相比于其他的通讯工具和手段，BP 机满足了同志人群联络、交流、安全、保密等方面的诸多需要。安全与保密在当时非常的重要，其一因为暴露同志身份可能会（几乎必然会）带来歧视，其二因为当时同性恋行为仍然属于流氓罪范畴。直到 1997 年，中国政府颁布修改之后的新刑法，才取消了“流氓罪”，把这个“口袋罪”⁸ 分解成了强制猥亵妇女罪、侮辱妇女罪、聚众斗殴罪、寻衅滋事罪、聚众淫乱罪、猥亵儿童罪。李银河等人认为这是同性恋在中国“非罪化”的标志⁹。因为

8. 所谓口袋罪是某一行为是否触犯某一法条不明确，但与某一法条的相似，就以该法条定罪。这种情况多次出现，就将此罪戏称为口袋罪，例如 79 年刑法的流氓罪就被认为是一典型的口袋罪，有言道：“流氓罪是个筐，什么罪都往里装。”



在 1979 年的刑法当中，尽管没有专门针对同性恋行为的条款，但在实际的执法过程中，即使是互相同意的成年人之间的同性性行为也会被认定为“其他流氓活动”，从而定罪量刑。例如，1997 年之前曾经有担任公职的女同志因“犯流氓罪”而被撤职并劳改。

虽然政府的这一措施对于同志人群来说意义可能十分重大，但是中国政法大学的郭晓飞博士认为这并不代表中国政府对同性恋问题的认识发生了转变，而只是一种客观效应。他在《中国“同志”人群的法律环境》一文中写道：“立法者并无这样的意图……这个罪被取消的真正原因是因为流氓罪太模糊了，是个‘口袋罪’，而新刑法确立的‘罪刑法定’¹⁰原则需要改变这种模糊定罪的立法……这样的变化主观上与同性恋无关，却在客观上有利于同性恋的性权利。”考虑到第二年（1998 年）卫生部颁布的血站管理办法中就明确规定同性恋者不能献血，郭晓飞的看法还是基本合乎事实的。



郭晓飞及其著作《中国法视野下的同性恋》

9. 郭晓飞认为这种说法值得商榷，因为在此之前中国并没有专门针对同性恋行为的法律，没有罪化就无所谓非罪化。但考虑到 97 年之前，在执法过程中基本将同性恋行为界定为“其他流氓活动”进行定罪量刑，所以流氓罪本身的取消还是具有一定指标性意义的。

10. 即法律没有规定的，不能定为犯罪。

二．1998 年至 2003 年

1997 年 10 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公布的互联网发展调查报告显示，中国有 62 万互联网网民。也就是说，大约每 2 千人中有 1 人较频繁地使用互联网。相比于 2009 年 3 亿多的网民人数来讲，62 万有些微不足道，但是互联网在中国大陆的出现与逐渐普及却对中国的同志人群以及同志社区和同志运动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方面，国内的拉拉可以通过浏览大陆以外的同志网站或者 BBS 来获得相关的资讯——1998 年台湾已经有了拉拉的 BBS，同样以中文为母语的大陆拉拉也可以通过这些台湾的平台了解有关信息；另一方面，大陆的拉拉网民在互联网上的“流动性”聊天室上开始聚集，她们的人数虽然不多，但是其地域覆盖范围之广却远远超过了其他任何一种沟通工具。

凌：国内有聊天室。那个聊天室不是固定的，都是谁登上去之后现开的，没人了那个聊天室就关了。但是甭管谁开的，聊天室的名字后面都会打个括号写个 L，大写的 L。所以知道的人一看就知道那是拉拉的聊天室。L 就是 Lesbian，拉拉的意思。因为聊天室的列表很多嘛，那个时候都是随便开的，（打开列表）一看就能找到，可能同时也有几个聊天室吧，都带了一个这么 L，然后你就可以进去看。那个时候，好像加上海外的国内的，估计加起来不到 100 人。那个时候刚开始有互联网，上网的还特别少，所以基本上上网的就是大学里头的老师或者是什么。一个省可能就一个人，有的省可能多的，像北京上海，多的可能有一些人，十几个人，二十个人，就大概是这样。那些人天天都在那里，都很熟。

而对于拉拉个人来说，互联网是打开了各种可能性的一扇窗户。也许这种比喻对于现在的大多数拉拉而言仍旧是恰当的。

凌：那个时候就是从蒙昧到知道。在上网之前，你可能就认为你是全世界唯一的一个（拉拉）。但是突然有了

互联网，有了聊天室，有了一些台湾的网站，你的世界马上就打开了，就像打开了一扇窗。你知道还有人跟你是一样的，那么你的圈子就有了，也可以找女朋友了。对吧，你想，之前你没有任何资讯，你也不可能跟身边的人说，我是女同性恋。可能你连这个身份都不知道。你只知道你喜欢女孩，然后你也不敢跟谁说，也不敢去找女孩，你身边也看不到谁是这样的。没有酒吧，没有，什么都没有，茫茫人海当中也不可能去辨识。但是有了互联网，发现还有人跟我一样，那么我就可以找女朋友，可以和女孩子一起生活。这些可能性也就打开了。之前的生活可能就是反抗，反抗结婚什么的，但没有可能性。

实际上，互联网所带来的也是一种全球范围的连接。1997 年，五位大陆留学生和移民在北美地区成立了一个小组，名叫“紫凤凰”，它是一个针对在北美的大陆女同性恋和双性恋的支持小组。这个小组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利用了逐渐成熟的信息技术，也就是通过邮件组和互联网的方式实现了拉拉之间超越地方性的联结。据当时作为紫凤凰发起人之一的闲回忆说：

闲：在 97 年、98 年的时候，还是很少能够认识来自大陆的（拉拉）留学生，所以当时认识一个都可亲切了，……真的就像一家人似的，因为就有一个大家庭的感觉——就是你虽然不是血缘上的一家人，但是由于你的身份导致你的经历会相似，导致你们可能会有一种亲人感，这个在初期的时候特别明显。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紫凤凰小组通过其建立的邮件组进行联系、交流、互相支持以及话题讨论等活动。邮件组运行了好几年，不仅针对北美地区的大陆女同志，也面向世界其他地区（比如日本、欧洲）的女同志以及中国大陆的女同志。据闲回忆，邮件组曾经接到过来自一位中国大陆已婚拉拉的求助信。写信的拉拉是一名医生，她的丈夫无法忍受她的同性恋身份而打她乃至威胁要“闹到单位去”，因此她很希望通过邮件求助逃到国外“避难”。



当虚拟连接到达世界的另一端之时，更为实质性的拉拉交流也走出了大陆，走到了香港。在华人同志史上，有一项会议始终占有一席之地，它就是华人同志交流大会。这一会议的缘起是台湾、香港和大陆两岸三地的运动人士，希望能促成华人地区的同志运动发展。1997年，第一届华人同志大会在香港举行，随后的1998年和1999年，第二届和第三届华人同志大会也继续在香港举行。

1998年8月香港的吴健雄、周华山等人为了更多地了解大陆的情况，与北京的同志活跃分子联合，从而促使两岸三地在同志问题上的交流，在北京西山大觉寺召开了一次男女同志大会。参会人员来自大陆、香港、台湾以及北美，共40多人。为了避免警察的妨碍，会议并没有大张旗鼓，而是秘密进行。在这次大会上，各个地方的参会代表主要介绍了其所在地区的活动和情况。据石头回忆，台湾的代表介绍了同志消费，香港代表谈了一些同志权益的问题，而大陆的代表介绍了同志热线的建立和运行情况。对于这个首次在大陆举行的跨区域同志大会，与会的拉拉做了这样的回忆：

石头：男女同志大会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有一个台湾的杨（立德），以前给张惠妹写歌词的，他也做摄影。他来讲了同志消费的一些东西。她们（台湾）已经在讲同志消费了，而我们这边同志都还不太见得到（人）呢，同志的权益更不用说了。大陆的介绍了一下我们的热线（北京同志热线）。我们在那住了好几天，会也很顺利，每一个人在里面都可以讲话，比较平等的交流吧。那是初级阶段，也还挺好玩的。可能香港的台湾的比较老练一点，他们要有经验一点。但是我们大陆毕竟人、资源挺多的。

也许是受了男女同志大会的启发，8月的大会结束之后，参加会议的拉拉认为应该专门开一个拉拉的会议。经过两个多月的筹备，1998年10月，女同志大会在北京举行。会议的召开涉及联络、组织、募款和联系场地等多



香港学者周华山，曾在1998年组织了男女同志大会

个环节的准备工作的。首先是联络参会的人员这项“艰巨”的外联任务，而负责联络的人，正是李京。她利用之前通过邮政通信和走访等途径所建立起来的“笔友”网络，总共联络到了遍布于天津、贵州、哈尔滨、大连等全国各地的四十多名女同志前来北京参加会议。当然，除了大陆的女同志外，会议也邀请了当时比较知名的一些女权主义者，以及来自美国、澳洲、台湾和香港等地区的相关人士参加。而大会的整个筹备工作实际上是由六个人共同负责的。据何小培回忆，在开完了八月份的男女同志大会以后，大家就商量女同志也应该自己开一个会：

何小培：我说那就开吧，然后就到了我家，我们就一块商量，可能三个人、四个人到我们家商量。商量以后，我说，要是开的话，那就讨论什么主题，然后邀请什么人。我说得有人负责啊，然后就叫所有人到我们家来，选六个委员。然后就来了，真来了，那次来了十几个人，后来真选了六个委员。然后我们确定了三个主题。好像是我们三个人先想，假如我们开会，想出什么样的结果。比如说，她们说想办个杂志，我说好，两个人就负责这个主题，办杂志文化。还有一个人说想办热线，然后我说好，

热线又是一个主题。然后有人说想做一个网络，我说那这又是一个主题。开会的时候那六个人，每两个人负责一个主题。我们主要讨论这三个主题。最后会议的结果是要这三件事有人负责做下去，然后我们会上说，要讨论这三件事是怎么做、谁去做。……然后，这个会完了，真的有了热线，真的有了杂志。

女同志大会的场地，选在一间开在北大南门附近的半地下的小酒吧里，这个酒吧在当时颇有些名气，名叫“潜水艇”。室内也是按照一艘船的样子做的布置。酒吧是由石头联系的，因为酒吧老板是石头的一对异性恋朋友。正是在这个小小的船吧里，女同大会“启航”了，而且一开就是三天，涉及议题的范围也远远超出了当初筹备会议上所确定的那三项主题。石头至今还保留着那次会议的日程单，她告诉我们：

石头：十月二号，上午个人介绍，有刘伯红、葛友利。还有女同志的经验分享——作为女同志你对自己的认识和你是如何做到自我认同的。还有分享你的同性恋经验、失恋和性经验。如果你是已婚的女同志，就讲已婚的女同志生活。然后，你是否考虑过与 GAY 一起生活——形式

婚姻，那时候就开始搞这个。你是如何面对男性追求者的。还有讲双性爱的：你是否接受男性的爱。还有讲到你的家庭……好像那些话题现在也还有，包括的可多了，那么多内容……我还跑到刘伯红那儿把这些都打印出来，每个人还发一个提纲出来。

作为一次会议，资金来源自然也是个问题。据石头说，她印象中似乎一直是李京等人来负责会议资金的申请和管理事项。而何小培的叙述却提供了更为生动的会议募款的细节：

何小培：在联系参会人员之前，我说需要钱的话我们做一个大 party，然后我们真做了一个特别大的 party。是我找的地儿。……那时候我要出国，是挺长时间的事……所以那时候我把我家东西都打包，那个都包的特别好看，然后就卖这些东西。谁都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我让所有志愿者都来包（装东西），包完之后可能就十块钱一个嘛，二十块钱一个 CD。然后她们都特懒，把五个 CD 放在一块儿了，才卖十块钱，我说你别啊，一个一个包好好卖钱啊。后来什么都卖光了。还有一个什么东西，卖了



1998 年的女同志大会 男同志阿平（面对镜头一排左二）在分享同志热线



1998 年的女同志大会

（石头供图）



三百块钱——不是，可能一百块钱卖了，我忘了，特破的东西，但是你包的特好看，人家都买了。最后没得卖了，她们还说卖我，把我还卖了三百块钱。（访谈员：怎么把你……卖了？）我就穿着衣服在上面走来走去，说谁买？然后就有个女的买，就把我卖了，三百块钱。然后可能那次赚了五千块钱。我说这个钱给李京。我说外地来开会的人需要钱的，用这个钱，开会租场地什么也需要钱。然后挺好的，因为这个钱是大家一块儿挣的，谁都有权说这钱怎么用。后来李京说一分钱都没花，外地的人都来了，来开会都觉得特高兴，不要钱，她说没花那个钱，但就是因为是这么挣的钱么，大家伙一块儿挣的，大家都来说该怎么花，挺好的，因为是一个社区活动么。那时候都不是特正式，但是搞得都特别热闹，谁都不是为了钱。”

这次女同大会的成功举行促成了北京姐妹小组的成立。谈到小组成立的原因，据当时的几位骨干分子回忆，其一，是直接源于女同大会上参会代表们强烈的工作热情，在会议上，大家一致认为，应该将这份紧密的联系和运动的热情继续保持下去，并应该将会上所讨论的各项主题落实到现实的行动之中；其二，这几位骨干分子也提到，1998年苏茜离开了北京回到英国，何小培也因为工作和读书的原因而离开北京，北京的拉拉社群一下子失去了两位十分重要的组织者和号召人。在这种情况下要继续坚持开展活动，似乎有必要借助一个更加固定化和组织化的实体来推动。从这个角度来说，姐妹小组的成立实际上是对从1995年到1998年间已经积累起来的一些拉拉社群的人力资源整合和组织化的一种形式和成果。

最初的北京姐妹小组，拥有5到6名核心成员，她们基本是参与了女同大会主要组织工作的骨干分子们，比如李京、石头、Kim和成林等人。在组织架构上，姐妹小组并没有原则上的单独负责人或者领导，各项事务基本由大家共同商量决定。在资金方面，北京姐妹小组从

建立初期便开始向海外申请资金，并得到了一定的资助，姐妹小组用这些资金租了一处房子，主要用来进行小组的日常办公和组织活动，比如定期的沙龙讨论会和观看电影等等。而在工作执行上，小组较之前的女同群体活动有了进一步的分工，重点工作则围绕女同大会所确立的热线、杂志、网络等几项展开。

在有了自己的工作室后，北京姐妹小组接听热线的工作也开始固定在那里进行，这就使得这条专门的拉拉热线摆脱了此前北京同志热线那种“居无定所”的状态。但是改善的工作环境并不一定立刻带来更好的工作成果。拉拉热线一开始便面临着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打入的困难局面。为了扩大知名度，她们想办法将这条热线的信息刊登在了某些英语学习报上。打入热线的人数慢慢变多，而遭遇的情况也慢慢变得复杂，比如也有男性由于好奇心而拨打了拉拉热线。闲还听到一个有关拉拉热线的有趣的细节，为了找出更多的拉拉，姐妹小组的成员曾经照着电话黄页挨个打电话，问接电话的人是不是拉拉。

在姐妹小组的推动下，北京拉拉社区的第一份杂志——《天空》也逐渐做了起来。这份杂志中包括了很多拉拉的情感类内容和一些相关的资讯，希望借此发出拉拉自己的声音。之所以为杂志取名“天空”，据Kim说，是因为“天空这个名字实际上是跟‘半边天’有关系，因为妇女是‘半边天’嘛，那我们想我们是lesbian，我们就是整个天空了嘛，所以我们就叫‘天空’。”《天空》杂志上还设有一个“论坛”的栏目，以供大家讨论、交流一些共同关心的话题。这些话题有时来源于小组定期组织的沙龙讨论会。而参与“论坛”讨论的方式则是大家彼此之间的相互通信。Kim对这个栏目曾做过这样的评价：

Kim：杂志上的论坛栏目时效是非常慢的。就是我们说，下一期我们讨论，比如说哈，gay要不要和lesbian假结婚的事儿，那么大家就会写信谈谈看法。等我们收到信、再整理啊什

么的，差不多三个多月就过去了。然后下一期就是另一个话题。沙龙的话就是会召集大家来，比如说 gay 要不要和 lesbian 结婚这个问题，大家就会谈一谈自己的看法。比如说她自己有这个经验的，那她就说啦，哎呀，那就别结婚啦，烦死啦，什么什么的，很多问题啊。那有的人就是家里压力大的，那她就说，可不可以找一个好点儿的 gay 呀，什么什么的。

由于一些条件的限制，《天空》杂志并没有固定的出刊日期，一般是什么时候做出来就发布一期，有时要几个月，更长的则有接近一年才出一期的时候。杂志的编辑也是由几个核心小组的成员轮流担任。当然，除了主要为拉拉社区的内部沟通和交流提供舞台外，《天空》也包括一些资讯类和采访类的内容，比如杂志曾经采访过半边天的主持人张越，并由 Kim 在那一期中撰写了相关的文章。

另外，姐妹小组还定期在办公室组织讨论会、观影会等各种活动。Kim 曾谈到当时这些活动的一些特点，而这些特点与当时北京拉拉社区的情况也是密不可分的。

Kim: 当时的社区人很少嘛，然后呢，反正就是，搞一次（聚会活动）也不容易。大家就是会打电话问，谁来不来啊——就有这个跟那个有闹矛盾，就说谁来那我就来不来啊，就那种的，小孩子那样的。我当时的的工作就是给大家打电话，‘啊，你们又闹矛盾了？没事没事，她不来，你来吧’，就那种（笑）。然后等她们来，俩人都来了，她们也不好意思当着人吵架，就那样。要不然人家……以前的事儿哈。就是那时候大家，少嘛，一共就二三十个人，就很容易有各种小矛盾啊什么的。……我们会轮流打电话（通知大家参加活动），但这是个很累人的工作，因为你要给她们打电话啊，要解释啊，沟通啊，要连哄带骗的那种（笑）。

总的来说，初期的北京姐妹小组所举办的大多数活动，仍然主要是非公开或者半公开的社区内活动，正像石头所说的，那时候“最重要的活动其实并不是说要去干别的，就是能有很多人到这来，大家在一起做事情聊天，这个是那时候最重要的表现形式”。不过，在其后的近三年时间里，姐妹小组却始终困扰于内部成员之间的矛盾冲



第一期《天空》杂志封面 2000



第一期《天空》杂志目录 2000



第四期《天空》杂志封面 2001

(石头供图)



突。因为姐妹小组成员已经分散多年，有关这些发生在小组内部的矛盾冲突以及它们真实的原因，现在的我们已经很难了解其全部情况了。只能根据几个小组成员的回忆来还原一部分当时的情况。

据石头等人的回忆，姐妹小组内部矛盾的焦点在较早参加同志活动的积极分子李京与在 1998 年同志大会以后逐渐加入的 Kim 这两位小组的核心成员之间。关于李京与 Kim 之间矛盾的缘由，有一种说法认为，是由于两人都个性鲜明，但彼此性格合不来。石头曾谈到：

石头：（姐妹小组）1998 年成立，2001 年解体。因为到 2001 年的时候，就是后来，是因为那个，Kim，我们不是在一个小组里面么，那时候都是李京，她是召集人么。然后 Kim 个性又不一样，她们两个有点合不来，就有点处不来那种。李京看不惯 Kim……可能，李京就觉得她（指 Kim）的性格比较任性。然后那 Kim 就觉得，不知道 Kim 对李京是什么感觉，反正也是有意见，就是这样的。那李京……就退出小组了。

发生在李京与 Kim 之间的这场矛盾冲突，以 2000 年李京等几位小组核心成员的退出而告终。而这又多少导致了姐妹小组在此后渐趋解散。因为在此之前，李京不仅是姐妹小组中“最重要的召集人”（石头语），而且她还长期担任着姐妹小组的外部联络工作。李京离开之后，不仅小组的外联工作、特别是与那些曾参加 1998 年女同大会的外地代表们的联络变得越来越少了，就连内部成员之间的联络也没有以前那样密切了。石头回忆说，在李京和小燕（音）等人退出小组之后，她自己已于 2000 年以后逐渐与包括李京在内的很多朋友失去了联系，慢慢转而忙于自己的事情了。而李京在离开北京姐妹小组之后，似乎也很少再现身于同志活动中了。

李京等几位核心成员的离去，并没有使姐妹小组内部的矛盾得到实质性的缓和，相反，小组矛盾不仅继续存在着，而且在随后的 2001 年，在 Kim 等人筹办女同性恋

文化节的过程中，这些矛盾似乎不断地升级。我们捕捉到一个历史的细节：

石头：她们做文化节的时候，那几个拉拉突然叫我去吃饭，说要跟我聚一次，要跟我商量事情。除了 Kim 之外所有的人，都要跟我见面。那见面是为什么呢，她们就在说，哎呀，好像做这个文化节有问题啊。因为在那个年代，如果太是张扬的话，对同志本来就不利。比如说你（Kim）要请那么多媒体，你有没有考虑来参加的同志他们会是什么感受，大多数人是都不想公开的。然后呢，她们说，做这样的活动目的好像是为了某个人要出国，然后干完这个活动她（Kim）就可以去美国了。她们当时会这样认为的，就是这个小组的人当时都这样认为的。……（她们）反正就是认为这个文化节跟同志没关系，因为你请的人也好……她们觉得这跟同志没有关系。（这时）我才知道，原来搞这个大家还这么觉得不踏实，然后意见很大很大。我说你们为什么不直接跟 Kim 说呢？你跟我说，我也一直没有参加这个活动，不太知道。但她们还算信任我，就找我来倾诉，然后还希望那个我来做事情，我能站出来做事情。（我觉得）当时她们的那个态度出来得有点极端，我就觉得这样不对。我说这个时候了，你们这样来讲，不对。我就认为，大家有意见应该当面提的，你来跟我讲，那不等于背后讲嘛。因为也许是 Kim 她很强势了，她讲话的时候不会去考虑别人的观点。我想她们也许也（跟 kim）讲过的，但是争论之后也许 Kim 当时就决定了，我猜是这样的哈，要不然她们怎么都这么大意见都跟我讲。

上面这段回忆反映出姐妹小组内部在关于筹办文化节的问题上存在的一个重大的分歧点，就是很多成员并不想把文化节做得太公开化，不想与媒体和非同志社区关系过于密切。但是，在当时的姐妹小组内已经处于某种中

心地位的 Kim，却联系了很多外界媒体和相关人士。这个行动理念上的矛盾显然并没有在姐妹小组内部通过沟通、协商等形式得以解决，从而导致了小组成员对 Kim 的种种不满和猜疑。

对后来的人而言，也许追究当初的这种种猜疑与指责没有多少意义，但是我们透过这些真实而又有些苦涩的回忆，看到它其实正反映出存在于北京姐妹小组的一些深层问题。闲曾在谈及姐妹小组的时候提到，在姐妹小组内部，一直存在着对组织内个人关系的处理问题：

闲：（北京姐妹小组内）也有一些个人的东西，就是比如这个小组里面谈恋爱，谈到最后又分手了，然后这个小组就分裂了。尤其是在最初期，九十年代末的时候，好像就是女同志的个人关系问题，经常会极大地影响她们组织的形态，或者是运动的（效果），就是本来这人做得挺好的，后来就是因为分手，然后这人就没了，然后这个运动就没了。

而石头在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也曾说，当时的北京姐妹小组确实在组织和管理上面临不少问题，她认为这突出地表现在小组成员比较缺乏一种民主意识，小组本身也缺乏一套民主的决策和运作机制。

石头：同志社区的事情，它不是一个国家机构的那种，我本来对那种机构就……哎呀，人一旦做了这种权力上的事情，总是会出问题的，我是这么认为。或者说没有民主的话，是不行的。虽然那时候我也不太懂民主，但我当时觉得她们肯定是没有民主了，才会发生这种事情，而且她们是想以非民主的方式想把这个问题解决，我就觉得这样不对。当时我们都没有想过应该选一个……轮流做（的主席），一个轮值主席这样的概念。（当时）就是做事情，没有什么这种概念上的事情。

也许正是因为这样，当 2000 年李京等人宣布要退出小组的时候，包括石头在内的很多成员虽然都感到“很遗憾”，却并没有想出什么真正的办法来解决矛盾、挽留住同伴。

2001 年 5 月，主要由北京姐妹小组的 Kim 等人筹办的女同性恋文化节在北京开幕。结果开幕当天，就遭到了政府的“镇压（Kim 语）”。警察不仅封锁了现场并对在场同志一一进行了身份核查，还带走了包括 Kim 在内的主要组织者进行问话。而实际上，在此之前的三年（从 1998 年开始），北京姐妹小组的各项非公开性活动从没有遭到过政府的公开检查，据石头谈到，即使当时的活动可能有便衣警察监视，也没有对小组进行过公开干预。之所以出现这种多少出人意料的结果，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在 2001 年的中国国内，当时的法轮功事件余温未消，整个政府和公安系统对于聚集性活动的敏感度仍然是非常高的。

Kim 曾详细描述了文化节当天被警察叫停后的情形：

Kim：他们（指警察）的意思就让我们都大家回去嘛，就不要搞活动了。但人家都五湖四海来了，也得让大家过个节日啊对吧。结果我们



约 2000 年时的 Kim

来源：豆瓣小组“纪念 Kim”（邬烈兴）



到哪里，哪里就一堆便衣警察就跟着我们。比方说我们进到那个星巴克咖啡店里，我们就发现，哇！那一大屋子都是便衣（笑）。就特莫名其妙那种。我们就几个人就喝喝咖啡，就没地儿去了嘛，也没活动了。好几张桌子就是那便衣。而且他们就是特明显的那种，你知道么，就是那种中年男人，一看就是便衣，就根本不会去星巴克那种人就在那儿出现了。

在这种情况下，文化节的活动只好被迫转移到当时正在开枫吧的老板乔乔的家里进行，活动也变成了主要是组织参会的同志在乔乔家进行了三天的观影活动。

Kim: 后来我们给追得没处去了，我们就到乔家里去了（笑）。当时乔乔和她女朋友一块租了两个居室，然后她很豪爽的。然后我们说，我们给追的没地儿了，去哪儿都一堆人跟着我们嘛，然后我们说，哎呀去人家家里他们（警察）不能说……最多在人家楼下等着。我们就到乔家去了（笑）”。

在乔乔的访谈中她也提到此事：

乔乔: 后来那时候她们（指 Kim 等人）没办法，再加上内部摊钱，然后 Kim 找上我来了，（说）“要不乔乔帮个忙吧”，我说“干嘛呀”？（Kim）说，合着在你们家看电影行吗？我说看什么？

（Kim 说）“看那个拉拉的电影”。她给我钱，我说不要钱，不挣那份钱。……连在我们家三天（看电影）。Kim 自此对我的态度就改观了，就对我挺好的。……后来 Kim 还不错，从头管到尾。……最后四十多口子没地儿住，没人管，后来全在我们家待着，……有的住在那儿（指乔乔当时的家），我们家都打地铺了。然后 Kim 给我钱我也没要，我说我挣不了这份钱，我也不挣，我帮个忙就行了。电话被追踪，没人敢接这个活儿，然后我说，那我接吧。（访

谈员: 那当时也要打点一下关系什么的吧？）
没事儿，我们家部队的。

那么，在这次事件发生时，政府究竟做了哪些反应和处理呢？我们通过对 Kim 的访谈多少能够了解到一些：

访谈员: 我很好奇啊，那些警察怎么知道你们的？

Kim: 我后来等到他们审问我的时候，我才知道，他们有窃听我的电话，就是我说的什么事儿他们都知道。但是我之前，我一点儿都没有察觉到。而且越早的时候，他们会……就是来抓我们的时候，那个人是刑侦大队的，他说他是专门抓法轮功的（笑）。他就吓我说，‘像你这种人，我就把你当法轮功抓起来你都没话说，属于非法集会’（笑）。他的意思就是说，随便他就可以把你安个罪名，说你是法轮功你有什么招儿啊，对不对，就把你发配去劳改去了，他就这么说。所以那个时候……现在可能文明点了呵。我后来也没跟他们有什么交往了，我就知道了（笑）。那个时候是，他就反正审讯嘛，他有规定说，不能把你拘留超过二十四小时嘛，然后他就把你审讯审讯，到二十三小时了给你放走，但你刚走一会儿，他又把你叫回来了，又重新开始计算二十四个小时，就那种（笑）。”

访谈员: 你觉得警察到底怕的是什么呢？

Kim: 我想这个就是国家的一个意识形态吧，他就是怕你集会。当你集会了，形成了一定的力量以后，你人多嘛，人在一起了你就有一定的力量，对吧。他其实审问我的时候，他说的很清楚的，他说，你跟另外一个人在大街上的时候随便干什么我都不管你，那如果你一堆人在一块儿商量一个事儿，那就有问题了。

访谈员：那时候是不是因为法轮功闹的事比较厉害，所以国家对这些事儿都很敏感？

Kim：我觉得那个时候，他们可能还真不明白这个同性恋是怎么回事儿，你知道吧。他们就觉得一堆人一块儿在那儿干嘛呢。他们当时就把我们电脑的资料哈，很认真的全部拷下来，也不知道在那儿研究个啥啊，看啊，什么的。

Kim 还谈到，在这次事件之后，她被列到了黑名单中，此后的很多年中一直无法进入自己的邮件系统：

Kim：我们国家的国安系统是比较官僚的，就是它如果看你的 email 哈，等到你不干什么事儿了，它还是要监督你的 email，它监督不是很认真地看你的 email 是什么，它就是整个地监督你，导致你的 email 就不能用，整个处在一个瘫痪的状态，就进不去，就这样。然后一直到什么时候？大概是今年奥运之后，可能他们才把我从黑名单上除去，然后我的 email 才恢复，才进得去，看我的邮件，就这个状态。

2001 年的同志文化节被政府叫停，对于整个同志社区的运动无疑是一次重大的打击。

Kim：那次活动（指文化节）对当时女同志的社区打击是蛮大的，因为就是这个事儿当时大家都害怕的嘛，因为就是他当时来（指警察在现场）就是看了每个人的身份证，他当时是可以到你家里和你的父母说啊什么的，所以当时对我们打击是非常大的。然后，慢慢到后来可能就越来越好了吧。但是我自己可能就是，那次就是对我的打击也蛮大的。

石头：在门缝里做事很不容易的，本来好不容易能找来这几个同志，人家聚在一起，然后出问题了那肯定打击特别大。

石头还指出，一方面，政府在这件事情上处理得并不恰当，实际上是反应过度了；另一方面，石头也认为，Kim 等小组成员作为文化节的筹办者，在筹办中也表现得不够谨慎：

石头：好多人是胆子好小的，又不是说要闹什么革命，又不是说要颠覆政权，同志是想找一个想说话的地方才来聚在一起的，才来参与这个文化节。结果你被警察（镇压），她会怎么想。如果你是因为政治的原因，你想天安门去干什么的话，那是另一回事。她不是想干这些的。为什么大家都一下子就鸟兽散那种感觉，因为太意外了嘛。政府做的不好这是肯定的，没必要要这样。

我觉得小组（也应该）慎重一点。为什么我们做那个男女同志大会会顺利举行呢？（我们）是很慎重的，虽然我们在说话中很大方。我们都是去酒吧里说话，都没有什么关系，去的好几个酒吧还是我认识的朋友开的。那时候我记得我们讨论过男女同志大会的时候，在新华社旁边的一个朋友的酒吧，我们在那都没什么，公开说话没什么关系。可是你真的安排事情的时候，你真的要保护别人的，也要保护自己的。

在文化节被叫停之后，Kim 去了美国。随着她的离去，北京姐妹小组逐渐解散，各项工作都停了下来，不仅再没有组织过公开活动，平时的小组讨论也没有了，热线也随之撤掉。唯一“幸存”的《天空》杂志由海底（志愿者名）继续做了下去，但是杂志没有再印刷过，而是以网络杂志的形式继续存在了三年。

多年以后的今天，作为姐妹小组最初的创始人之一，石头对它这样评价说：

访谈员：你们在做姐妹小组的时候，你觉得你们做得比较成功的地方是什么呢？



石头：我觉得比较成功的地方就是把人给召集过来了。真的是我们不分啊，什么人都可以来参加活动。可以说有不同的人来，包括我们小组里面挺核心的人程艳（音），她就是直同志。我觉得这点……就是什么人都可以来，我觉得这可能是比较好的地方。

相比于九十年代中期的女同志活动和女同小组雏形，闲认为北京姐妹小组“在它的组织结构和运动理念上是一个比较成熟的社区小组，也是一次很好的尝试。”但是，从运动阶段的认识和运动策略的选择方面，姐妹小组“跟北京的社区有点脱节，因为它自己走得比较远”，尤其在文化节的组织上显得“太超前、太政治化”，结果“社区大众会排斥它、接受不了”。此外，如前面提到的，小组在处理一些组织内的个人关系和个人矛盾冲突方面也显得不够成熟，缺乏足够的制度建设和民主意识。总的来说，北京姐妹小组是早期同志运动的一次非常宝贵的实践，也为后来的人们提供了许多值得参考和借鉴的经验与教训。

当然，姐妹小组虽然解散了，同志运动的脚步并没有就此停止下来。从 1999 年开始，国内开始出现自己的拉

拉 BBS 和拉拉网站。咸丰年间（网名）在《大陆女同网站的历史及发展（2006 版）》中认为 1999 年是拉拉网站的纪元。她列举了几个当年创办的网站：拉拉生活广场、中国女同联盟、玉碧园、拉拉社区和拉酷，并且总结了这些网站的特点是“个人网站雏形”和“内容单一，以 BBS 交流为主”。而根据凌的回忆，1998 年麻雀（网名）在大陆建立了第一个拉拉网站——“拉拉生活广场”，在大陆的“碧海银沙”（网站名）有了第一个拉拉聊天室。1999 年由一对通过网络相识的拉拉恋人建立的“ET 千年之恋”更为综合，虽然总体比较偏文艺抒情风格，但是已经开始包含多个网页的内容。同时从线上到线下的网聚活动也出现了。2000 年 4 月，一路同行论坛在大陆最大的综合性论坛天涯社区建立，这个以同志话题为主的公共论坛成为了大陆同志网民最大的聚集地之一。而 2000 年以后，随着互联网的不断普及，一大批的拉拉网站出现，例如深秋小屋、花开的地方、阿拉岛等等。到 2002 年，咸丰年间统计并记录的拉拉网站达到了 30 多家。在这些大陆自己的拉拉网站发展的同时，上网的拉拉人数也在不断地增加。北京的拉拉开始出现每个礼拜六晚上集体上网聊天找人的情况。网上的活动也逐步发展出了线下的聚会与活动，有讨论会，也有到郊外的旅游活动。



另一方面，女同性恋者从同志酒吧中独立了出来，开始有了自己的活动空间。1999 年，第一家禁止男士入内的拉拉酒吧——枫吧——在北京秀水南街开业。枫吧的老板是一位公开出柜的艺人乔乔，网名猪肉大葱。乔乔于 1999 年“被”出柜，而于 2006 年以演唱歌曲《爱不分》而正式公开宣布自己女同艺人的身份，此事还被当时诸多网络媒体报道。

乔乔：当时（1999 年）我签的是天东的唱片公司，刚进拉拉圈没多久，比较年轻、疯狂，后来被《三联周刊》给登上了。当时老板就让我选择，一个是退出同性恋圈，一个是退出娱乐圈。那我就退出娱乐圈吧。你要让我当一个戴面具的艺人，那我宁可这辈子不出来。我就离开了。

在前文中已经讲到乔乔认为在男同女同一起聚会的同志酒吧里，拉拉在人数上明显很少，并“被逼到一个角落”，所以有了开一个拉拉专属酒吧的念头。

访谈员：你说拉拉原来在酒吧中受 gay 的歧视，是怎么一回事呢？

乔乔：也不是歧视。反正就是觉得拉拉消费低，拉拉人少，给拉拉轰到一个角落里。

访谈员：他们也不拉你们玩儿？

乔乔：不（拉）。

枫吧开业之前，分别在拉拉俱乐部网站以及华威八层做网络和实地宣传。北京西单华威大厦是北京一处较为有名的年轻拉拉（尤其以初高中学生为主）聚会地点。整个楼层的主题是美食天地，四周围有很多家卖食物的小摊位，楼层中部放置了大量公共的桌椅供人吃饭、休息。乔乔让酒吧的工作人员到这里发放广告传单。而拉拉俱乐部是当时较大的拉拉网站之一。

枫吧开业的第一天可谓盛况空前，乔乔回忆说开业当天来了 300 多人。



乔乔的歌曲作品《爱不分》

乔乔：没想到那么多人。第一天开业，我还在睡觉呢。当时想撑死也就 100 人吧，我那时的女朋友给我打电话，“你快醒醒，快过来吧。”我说，“干嘛呀？”，“你快过来看看，爆满！看都多少人啊！”。我说多少人也就 100 多个。她说，“你赶紧的”。当时也就晚上 8 点多吧。然后洗脸刷牙。进去一看，“噢！”当时我就劈了。怎么那么多人啊，300 多人。

但是半年之后，作为全天营业的纯拉拉酒吧，枫吧开始赔钱。所以乔乔把枫吧转让给了别人，自己留下 20% 的股份，并将枫吧的每周六晚上包下作为拉拉专场。其他时间段里枫吧则是普通酒吧。后来的一些拉拉酒吧专场也延续了这种经营模式，即酒吧老板和拉拉合作在一周的某一时段（通常是周六晚上）举办拉拉专场。而专场的收入也按比例分配给酒吧老板和做场子的拉拉个人。枫吧不仅为北京的拉拉提供了一个聚会、娱乐的酒吧空间，还自行举办了许多十分受欢迎、有人气的活动，例如枫吧开业当年即开始举办一年一度的京城四大帅 T 四大美 P 选秀活动，T 的反串表演以及 P 的“力大无穷”比赛等等。



作为中国第一家拉拉酒吧，枫吧在这十多年的时间里经历了两次关门和两次开业，也换了三处地方。秀水南街的“老枫吧”从1999年经营到2003年。到2003年4月，北京进入非典时期，酒吧生意一落千丈，乔乔本人也离开了北京，“老枫吧”正式关门。4个月后的2003年8月16日，随着中国在院的最后一批非典患者从北京地坛医院康复出院，非典时期基本过去，聚会活动回温。乔乔回到北京之后，于当年8月在北京工人体育场附近的烟斗吧开始包场，每周六晚上的“枫吧专场”重新开业。与烟斗吧“混搭”的枫吧专场从2003年8月一直经营到2009年下半年，2009年8月再次停业。这一次停业的原因，大致有三：

乔乔：因为我是有文化公司的么。这边要搞文化公司，这边要搞拉拉酒吧，又唱片、电影宣传，忙不过来，所以就暂停一下，想找一个更好的地方。

乔乔：因为拉拉酒吧现在让这帮小孩搞得恶性竞争。……我说，咱们（枫吧）先停一段时间吧。

乔乔：（枫吧跟中国娃娃酒吧从2009年6月开始合作）中国娃娃生意不好，想托我们带一带，结果把枫吧都带垮了。然后都分散了。枫吧本来还有一百多人，中国娃娃开了，这边50，那边50。呦，枫吧怎么人那么少啊。人不值当啊，以为全跑泡泡（另一拉拉专场酒吧）去了。哎呀别提了，中国娃娃是我最失败的一个合作。

这一次的停业时间也是4个月，2009年12月12日，枫吧专场才重新在簋街开业。作为拉拉酒吧专场，枫吧在其十年的运营过程中没有像之前的同志酒吧那样遇到过警察的干预。它能够顺利经营这么长一段时间与这也就是“有一定关系的”。

乔乔：哪个酒吧都被查过，枫吧没有，包括我们在里面跳脱衣舞什么的，找的那些可漂亮的



枫吧

法国女孩，在里面跳脱衣舞。因为都是女孩么，然后也没有人查。有人报警，就是别的酒吧恶性竞争，派出所直接把那个电话就给我们了，告诉你谁报的警。枫吧没有出过任何的（意外），所以才能干到十年。就是跟上头关系不错。在朝阳这边，关系都挺好的。

（谈到新枫吧地址）反正我一定要市中心，绝对不能离开朝阳这一带。离开朝阳我不认识人，公安局这边我也不行。所以我要找还是在这一带吧。

乔乔自己对枫吧的基本定位是为北京的拉拉提供一个娱乐的场所，我们也看到枫吧的出现和经营确实为北京的拉拉社区不断注入商业、娱乐和文化的因素。不仅仅是枫吧，在 2001 年前后的几年时间里，北京拉拉社区出现了多种发展方向。如果说北京姐妹小组是以社区组织、社会运动等手段推动社区发展的，那么在这种方式受到重大挫折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了商业和文化的推动力量。

2000 年，年仅 27 岁的编剧和导演李玉执导了她自己的第一部纪实风格故事长片——《今年夏天》，由潘怡和石头主演。

石头：2000 年（我）跟那个副导演见面，见面以后就商量那个（电影《今年夏天》），就听他讲干什么东西。当时并不是说耍我来演电影，我也没有想过我要演电影，因为我是拍东西的，不是演东西的。我记得我们是在电影学院旁边那个黄亭子酒吧跟副导演见面的。我就说那我给你介绍一些人吧，比如说我开一个 party 找一些朋友来玩，你看看谁比较适合演这个戏。他（副导演）其实也比较慎重，他不好先说就是要找你呀。后来我就给他们开 party，介绍了几个女生，跟他们见了面。见面以后呢，那个导演就跟我说，还是觉得我和潘怡演，那我一听好吧，那就试试吧。



中国大陆第一部女同性恋电影《今年夏天》海报



《今年夏天》剧照（左为石头所饰演的角色）



这部电影也成为了中国第一部女同性恋剧情影片，而这中间创作的艰辛和巨大的投入，石头只是轻描淡写般地讲到一些：

石头：我们演这个电影还是挺努力的，挺用心的，又没有一分钱。当时导演跟我们讲他们的苦处，就想创作一个很有意思的同性恋的电影。我们都觉得早就该拍了。早就应该做的事情，我们都支持你。他们说没有钱，我们说好没关系，钱都不是重要的，然后就开始做呗。然后我们就开始试戏，出一个小品大家来演一演，看看状态怎么样。另外还要找一些演员，别的演员。当时还选别的演员，就是大致的拍电影的一个过程。

尽管《今年夏天》从未在大陆公开放映，电影光盘也是在多年以后才获得发行，但是这部影片却在海外获得多项电影大奖。在 2002 年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上，《今年夏天》获得艾尔维拉·娜塔莉奖，这是第二个得到这个奖项的华人影片。第一个获得该奖项的中国导演是张艺谋，获奖片是《大红灯笼高高挂》。同年，在德国柏林国际电影节上，《今年夏天》获得电影节青年论坛的亚洲电影特别奖。

石头：其实后来这个电影能在国外拿到很多奖，在中国不能放映，这是我意料中的事情。当时在那个时候在那个时代，想都想得到么，这样是必然的，在中国肯定不能放映，在国外会拿奖。我们都参与了，肯定拿奖的，当时蛮自信的。当时我们大家参与这个事情，也不是为了要拿奖，就是觉得想搞一个好玩的东西。有的人可能喜欢这个电影，有的人不一定会喜欢的，我觉得众口难调吧。

2001 年 12 月，由张江南、杨洋、崔子恩等人在北京大学举办了第一届北京同性恋电影节。《今年夏天》与《东宫西宫》、《蓝宇》等一同参展。虽然电影节中途就遇到阻力而被迫取消，但为当时的社会打开了一点与同性恋电影对话的窗口。

卡斯特曾在他的《网络社会的崛起》一书中讲到，电视节目是按照所有观众的最低认知标准制作的。如果是电影作品还具有某种先锋性的话，那么电视节目所呈现的是更为接近社会现实的状态。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同性恋议题进入中国的电视节目能够更有力地说明这个议题的日益凸显以及社会公众对它的不断加强的关注。而



冷暖人生·同志爱人

正是从 2000 年开始，同志议题进入到了中国大陆的电视圈。2000 年 8 月，石头成为了中国大陆第一个在电视上公开出柜的女同志。石头作为大陆的代表与香港的陈鲁豫、台湾的阿哲（台湾晶晶同志书店的店长）共同参加了凤凰卫视的“一点两岸三地谈”节目，讨论了一些同性恋话题。2002 年凤凰卫视共制作并播放了两期有关同性恋的节目，《名人面对面》和《冷暖人生·同志爱人》。2001 年 12 月 20 日，在中国内地颇具影响力的湖南卫视《实话实说》节目推出“走近同性恋”专题，邀请李银河、崔子恩、石头等人与现场观众一起讨论同性恋问题。尽管有人认为，这些电视节目基本还是带着对同性恋的歧视和偏见，或者拿同性恋当噱头博取收视率，但同性恋话题在电视上的出现还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这确实能够反映社会公众对同性恋问题的观念变化。另外一个例证就是半年之后 2001 年 4 月出版发行的《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这本新版精神病诊断标准对同性恋的定义非常详细。同性恋的性活动并非一定是心理异常，由此，同性恋不再被统划为病态。这是继“去罪化”之后，同性恋的“去精神病化”里程碑。当然，书本中的“去病化”并不会立竿见影的在大众意识中产生效果。在同性恋从精神障碍诊断标准中被删去之后，还是有同性恋者因为性倾向被家人送进精神病院的情况发生。



由刘烨和胡军主演的电影《蓝宇》海报



《实话实说》“走近同性恋”

三．2004 年至 2007 年

对于北京乃至对中国大陆来说，发生在那个“最疯狂”的 2001 年的女同性恋文化节事件，对整个大陆女同志运动的发展无疑是一次阵痛。而在那之后的几年里，北京几乎再没有出现任何带有社会运动性质的小组。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了 2004 年。实际上，就在那一年，当美国的“华人性别研究中心”（Institute For Tongzhi Studies），一个由同志运动积极分子建立的、期望从学术途径切入和关注大陆同志运动和同志研究的组织，试图资助一部分中国大陆的男女同志前往香港参加当年的华人同志交流大会（前面已经提及此会）时，却发现连找到几个女同志都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据当时负责这件事情的闲回忆：

闲：（2004 年的性 / 别研究中心）正好有一笔钱，可以资助大陆地区。我负责那个项目。后来（我们）就发现，大陆男同志特别特别多，在 2004 年的时候就（已经有）非常非常多小组——几十个，可能，好多城市都有。但是女同志，居然就找不到一个！因为当时我们的资金可以资助 20 个人去，然后我们是想 10 个男生、10 个女生这样一个分配，然后男生就有好多好多人，我们得挑；然后女生，我们就找，根本都找不出来 10 个人。

然而，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一个如今为我们所熟知的名字——北京拉拉沙龙，却在 2004 年的年底“横空出世”。在今天的人看来，这或许多少增加了沙龙的传奇色彩。而这一段传奇的背后，却是作为沙龙的主要创建者——闲和安可的一段曲折的故事。

作为早年就参与北京同志活动、并在北美留学期间参与建立“紫凤凰”等女同志小组的积极分子，闲在 2004 年回到了中国。实际上，当她还在美国负责华人性 / 别研究中心项目的时候，闲就被当时中国大陆蓬勃发展的民间运动触动了。

闲：（当时）我看到男生那么多，因为包括从

这个项目我就发现，中国近几年的民间运动就是有了一个蓬勃的发展，有了非常多的契机。所以，不仅仅是经济，不仅仅是一些观念，包括这种公民社会运动也有了一个机会。当时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女同志似乎还没有这样一个机缘去行动，或者说还需要一点催化剂什么的，而它会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所以在 04 年的时候，我意识到，我觉得如果有什么人、什么样的一些力量，能够在这个时候做一些事情的话，女同志的社区的潜力会被激发出来。而从我在国外的一些经验和了解，其实在同志运动中，女同志的潜力是非常大的。……

有人说，其实女人更关心社会议题，……就比如美国的民主运动的时期，就比如黑人民权、妇女运动，好像包括和平、就是反战，还有环保什么的，女性的参与都是非常强烈的。就是说，女性好像更关注与一些所谓的社会更公平一点、或者说更和平一点的这些议题。……而女同志呢，其实女同志是女人，女同志又是更被压迫的女人，……除了别的女性被压迫的议题，她还有性倾向的这种压迫，而女同志一般在某种意义上会觉得更加激进，会有些女同志，就是因为这些压迫，她会有更强烈的反弹，她会有这种更强烈的欲望去改变这个社会不公平的地方。……不管怎么样，女同志，确实我知道是有这样的很大的潜能的。所以，后来在 04 年，我也是在决定自己要干嘛的时候，后来我决定回国，……回国要做一些事情，当时我是做了这么一个决定。

在做出回国为大陆女同志社区“做点什么”的决定的同时，闲也为自己制定了一个“远景规划”，以及更重要的，一个如何着手开始工作的近期目标。

闲：刚开始回国的时候想过（规划），我当时给自己的计划是 2 年到 5 年，就是：2 年的时



间把社区给它弄活跃，就是有很多人能出来做工作、做活动。然后2年之后，我会做一些社会上的一些议题，然后再做个3年。就是5年，这个在社会上的议题也会打开，就怎么说，打开一个局面吧，很多人就会出来做。那我就可以去做点别的感兴趣的事儿啊，什么的。具体什么感兴趣的，那时候也没有想，那时候只规划了5年。……

我是04年9月份回来，然后就做了很多准备工作，就像你做研究要做很多准备工作，才能制定你研究的具体计划，那我也很清楚，你要做点什么也不是你贸然做点什么，你要了解你所处的环境、你的对象、你的朋友是谁、你的所谓的反对者又是怎么样的状况，就是要知己知彼。所以，我开始几个月就感觉就跟一个研究者似的，会去拉拉所在的地方，任何的地方，然后去了解、去尽量多认识人、去跟她们聊、去了解她们的需求。

对于2004年的北京拉拉社区来说，几乎不存在任何现成的组织框架或者组织形式。在这种情况下，要想推动这个社区和女同志运动的发展，最重要的因素无疑是“人”。但就是这样一个寻找“人”的过程，却充满了困难与波折。

最初，闲找到了她在出国以前就曾有接触的一些“运动前辈”，试图听取他们的意见，并通过他们看看能不能联系到有可能与自己“志同道合”的人：

闲：刚回国的時候，就是有不同的人介绍，张北川啊、万延海啊，他们有人介绍的。其实刚回来的时候，在女同志方面得到的信息还是很负面的，因为很多人就说，原来在北京做的女同志这些（人），也有很多问题，致使很多人对这种同志运动都很失望，就是很难做，又有很多问题。所以，很多人都建议我不要做这个

运动；就是劝我说，可以做些别的运动，就是艾滋病啊比如什么的（笑）——因为艾滋病从NGO的角度来看，也是很有潜力的一个方向，男同志也很活跃的——但是（做）女同志（这块）没有一个鼓励我。

尽管没有获得很多鼓励，闲还是尝试自己从社区内部挖掘和寻找一些可能的力量。然而这似乎也并不容易。闲在回国后不久，就开始清楚地认识到存在于北京拉拉社区内部的各种阻力：一方面，虽然她接触到一部分对同志运动比较积极、并愿意参与到运动中的人，但是这些人在理念和能力上似乎与闲所想象和希望的存在着比较大的差距：

闲：（当时）我接触了一些人吧，她们还真是没有对女同志运动的概念，所以也不知道在干嘛，她说她要做，但是后来接触下来，就觉得这个人，其实也挺不靠谱的（笑）。另外有的人，他们好像彼此之间会诋毁。然后，我因为谁都不认识，我也搞不清她们（相互）诋毁的原因是什么，是个人恩怨啊，还是合作不愉快？不愉快的原因是什么？所以我也不知道。后来我的策略就是，我每个人都接触接触，然后看看呢，我想做的东西和哪个人……理念会比较相近。然后我会选择我的合作伙伴。但是我尽量就是她们让我帮忙参与的，我也都会帮忙参与，但是有些底线——我可能还是只会做公益性的，不是商业的。因为有的人，我后来发现，有些人是想做商业的活动，但是我本身对商业太不感兴趣了，然后也不是我想要做的么。所以，那一些认识的人，后来也都没有继续合作。

当时也有通过万延海和一些男同志的介绍，去认识一些比较激进一点的、敢去做一些活动的女同志。但在04年我接触的一批人中，我觉得大家对社会运动的想象完全不一样。有的人就会想得挺逗的，她确实想做一个活动以此为

她的事业，但她想的事业，比如说有的人从商业的角度，她想做一个会所，然后她可以（营利）。（访谈员：就是乔乔吗？）哦不是乔乔，乔乔她是做酒吧的，其实我对乔乔还是挺欣赏的，但当时我接触的那些人，我是谈得很清楚我是会做非营利的，我是会做社会运动这种致力于社会变革怎么样的，我会谈得比较清楚。当时找合作人的时候，有的人她不是很清楚，她也想做，但是她想将来发展成一个商业运作的、然后能成为一个企业的，其实这个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不好，因为同志商业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领域，但是因为我不认为我自己会做同志商业，所以我们只是合作并没有真的在一块做，所以很难。

另一方面，对于大多数只在网络或者酒吧现身的拉拉而言，无论是比较年轻的，还是更为年长些的，参与同志运动对她们来说，如果不是“充满危险”的，至少也是件看起来遥不可及的事情。

闲：我 04 年回来吧，当时接触的一拨儿人，我个人感觉，对做 NGO 的工作还是有一定阻力的。因为要不就是小孩儿，她们只喜欢、可能感兴趣的就去酒吧喝酒，看漂亮女孩子、谈恋爱什么的。那我认识的年纪大一点的，可能 30 岁左右的，有稳定的工作和生活的，她们对做运动也不是很感兴趣，因为对她们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挣更多的钱，你知不知道，跟异性恋没什么区别，要有房有车，要过经济上稳定，情感上也稳定的生活。反而，那她想在情感上稳定，她不想参加太多的社会活动，怕女朋友认识的更多的人，可能会影响她们的关系（笑）。对她们来说，这种人做女同志运动，把这种议题一摆到社会上讲，对她们来说更危险。她们就是，原来别人也不知道她是女同性恋，她们就……（访谈员：暴露了？）对，（所以参

与运动）她们不会有太多的获利。反正我刚开始接触的一些人，就是这样的想法。

我原来认识一些北京的拉拉，后来跟她们吃过一次饭，然后发现她们完全不是做运动的人。因为她们就是典型的、和我在美国看到的留学生一样——就是大部分留学生追求中产阶级的生活，就是有房、有车然后有女朋友，过上幸福生活——这也无可厚非，就是非常自然。但是这样的人，是很难去（做运动的）。我觉得这样中产阶级的人，自身是很难去追求社会变革的。但是就像那天那人说的，中产阶级的孩子们，就是下一代们，他有时候会反省这种生活方式，然后他会去追求，就说他会去追求变革。当时我遇到的这些人，很难说她们的父母是中产阶级，而是她们自己有可能变成中产阶级，所以相当多的人，就比如说白领，或者追求变成白领的，然后她不会关心社会和政治化，她觉得社会和政治化其实对她的身份会是一个威胁，因为可能会妨碍她的工作、更好的工作、或者更高的薪水怎么样的。所以她们有的人甚至会很反政治、反社会运动，她觉得搞什么搞，怎么样的。

运动前辈们的质疑，“缺乏运动概念”的积极分子，还有大多数根本缺乏参与意愿的拉拉，面对这样的情形，闲决定先从参与拉拉社区的活动开始，慢慢尝试与不同的人合作，并在这一过程中寻找有可能与自己抱有同样想法的人。

闲：所以后来我就想，你别说，做这个东西可能还真是需要时间的。你还是要去寻找更多的人。后来的合作者，就是我原来也根本不认识的人，后来一点一点在北京慢慢寻找，慢慢认识。我后来又认识了很多那么，就是从这些人中，我觉得要去挖掘一些我觉得（和自己的理念）比较相似的人。



2003 年花开网站的页面

比如 2004 年，闲找到了她在国外时认识的、当时国内最大的拉拉网站之一“花开的地方”的站长，上海的想起，并请想起帮忙推荐一些人。据那时还在“花开的地方”做版主的追命回忆：

追命：因为 04 年 10 月，我正好去了一趟上海玩，就顺便见了一下我们的“老大”想起。想起就跟我们说，有一个某某人（指闲）现在回来了，想做一点什么事，请她帮着联系。我不是正好也是在北京吗？然后她联系的这些人，就可能跟闲见个面，然后看能不能一起做什么事。

此外，闲也积极地与一些在北京的女性主义者展开接触和交流，并尝试组织一些拉拉与女性主义者共同参与的讨论活动。而在这样一个些许漫长的“寻找”过程中，最为丰硕的成果之一，便是北京拉拉沙龙的诞生。

闲：后来第一个合作伙伴就是安可，做沙龙的安可。然后我们就一起做了一个沙龙。（访谈员：和安可是一拍即合的吗？）也不是。当时介绍人就一起谈，然后每个人都会谈自己的一些想法，然后那时候我发现，反正这些人中有的人她们原来就认识，可能原来也合作过，但是好像彼此意见也不是那么一致。而且我听到一些警告（笑），一些非女同志的警告，说女同志这块做不出来。当时是有一些人，我就觉得跟安可的合作还是我比较想做的。然后安可行动也挺快的，所以我们就一起做了这个沙龙。

实际上，在 2003 年间的北京拉拉社区也曾经有过一个类似沙龙的下午场，那是由一个名叫 apple 的拉拉在雅秀路附近的一间 GAY 吧里面做的，总共大约持续了有半年时间。据曾去过这个下午场的安可回忆，这个沙

龙的主人 apple 虽然“人很热情”，但由于沙龙缺乏“吸引人”的讨论主题，后来便逐渐流于普通的聊天交友，结果慢慢地去的人就变少了。

有意思的是，从闲和安可这两位沙龙最主要的创始人的回忆来看，似乎从一开始，她们对于沙龙的理解与期待就是一个分歧与共识相互交织的过程——闲始终明确地保有她想要做女同志的运动以及社区外的公共倡导这样一个初衷：

闲：沙龙是 11 月 21 号开的吧，04 年 11 月下旬，然后那个时候我很清楚就是要做一个小组，因为有一个小组，有不断的人，这样就可以做更多的事情，所以就不会说只做一个沙龙或者说一件事。因为像我刚才说的，组织对我来说也只是一个形式，一个工具，我真正想做的是做一些改变，可能是改变同性恋者自身——因为当时很多拉拉也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还是会有身份认同问题、什么家庭压力问题种种这些问题，就是拉拉自身还是需要相互帮助的——那另外一方面就是拉拉之外的人群，就是对同性恋歧视也好、不理解也好的社会公众，整个社会的态度，就这些是你需要改变的。

而安可则更多的是希望在一个不同于酒吧的和商业的环境中做一个主要以成熟拉拉为主体的聚会沙龙：

安可：那时候就想做一个下午场。当时酒吧么，就有一些营业的酒吧嘛，都是小孩啊，就很喧闹，很嘈杂，一个娱乐性很强的这样一个地方。可是，那时候闲从美国回来，然后见到闲，我们就觉得，可能，这样一个群体很少能浮出水面，可是呢，那时已经认识【……】，她们有一个很强的聚会的愿望，互相彼此交流，出于情感的原因，那酒吧确实不是很适合，然后作为一个项目，那时候叫“成熟拉拉下午场”，然后大家把一些同志议题、同志文化的东西，作为一

个交流的平台，来，就是，能够释放一些压抑的情感吧。

其实我最初做沙龙真的没有什么想法，我的想法就是我觉得有这样一个平台，大家有一个沟通、交流这样一个平台，这是我最初的一个想法。至于其他的我没有想。……我到现在也没有其他的想法，哈哈（笑）

访谈员：是不是你们俩（指闲和安可）对这个东西设想的形式是契合的？

安可：因为你要知道，就是……对，形式应该是契合的。至于形式的契合，就是说，我需要这样一个平台，应该有这样一个平台，去帮助那么多人，那她也需要有这样一个平台，因为你要做——我个人想啊，也许她是做工作，因为她知道国外的组织发展是一个什么样子，你必须要从社区开始做起。那社区要怎么做？从这些简单的聚会啊，一些活动开始。那我觉得这方面她应该比我很有经验，因为她看了很多么。至于我的话，我很简单，就是想做一个平台。

而或许追命后来的陈述能够把当时事情发生的脉络描绘得更为清晰一些：

追命：拉拉沙龙是 11 月 21 号第一天吧，还是 20 号呀？那个沙龙是她（指闲）跟安可一起刚开始做的一个活动。因为刚开始你不认识人的时候，你没法做小组呀，你都不认识人，都没有人，你一个人怎么做小组呀。对所以做一个沙龙就可以认识好多社区的人。所以开始做的是社区活动。不过安可也挺牛的，据说那会儿闲还在考虑怎么做，安可就给做了。安可真是那种她说要做一个什么，她就给做了一个，挺快的，做事，就那感觉。她就拉人过来就把这事儿给办了，可快了。



就这样，2004 年 11 月 20 日的下午，由闲担任主要策划和主持人，安可负责主要的联系、组织，另外像凌和兰妹等一些志愿者也积极参与，第一场拉拉沙龙就在当时的枫吧做了起来。从此以后，沙龙就定在了每周六的下午举行。根据安可等人的回忆和当时所留下的一些记录，第一场拉拉沙龙的主要话题叫做“拉拉艺术创作”，同时邀请了著名的艺术家石头、年轻的影像工作者铅笔以及一位名叫汉娜的国际友人作为沙龙的嘉宾。此外，第一次沙龙还邀请了时任中国妇女研究会理事的荣维毅老师致开场词，同时还邀请了一些以前比较著名的女性主义者参加。

安可：（嘉宾）大部分是我和闲吧，我们两个联系的。主要就是说我们认识的人。然后我们觉得，她们曾经支持过女同，以前不是九八年跟她们做了一个同性文化节（注：指 98 年的全国女同大会）么，那时候我就了解一些人，通过她们的口里面说到，那时候怎么怎么样。那这些人呢，她们第一支持同志，第二呢，本身她们（有些）也是同志，我们希望她们参加我们第一次沙龙。然后剩下那些人，那就是社区里面来的人。

在这次沙龙活动中，汉娜主要介绍了美国舞台剧《阴道独白》及该剧在上海的演出情况，石头介绍了当时由她主演、崔子恩执导的拉拉影片《石头和那个娜娜》，铅笔则介绍了自己当时仍在剪辑中的有关拉拉的一部纪录片的情况。另外闲还介绍了拉拉舞台剧《L 私语》的构想等。

如果对一个沙龙来说，邀请嘉宾和策划主题讨论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么另一件同样重要的事情则是保证足够数量的拉拉光临现场以及恰当地接待她们。安可曾回忆说，沙龙的第一场、包括最初的几场都来了很多新的人，但她们并不是“找到组织”的欣喜感觉，相反不少人实际上是更多地带着迷惑、紧张、小心谨慎甚至说是充满矛盾和犹疑的心情来到沙龙的：

安可：第一次去的有五十多人么……实际上都是拉。因为是第一次，没有什么经验，大家比较秩序有点乱，聊天或者怎么样，互相怎么样，真正我觉得当时那个话题没有做起来，也说得不是特别透。也可以的，因为你没有什么经验嘛。因为是第一次，人也来的很杂，很多。……其实沙龙有时候话题仅仅是一个方面，因为只



北京拉拉沙龙



北京拉拉沙龙

有一个小时话题的时间。实际上更多的时间是你需要跟来的人她们的一个沟通、交流。那块儿的话呢，对很多人是很需要的，因为很多人是第一次去一个陌生的场地，她并不是来参加这个讨论的……她来看看。（所以）需要一个平台来交流，需要有人来接待她……因为很多人都是很迷惑么，有很多时候在沙龙门口转了好几圈她不敢进来。……（访谈员：就是你在沙龙遇到很多人，就是来了这个地方的时候，她们对她们身份还是有纠结、有困惑的？）非常非常。她们很紧张。来的时候很紧张。她们给你打电话，包括来了以后，那种……有时候我想，我那时候也是从那个时候过来的，就是你谁都不认识，你去一个酒吧，真的是，有时候你去一个同性恋酒吧，你就跟做坏事似的。然后看看是不是有别人在看着你或者怎么样，你就是非常充满矛盾，甚至是说充满担心、有的人甚至是恐惧，这样一种状态。你来了一个新的地方，必须要对一些，有些人要去跟她们非常、很好的沟通，很好的接待她们，让她们能够放松。这个，我想这几年沙龙有一些人她们能对这个认同的话，其实这点是很重要的。

第一场以及接下来的几场沙龙，基本上办得比较成功，也正是在这些基础上，沙龙逐渐形成了它最初的组织和讨论形式。从人员上看，主要由闲负责议题策划和主持，由安可负责联系场地和组织协调，兰妹则负责售卖20元一张的沙龙入场门票以及其他接待工作。还有不少志愿者参与其间。此外，在第一场沙龙开过没两天，由凌搭建的沙龙网站也做好了，它主要用来公布此后沙龙的每次活动信息。据安可和闲回忆，除了沙龙网站之外，沙龙的活动信息也会在当时天涯的相关版面和一些拉拉网站（如女人香等）以及许多QQ群上发布和传播。至于沙龙的讨论形式，基本上最初的一年多时间都是先放映一部与拉拉或同志题材相关的影片，然后由主持人与所邀请的嘉宾共同引领一段主题讨论的时间，在此之后的时间，则供来沙龙的人们进行自由的讨论、交流或

者交友等活动。由于闲在沙龙的最初两、三年时间里一直担任沙龙讨论议题的主要策划人，而她本人又比较感兴趣于同志文化等相关的内容，因此安可回忆说，这类主题讨论还是吸引了当时的许多年轻大学生的热情参与。此外，沙龙的早期也曾邀请过一些女性主义者到沙龙进行讲座，但这种结合似乎并不太成功。

安可：我跟她也还有一个基本的相像，就是想把女性主义的，中国女性主义的这些人，把她们和这些东西、跟女同结合起来，然后呢通过这样的—一个结合，让女性主义来了解女同，因为中国女性主义者其实她们这些人是跟拉拉是分开的，（但是）实际这个东西是不可以割裂的。……可是我后来发现，很不实际。这个不实际是什么，就是说：第一，就是没有一个公共的讨论空间来支持你（女性主义者）来讨论这样一个（女同）话题的。她们也没有试图想把她们的女性主义这方面的东西来跟这个结合。因为没有这样一个大的气候的背景环境能够支持她们，或者（让）她们能够看到一些支持的希望，所以她们没有一个特别强烈的愿望，或者主动的精神去讨论关于女同问题。这是一方面。再有一个我就认为，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讨论过（拉拉的话题），脑袋还没想好，……（所以）谈了几次就没有再谈了，谈也是基于社会性别和TP角色这些东西。

当今天的我们尝试追寻着当年那些蛛丝马迹去想象和感受沙龙的时候，也许我们的脑海中所浮现的是一个充满了文化或者说文艺气息的浪漫场所。而实际上，“风雅”和“文化”也的确是安可和闲对于沙龙最初的设想。

安可：从最初的时候，说到话题这一块，我的特别特别理想的一个想法就是，我希望这个沙龙可能就是，闲是从同志文化这个角度，我也是希望它可能更风雅一点，更文化一点。当时我买了很多的书，放在这儿，会有人来看什么



的，那时候放过一些书。（访谈员：在枫吧？）对，她那有个壁柜似的，壁柜可以打开放一些书。然后我还想放一些音乐，放一些不管什么古典的、流行的，音乐在那放，刚开始的时候，就相当一段时间。我觉得可能这样一个沙龙需要一些，我想请一些人来表演，这个表演的话，可能是我想请一些独唱的演员来唱歌，请一个弹琵琶的、扬琴的一个小孩，拉小提琴的。然后后来呢，因为这些人他们是需要费用的，这块费用我也只能理解成售票，找人也是一个麻烦的过程，而且有的人叫他们到酒吧做一个这样一个层面的表演，好多中国人她也不太能接受。后来就慢慢的取消了。没有必要给她那么多钱做这个表演，是不是大家需要，后来我觉的作用不是太好，就不再……（访谈员：刚开始其实是有讨论、有表演、还有一个大家聊天的时间？）对，弄得挺花哨的。后来想想可能成本耗费太高了，精力耗费太大。

根据闲的回忆，沙龙在一刚开始倒是吸引了一些拉拉，因为之前没有这样的一个地方，许多人会怀着好奇的心态来看看。但是当沙龙举行了有半年时间的时候，人数变得很少，以至于到 05 年的初夏时候由于人少消费低沙龙从枫吧搬出来。追命对于第一次参加沙龙活动的回忆似乎能够让我们之前描述的浪漫风雅之后，也看到当时年轻的拉拉沙龙在初级阶段中表现出来的随意与散乱，甚至显得有点迷茫、也有点尴尬。

追命：拉拉沙龙当天的活动是这样的。当天的活动是如何交女友。我的那个朋友说，让我去听一下，告诉她如何交女友。……后来我就鼓了一下勇气，去了一下拉拉沙龙。

访谈员：这是你第一次去拉拉沙龙？

追命：对。……然后结果，我去了沙龙，这太失败了：那天吧，就说是教你如何交女友，我

就问安可，如何交友？结果安可跟我说呀，要怎么着人家、怎么着人家呀，很有——而且很不适合我。

访谈员：为什么？

追命：因为她说，你要跟人聊天呀，你要跟人那个、去很好地照顾人家。我一听，这我又不太会说话，然后，那个……她反正说了好几个方法，我觉得都不太适合我。就是很不靠谱，我觉得。然后发现沙龙这个交友活动，主要是安可说话太不靠谱了。

访谈员：谁讲的？

追命：我不知道是谁讲，我去的时候安可是一直在那儿，闲还没在呢。我就是问安可，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后来安可就开始跟我说呀。闲可晚才到呢。

访谈员：那个时候沙龙不是每次有一个主题，然后就有一个人来讲？

追命：好像那个我后来才知道，那个主题是四点以后才开始的。我当时是两点，开始的时候



2010 年 11 月 北京拉拉沙龙六周年庆祝活动

就去了。因为我当时也不知道，第一次去。它开始是放的片子，好像那次放的是《时时刻刻》？

（笔者注：其实这里有一个记忆误差，实际上那一次是 2004 年 12 月 18 日，放映的是《阴道独白》。）像那会儿可文化了，就先放一个片子，片子都还可那个什么（指比较文艺）了。

其实，被大家看作是“沙龙女主人”的安可自己也承认，最初的沙龙只不过是一个“非常非常初级的阶段”；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最初的那个沙龙恰恰也是一个单纯的“集体”：

安可：我觉得，那个时候的发展，更多的是个人的东西，就是你的那种热情，你的那种……啊，或者说一些很简单的东西，也许可能某种程度会感动你周围的人，她们也会愿意为你做一件事情去不计任何报酬的、或者说是去愿意花一部分时间，去给你一起来做这件事情。我觉得那个时候，其实，沙龙……就是一个集体“热情”的这样一个成果吧——个人加集体。

当拉拉沙龙的形式和风格在自身逐步的发展中确定下来之后，从 06 年开始，沙龙逐步开始稳定的发展。沙龙的另一个主要的志愿者和议题主持人，宝贝猫，就是在 06 年沙龙整体固定之后进入了拉拉沙龙。她这样来形容她印象里面的沙龙女主人安可和她的沙龙。

宝贝猫：安可这个人的风格，有一点点像英国的乡村主妇，很安静，很闲适，然后有一点点文雅，但是不高深，不会让你觉得很沉重，应该是这样的一种下午茶的一种风格。……（以前的沙龙是）那种很闲适、很宽松、居家的那种感觉，……一种居家的感觉，就是虽然安可是在一个很开放的空间里，但是很多人会觉得那个地方像是一个家庭一样，我来了、我走了，我很轻松。……就是那种感觉，我来这，比如说，我来了以后我什么话也不说，也不会有人理我。

我约了朋友，我在这等。然后我不约朋友来了，碰见‘哎，你也在这’等等。也许我来了以后，忽然想起你来，给你打个电话，‘你今儿来不来，我就在哪呢’。对吧，这样的一种感觉。

访谈员：那你觉得酒吧和沙龙做一下比较的话，觉得沙龙有什么特别的么？

宝贝猫：清新一些。……而且我觉得，……人还是这样比较受环境影响吧。你总是在晚上、在昏暗的灯光下，躲在一个小角落里，你还是觉得自己是少数，觉得自己不是很阳光。但是你下午坐在一扇大玻璃窗前，坐在大庭广众之下，这种感觉会好的多。我印象中就是说，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四十多岁的、尤其是有很多拉，实际上是有家庭的，这些人你让她们去泡吧，她就觉得危险性很大，她可能更愿意在下午我逛商场，我在一个商场里的这个环境里出没，即使我被人家看见，被人家问我干嘛来了，难道我不能约个朋友说话么？所以她就应该说没有这方面的压力。感觉上比较安全一些。大家都是在阳光下见面的人，感觉上比较安全一些。

时至 2004 年冬天，尽管沙龙只是在初级的阶段，但是几个月的积累也让闲看到了开始做同志小组和组织同志活动的可能性。而必要性的问题已经被华人性 / 别研究中心的经历解决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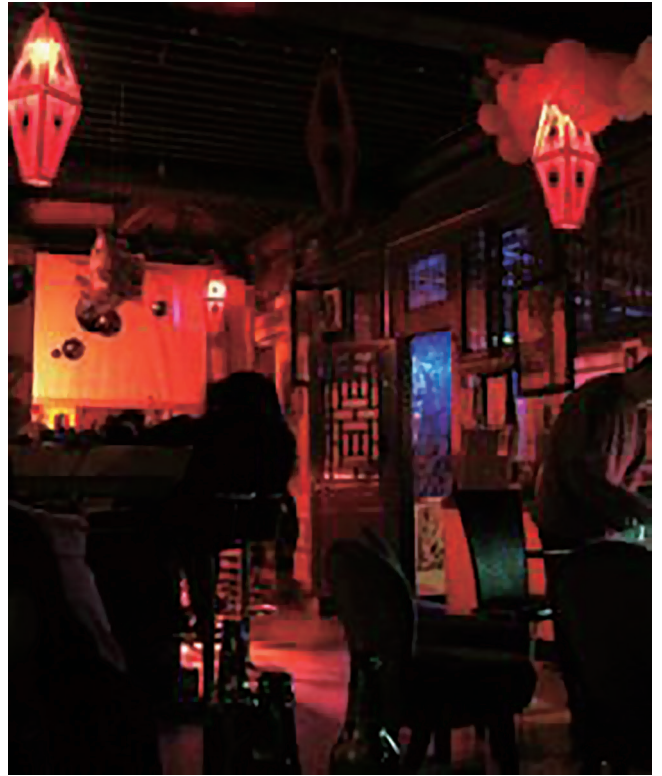
闲：没有女同志，没有女同志组织，你知道吗，也找不出女同志的人去参加这个大会（指 2004 年香港的华人同志大会）。当时我非常吃惊，因为我知道之前的（北京）姐妹小组是非常活跃的。但姐妹小组之后，看起来是一潭死水，就是在同志运动的角度。当然当时我的了解还是有限的。其实姐妹小组后来还是有人做过努力，只不过整体上，当时女同志运动在中国大陆的运动发展还是比较缓慢，也不是很顺利。……



后来我就想回来做同志运动这部分，我觉得当时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我觉得是往 NGO 这个方向发展的，就是当时那几年，就是 04 年，那个阶段是个挺关键的阶段，是个机会，我觉得是潜力非常多的时机。女同志这部分是比较空白的，我觉得只要是有些推动就能做出，很好的发展。它对我来说也是挺挑战的，但当时我似乎觉得我回来要是做这方面的事情，还是会有很大的、可为的空间，能做出很多东西来。对，所以我就决定，就回来了。

2004 年 12 月，在拉拉沙龙运行一个月之后，闲开始正式推行她组建拉拉小组的计划，在北京姐妹小组解散之后重新采用社会运动的方式推动北京拉拉社区的发展。12 月，闲在“天涯”上发帖招募拉拉小组志愿者。因为当时小组尚未建立，所以在这篇帖子中闲表达了想组建一个拉拉小组、聚集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志的意向。2005 年 1 月 21 日，这个小组的成立会议在当时正准备开业、日后极为火爆的拉吧——西厢房酒吧召开。西厢房酒吧是北京第一家非专场形式的全天候拉拉酒吧，它的老板是闲在美国时认识的朋友。通过这层私人的关系，闲为小组的第一次会议找到了会议地点。有大约 20 个人参加了这次会议，有闲在美国认识的一些朋友、在北京认识的一些有兴趣参加组织的拉拉、以及在网上看到闲发出的帖子“慕名而来”的人。小组核心成员之一的追命后来讲到她为什么会有参加这个小组的想法：

追命：那个时候我真的也没想要做那种宏观上的事儿，（我）不是那种人。所以 04 年 10 月份的时候，我就把想起（人名）想要引荐我认识闲的事情给拒绝了。后来（2004 年）11 月份的时候，特别巧，我大学时候的女朋友回来找我，说想跟我一起住。但是我问她想不想跟我和好，她说她不想跟我和好，只是想跟我同住。因为她刚刚跟她的男朋友分手，心情特别不好，就想让我陪陪她。然后我挺生气的，我就问她为什么我俩不能在一块儿。她说因为她受



西厢房酒吧

不了偷偷摸摸的生活。（我）受大刺激了。然后我就开始想这个事儿应该把这个社会改变一下，而不是原来，我觉得，俩人好就成了。工作好，生活好，什么事儿都好，就不用往外跑呀，什么的。就跟大多数拉拉的情况是一样的。之前我一直是这样的。后来这个情况实在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不是因为这个工作也好，什么也好，就能真的怎么着的，我觉得这个实在是，需要改变一下的。但是偷偷摸摸这事儿，不是一个人的能力能够改变的。一个人是改变不了的。你不觉得吗？后来，她（闲）不是号召做那个小组吗，我觉得这是个办法。

在这次的会议上，大家讨论决定了小组的名字、宗旨，也热烈讨论了想要做的事情。

闲：那次会议就大家一起讨论说这个名字叫“同语”。因为它是第一次会议，第一次会议你不能讨论具体的一件事，而是要讨论大家想法、看看大家想法、梳理一下大家想法，看大家想干点什么。当然这个小组如果有名字的话、有一个共识的话，是什么，所以第一次会就是讲这些。第一次同语的会议是有20人参加，大家七嘴八舌，真的讨论好多大家想做的事。我印象最深的是杂志，很多人想做杂志，20个人中好像有一半的人都想做杂志。……而从我的角度，我当时一直想做一个整理女同志资料、文化和知识（的资料库）。

追命：（访谈员：你还记得那个名字是怎么起的吗？）就是政法大学的一个大四学生说叫同语吧，然后她说同语音谐同女嘛，真是她说的，然后大家都觉得挺好的。她真是就这么说的。（访谈员：除了取名字、大家说自己想做什么，还有其他什么环节吗？）当然也有，比如说这个组织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为什么要成立，为什么人服务，公益的。但是当时应该没怎么定，这是后来闲跟另外一个孩子，她们俩好像最后定的稿。因为当时没有写成文字，当时只是大家在那儿说嘛，说想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包括宗旨，好像也是。宗旨（即平等、多元、和谐）好像是闲定的。然后要做什么。

依托当时已经建立而又急需扩充内容吸引人口的拉拉沙龙网站，拉拉资料库开始了初步的建设。同语的热线于2005年1月成立大会之后也很快就开通了。尽管通讯工具本身已经发生了变化（从BP机到小灵通、手机），但是对于热线形式的运用在北京姐妹小组和同语的行动中是一致的。闲用她当时一个接听免费的小灵通作为通讯工具，在每周拉拉沙龙举行的时段和地点，由她和志

愿者接听热线。同时举行了一些培训活动，对接听热线的志愿者进行热线咨询和同志知识的培训。之后，同语的例行会议每月一次。但是刚开始的时候，同语没有自己的办公地点，每次都需要使用北京爱知行研究所的会议室开会。关于最初的几次例行会议，追命还略微提到一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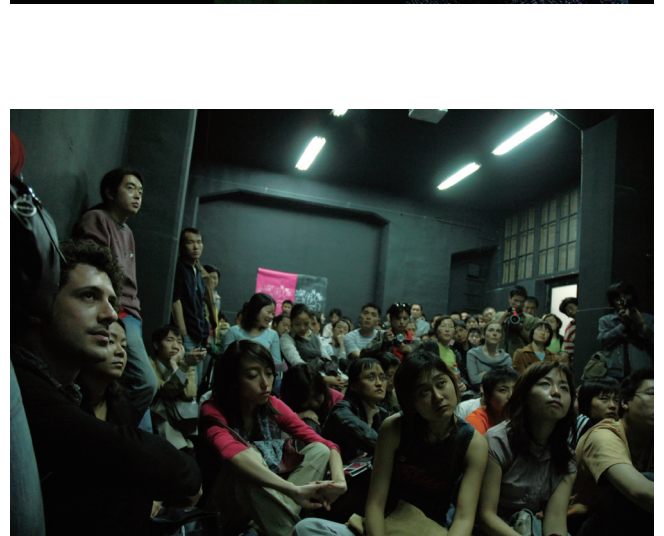
追命：那个时候1月份成立完，2月份好像也开过会。但是那次开会也是大家说说想做什么，还在说这个。然后后来3月份就是（热线）培训了。

作为一个拉拉小组，同语参加的第一个较大型的活动是2005年4月，崔子恩、万延海、杨洋、朱日坤等人在北京大学举办的第二次同性恋电影节。虽然并不是电影节的组织者和主办方，但是当时刚刚成立不久的同语还是动员了一些志愿者到电影节帮忙，比如宣传、参与观影、卖票等等。闲还被电影节邀请作为电影节女同论坛的嘉宾。跟上一届的电影节情况类似，这次电影节也是在放映了半天之后遇到困难。电影节最初的电影放映地点选在了北京大学的百年讲堂里，电影节开幕、电影开始放映的半天之后，一位在百年讲堂工作的电影放映员，以“影片有问题”为由向校方反映情况，北大也旋即叫停了电影节。而与上一届不同的是，这一次的电影节随后转移到了北京798现代艺术区的一个艺术工作室继续进行。也许这是有了上一届经验的电影节组委会的“第二套方案”吧。

2005年5月同语做了第一次志愿者招募，这一次的招募既是为了同语核心成员 Sylvia 申请到的爱知行的一个暑期学生调查项目，也是为了计划在6月举行的全国女同社区工作交流会。这一次的交流会与爱知行所举办的男同会议同期举行，拉拉大会的会程有两天。此次会议的目的一是联络全国各地的拉拉社区活跃人士，讨论一下目前大陆的女同社区现状以及大家能够做些什么事情，二是促使各地建立起一些女同小组或者女同组织，所以可以称作是一次以联络为目的的会议。这也是与



第2届北京同性恋电影节海报



第2届北京同性恋电影节



第2届北京同性恋电影节

1998 年女同大会的不同之处。1998 年的女同大会对于参会人员的身分并没有限制，而这一次交流会的参会人员都是各地拉拉社区中的运动活跃分子（Activist）。来自大陆各地以及香港、台湾的拉拉共 40 多人参加了这次会议。

追命：当时其实也没有什么社区活动。北京当年的姐妹小组也解散了，好多人都找不着。闲就从她之前就认识的人里面找了一些人请他们过来，也请男同小组帮着联系了一些拉拉。这样全国各地的零零星星都有一些人来，黑龙江的，西安的，上海的，成都的，广州的。另外还请到了香港的 Connie 和台湾的王苹。外地的这些人里面有一些是版主，一些大网站的版主，比如深秋小屋的那个东东；有一些是开同志酒吧的。因为当时全国各地都没什么活动也没什么小组，所以就更不用说小组的发起人或者活动分子了。另外还有一些就是男同志组织推荐的拉拉志愿者。

作为又一次全国性的会议，交流会还是需要面对费用的问题，尤其是外地到北京参加会议的代表们的费用该如何落实的问题。同语在 2005 年至 2007 年之间的各项开支费用主要是依靠小额的个人捐款和一些向妇女基金会申请的项目经费。前期的个人捐款主要来自闲自己和她在美国时认识的一些朋友。国内的捐赠主要来自机构和项目，例如张北川的《朋友通讯》在 2005 年向同语提供了小额资助，爱知行也支持了小组的部分日常运作，包括办公场地的使用。为了替交流会寻找外地参会代表路费来源，同语第一次向国外的基金会申请项目资金，由爱知行提供免费的资金代管。最后申请到的小额资金加上爱知行一部分的会议经费共同解决了女同交流会的费用问题。

在全国各地几乎没有拉拉小组和社区活动的情况下，这次联络性的全国会议带来了一定的成果也留下了一定的遗憾。

追命：会议主要就是想看看大陆的女同性恋能做点儿什么，讨论可以做的事情。另外也是想号召号召大家，加强一下彼此之间的联系。其实好多时候，开会的目的，是想促进一些人之间的联系，社区的拉拉的活动，或者小组的成立。比如后来想起（人名）回去成立了女爱小组，于是（人名）他们的小组在那前后也开始了组织活动，算是那次大会的收获吧。……不过开完这个会以后还是有好多参加会议的人就找不着了，不见了，没有联系，也没有了回音，也不知道哪儿去了。

根据闲最初的想法，要先在北京做一些成功的事情，再将经验逐渐分享到全国各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同语在其成立的第一年所筹办以及参与的活动具有多样性的特点。在热线、电影节、全国性会议之外，还有健康调查、夏令营、文化节等多种活动。

2005 年 5 月同语的志愿者 Sylvia、邝全等人获得了爱知行研究所暑期学生项目的小额资助，决定对北京拉拉做一次较为系统的健康调查。调查的主要方式是用问卷收集数据，并对数据进行统计性分析。从 7 月 22 日到 8 月 28 日期间，一共获得 215 份实地问卷（问卷主要在每周的拉拉沙龙和酒吧进行发放）和 816 份网络问卷。基于这近千份问卷获得了十分重要的关于北京拉拉整体情况的一些参考性数据。较高的吸烟率、较低的安全套使用率和妇科检查率、较大的心理压力是这一次调查所反映出的情况。11 月份最终的调查报告出炉，后被上传至同语和爱知行的网站上。

2005 年秋天，闲和爱白的负责人冰蓝合租了一套住宅，作为同语和爱白的办公室。而同语和爱白的合作还不止于此，从 2005 年暑期开始，同语便与爱白一同参与了大学生夏令营的举办。大学生夏令营面向全国公开招生，每次的营员在 20 人左右，而对营员的身份并没有限制，只要对同志议题感兴趣的大学生都可以报名参加。对于非同志的报名参加是非常欢迎的。每一届的夏令营都会



有一个主题。05 年的第一届夏令营主题是对同志友好的校园环境。

闲：第一届好像是怎么建立一个对同性恋友好的大学校园环境，那一届就有一半的非同性恋来，有一些学生社团的人。他可能在社团中搞活动的时候遇到过这样的（议题）。做研究的我还真不是特别清楚有没有人来，可能当时不太倾向于做研究的参与这个，因为更多的它是校园活动。然后第二届（2006 年）它是讲同志和心理学，就是主要讲心理上的（身份）认同啊，还有心理学在同志的议题上的（情况）。第三届（2007 年）是文化艺术创作，就是做同志的艺术创作，后来那个创作之后又办过一个小小的作品展览，那届其实办得挺好的，冰蓝是主要策划的，我自己也做过一两次的培训老师。

夏令营由爱知行研究所筹资，同语和爱白参与具体的组织工作。夏令营的时间大约 10-14 天，第一届夏令营的地点是在北京郊区一个度假村，第二届、第三届则是在北京市内用租用的一套大公寓或者几套公寓来进行活动。夏令营的基本形式是围绕某一主题，开展一系列相关的不同形式活动，在学习的同时强调大学生的参与。例如在关注文化艺术创作的那一届夏令营中：

闲：上届文化艺术那个，我觉得特别好玩，就会去专门讨论同志电影，讨论这个艺术创作怎么写小说，讨论艺术作品然后就是分组做创作，然后还组织大家去听音乐会、看展览、看戏，我就觉得真的就特好玩。

培养新一代的大学生，让他们在获得更多资讯、摒弃既有偏见的基础上更多地参与到同志运动中来，这是大学生夏令营确实做出的成绩。例如后来北京同志中心的核心工作人员杨紫光、积极推动同性婚姻的白咏冰以及先后在同语和爱知行做法律工作的魏双双都是大学生夏令营的毕业生。这种“有点像培养年轻一代的”活动，闲认为是非常重要的。

闲：这是一个大家的运动，我们需要年轻一代新鲜血液，因为老人应该退休我觉得，很早应该退休。（访谈员：那你觉得他们身上的运动意识呢？）需要培养，但是我觉得你也可以清晰地看到年轻一代的历程跟早一代的历程是不一样的，他们时间很短，很短时间他们就能够搭上这个。但是我觉得这个后面的原因是因为中国整个的社会发展，中国近十年的观念，因为这些年轻的同志们他们也是年轻一代，就比如 90 后，80 后，就是跟整个中国的观念变化和社会变迁是有关的，所以是它的一个折射，所以是不一样的。（访谈员：那他们对政治的敏感性？）我觉得会有更高的敏感性，有一个很明显的就是他有一个很强的自主意识，不像我更上的我父母一代人，他们经历过文革他们会觉得应该远离政治，就会很倾向于个人的权利是无法向国家、向社会去要的，但现在我觉得 80 后这一代，就这个个人的意识就大大增强，90 后就不要说了，那个人的权益他们也会（去争取），因为他很关心个人，在某一方面很自我为中心吧，就很考虑个人的利益，但另一方面他懂得要争取个人的利益，个人的权益吧。

除了第一届夏令营之外，同语与其他组织在 2005 年底又声势浩大地合作了一次，即第一届北京同性恋文化节。在前面三次大型活动（注：2001、2005 年同性恋电影节和 2001 年女同性恋文化节）遭遇不同程度的阻碍和困难之后，这又一届的文化节筹办更为精细。文化节组委会于 7 月成立，崔子恩任艺术总监，万延海负责筹款，闲负责论坛活动的组织，杨洋负责演出活动，朱日坤负责执行。文化节的场地也准备了两套方案，一是对外公开宣布的 798 仁俱乐部，一是如果遇到问题即转移到上下线酒吧，这个二号地点没有对外公布。这一次文化节的活动可谓是空前的丰富，有完全面向公众的 8 个展厅或展览，两场完全开放的晚会（节目包括歌唱、舞蹈、话剧、舞剧、相声等等）以及两天的论坛活动。可以说，文化节不仅内容丰富，也十分的公开，似乎要把这个文

文化节从社区内的小活动做成一个社会层面的盛大同志节日。而根据追命的回忆，作为艺术总监的崔子恩的原意也正是如此。¹¹

追命：人家崔子恩做的时候就是要这么说，不然他就觉得没有公众效果了。他就是说我们就要，主要他不光用同性恋，主要他的词写得还很，用国家的新旧啊，特别火的那种词，他就是故意要试一试，因为 05 年那一年，其实发生好多事儿。就是艾滋病的那个（节目）在央视播了，就是《以爱的名义》，那一年他们都觉得，国家要放宽了，所以崔子恩也想试试到底能放宽到多少。反正他就做得特别大。他是要做那种肯定要人知道的。

2005 年确实发生了一些可能会让人错误估计形势的“放宽性”的事件。2005 年两会期间，李银河第三次委托人大代表向人大提交了同性婚姻提案。李坦言并没有奢望提案能够被通过，而是希望通过这种形式引起全社会包括政府高层对同志人群的关注。2004 年底、2005 年 3 月和 8 月中央电视台制作并播出了 3 期有关同性恋议题的节目，题目分别为《央视论坛 · 同性恋：回避不如正视》、《新闻会客厅 · 我了解的中国男同性恋》和《新闻调查 · 以生命的名义》。而仅仅在 2005 年一年之中，地方性电视台（天津卫视、广东卫视、南方电视台、四川电视台和南京电视台），包括凤凰卫视，一共制作和播出了 7 个与同志议题相关的电视节目。更有众多的报纸媒体¹²刊登了有关同性恋的报道或文章。

正是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之下，崔子恩和其他文化节的主办者尝试着将这一次的文化节办得公开化和盛大化，但是结果并没有他们预期的那么好。

2005 年 12 月，在文化节开幕的前夕，本来预定好的 798 仁俱乐部告知文化节组委会他们不能为文化节提供场地。

追命：我还去看过地点呢，去 798 那儿。那地儿还真不错，是可以做画廊的那种，还有上下层。那地儿还挺好的，本来是租那儿的。结果警察就直接给那地儿打电话，就说你不能接这个。他们也就打电话给我们说不能接，就不能办。

根据之前的经验，虽然警察的行动不能算出乎意料，但毕竟令文化节的组织者感到失望和无奈。文化节的队伍向第二套方案中的工体上下线（on-off）酒吧转移。12 月 17 日下午 5 点是原定的文化节开幕酒会，就在志愿者为开幕做最后的布置的时候，酒吧忽然涌进来几十名警察，把门封住了，并且以消防设施不过关为由将酒吧强行关闭。此时已经有不少前来参加文化节的朋友被挡在门外，逐渐聚集了一、二百多人。警察开始遣散人群，大家一群一群地去附近吃饭。在吃饭的过程中，凌回忆说警察就在他们吃饭的地方盯着。

凌：我们先在旁边的一个餐厅吃饭，然后吃饭的时候另外一桌就是警察，因为听他们说话就知道。

11. 崔子恩为文化节撰写的序言如下：

上帝创世，有天地，有了光，有了爱，无论同性异性，男女男男，都分享。

天地造物，有四季有冷暖，不论男女同异，性与情，肉与灵，都乘凉，都取暖。

社会人间，有贫富有贵贱，有男尊，有厌女，有恐同，背离上帝和宇宙。因此上，须改造，陈腐秩序，老旧文化。

新社会，女男平等自不待言，同性恋异性恋平等已成新的底限。

衡量新中国是新还是旧，要以同性公开相恋的程度为准绳。

我们敏感的肩上，有着当今社会的重量。

如果我们被压垮，表明它无可救药。倘若我们弓着腰，说明它摇摇欲坠。若是我们悄悄躲在柜子里，总是不敢现身，意味着它的封闭，依旧天衣无缝。或者我们打开了一扇柜门，向外眺望，社会的风景一定不够美丽，不会引人入胜。或者我们偶一在一隅欢歌，悲歌的人群却低着头颅，在左近彷徨。或者我们偶尔抬起骄傲的眉目，时代的雨点却化作黑污的痰唾。

我们不能公开手挽手。我们不能公开唇吻着唇。我们不自由。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社会不进步，时代不解放，人众不宽容。

在中国，同性恋或许还不足以自豪，但是，耻罪的角色一定是歧视者和压迫者。



本来没有对外公布，甚至是“对外封锁消息”的文化节第二地点为什么会被警察如此迅速地摸到呢？原来，在筹办文化节的过程中，杨洋把文化节的一些情况告诉了她在香港一家报社工作的同学。原以为就是同学之间的聊天，没想到这位记者同学将杨洋告诉他的事情直接刊登在了报纸上。警察便是根据这篇报道提供的线索找到了文化节并没有对外公布的第二地点。事后，杨洋非常伤心和失望。作为两次电影节和一次文化节的组织者，杨洋在大学毕业之后去了比利时。

石头：杨洋那天悔得哭得哟。报纸的这种就是信不得的，她真的就会给你报出去的。关键是杨洋比较年轻，她不知道这事，她特伤心，一直在那哭。

追命：（对杨洋）打击非常大。在那个《誌同志》里头，杨洋就说过那段。杨洋说她觉得北大太差了，那个电影节被关了嘛。然后文化节也被关了，还是因为从她嘴里透出去的，也被关了。杨洋可伤心了，那天我就看到她在那里哭啊哭啊。

这样的大型活动的又一次失败给北京的同志社区又一沉重的打击。本来被邀请致开幕词的李银河也在这之后很少出现在同志社区的公共活动之中。此后一年，即2006年，北京同志社区几乎没有大型的活动。时间似乎又回到了2001年那一次的女同性恋文化节。而这一次，在运动形式的同志活动遭遇重大挫折的时候，我们再一次看到了草根文化的韧性。

尽管如前文所述，在04年底同语的成立会议上就有一半的人提议要做杂志，但是真正将拉拉杂志付诸实践，却是在05年底由两个没有参加那次会议的拉拉实现的，sam和gogo。

sam：我觉得一般任何人做事情都不会是说“我为大同”，都是从个人的角度出发的。从个人角度来讲，05年我刚毕业，那时候刚毕业的时候你就是一个小人物。刚开始接触社会，你就是一个底层。我觉得不太能有自己的存在感，所以想创造一个自己的东西，有自己的存在感。从官方角度来讲，就是因为第一没有这样的刊物，确实没有；第二就是，大家都逛网站么，网站里面讲的话也都是很消极的，……我们可不可以做一个积极一点的，阳光一点的，明亮一点的（东西），然后就定下了这个主题。

gogo：最初的就是有一次几个人喝酒一块吃饭，然后就说这件事，就是酒桌上吹牛，说做一个拉拉杂志这东西，没准能赚钱，当时就是这么一提，念头一过，也没有特别仔细地想过，后来呢，又过了一段时间忘了多长时间，太久，然后sam当时就跟我说咱们做一本杂志吧。……那其实是一个特别单纯的想法，当时的想法就是，因为从网上到处都能看到特别压抑的故事，只是觉得那么压抑的现状，或许不能够完全反映年轻人的现状，就具体的杂志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其实没有特别的仔细想。

我们在这样的现状中，坚强地生存。有时，我们隔着社会的柜板，怀想自由的宇宙和平等的上帝。有时，我们行动起来，去环保我们的爱情环境。有时，我们舍生取义，在火焰中，试图把自己冶炼成金。有一天，同性恋纯炼成阳光，照亮的，将是整个人类。

同性恋也许不是金子，但肯定是这个时代黑白美丑的试金石。

在这里，第一次，我们集体展现以我们为主体的远大叙事。我们身体的摄影，我们手中的图画，我们歌声的翅膀，我们思想深处的光芒。在这里，我们严肃地表达我们评判社会的权力与尺度，我们的光荣与梦想。还有，不忘记炫彩我们抒情的尾翼我们的美丽与哀愁。

12.《文汇报》，《南方周末》，《陕西日报》，《华声月报》，《健康报》，《文化时报》，《大众医学》，《祝您健康》，《人之初》，《希望》，《南方文坛》，《风采》，《计算机与生活》，《音乐与表演》，《母语》，《新闻周刊》，《凤凰周刊》，《I世界都市》，《莽原》，《花城》，《城市画报》，《山花》，《芙蓉》，《北京文学》，《青年文学》，《作家》，《电影文学》，《电视·电影·文学》，《现代文明画报》，《时尚健康》，《法制早报》，《环球》，《南方人物周刊》，《成都晚报》，《成都商报》，《中国发展简报》，《时尚男人》，《魅力先生》，共38家。

尽管 sam 是中文系毕业并且在校期间有做校刊的经验，gogo 是专业的艺术设计，做杂志需要的两个大块似乎两人都能驾驭，但实际上一份杂志的诞生伴随了大量的细节问题和工作。首先是杂志的形式。

sam：然后我当时想的是按照我们学校的校刊那样，就是一个大开纸，因为我想这样的容量我还是可以去掌控的。

gogo：她（sam）最初的想法就很简单，用 A4 的纸打出几张来就行，我说这东西那就是一个传单了，她不是一个杂志性质的东西，然后后来而且其实如果你要打印出来几千份的话，费用一样是存在的。那咱们做一个折页的，大折页。

然后是杂志的名字。

gogo：sam 她总想叫一个中文名，而且要有同什么，同什么。但是我从设计角度考虑，我觉得中文字不是特别好，在设计上不是特别好看，因为它太满，太方。中文的刊头不容易做得特别好看。从我设计的角度我就希望它是一个英文的，因为英文空间感觉比较强，本身就有很强符号化感觉。我就坚决叫一个英文的，她就坚决叫一个中文的，还一定要叫同什么什么。我那会跟她赌气，我说你叫同一首歌吧。我记得我们为了这个名字纠结了特长时间，特长时间。然后后来我忘了是有一个什么提示，我突然脑子里就，我觉得叫 les+ 特别好。les+ 读出来的时候，那个 + 可以理解为家园的家，你也可以理解成加减乘除的加，而且这个加号可以赋予它的意义特别的多。而且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从设计上特别好去处理和把握它，我当时觉得就叫 les+。她还是说叫同什么什么，叫一个中文什么。我们俩为这事吵了特长时间。后来我记得我威胁她，如果你叫中文名字我就不做了，后来她没办法了就叫 les+。最开始的时候

说实话在杂志出之前，我也比较担心这个名字不被人理解，我怕拿出来很多人问这是什么意思，不过后来这个问题没有人问过我，我觉得大家理解能力都特别强，没有人问我这个名字为什么叫 les+，好像都能理解，我觉得挺有意思的，然后当时名字就这么定了。

这两个问题达成了共识之后，sam 和 gogo 便分别负责了《les+》的文字和设计。《les+》从那个时候开始便定位于年轻和文艺。第一期的《les+》内容很少，一篇 sam 自己的文章，一篇与拉拉相关的名词解释，sam 在网上的朋友提供了一篇人物传记和一篇电影评论。主题也很简单，即说出自己作为拉拉的快乐感受。sam 和 gogo 没有寻找资金的经验，而第一期《les+》做成折页形式在成本上也比普通的杂志少，所以他们决定个人各出 500 元，制作 1000 份。第一次跑印厂的经验让 gogo 印象深刻。

gogo：我和 sam 大半夜的九、十点钟了吧，特远，在南三环，我们俩顺三环就走。我们对那地方也不熟，找地方。我那天鞋还磨脚，走路一瘸一拐的，我觉得我这辈子没受过那么大的苦。我们俩口袋里好像一共就只有十多块钱，打车钱也不够，我们俩还特别饿，走在路边看到有一个卖地瓜干的，买一袋地瓜干，我们俩边走边吃，太痛苦了。

幸好这种既出力又出钱的情况没有维持太久。在第一期制作的过程中 sam 也四处联系人来寻找下一期的稿件和发行途径，而在这一过程中，他们找到了解决资金和发行的办法。《les+》继续维持免费发行的模式，制作与印刷的费用由爱知行的资金来支持，并且主要通过各地的拉拉酒吧、小组以及个人等多种形式的代理点进行发行。

sam：（我）跟很多朋友讲，跟男同的那边讲，跟这边讲。后来我得到一个朋友的建议，然后我再跟闲讲。



les +



《les+》早期封面

——：我们当时就是没有钱，也没有别的一些渠道可以弄到一些钱。然后就听只一（音，人名）说认识闲，据说闲可以搞到基金会的钱，然后就想，那能不能牵一下线，至少跟闲认识认识么。我不知道具体后来认识闲是不是通过只一啊，那次沙龙就是跟闲认识了。

闲：国外的基金会对于刚开始的东西是不容易给钱的，要做出一些东西、有了一些经验之后，它们才会考虑支持。所以当时我就去找了爱知行。爱知行的资金一共支持了两年，从第三年（2008年）开始，就开始申请国外的资金了。

也许正应了那句老话“无巧不成书”，2005年12月17日周六，也就是北京同志文化节被警察阻挠无法举行的第二天，第一期《les+》的黑白样版出炉。sam的女朋友、也是《les+》后来的发行负责人——抱着刚印出的黑白样品到沙龙进行试点性发放。

——：我们出大折页之前，是出了黑白版的。我记得那天正好好像是北京有个什么同志活动么，就正好被警察干涉然后就关掉了。对，那天大家都在沙龙，也是我第一次去沙龙，拿着一打儿黑白的纸，去了之后那天有好多老外，大家都在一起讨论。

一个星期之后，2005 年 12 月 24 日，第一期的 1000 份《les+》以折页的形式诞生了。sam，一一（sam 的女朋友），gogo，雪飞（gogo 的女朋友）当天下午在拉拉沙龙、晚上在西厢房酒吧，做了《les+》的第一次发放。

sam：我们第一次是，那个时候是平安夜，本来一一和雪飞都不支持我们办，但是我们做出来之后她们是很意外的。然后呢，嗯，我们就去西厢房发，然后她们都特别兴奋。

一一：第一期出刊的时候，就去了西厢房么，那次正好是圣诞节（平安夜）。去西厢房我就看见我的同事，我说啊，你在这儿，我说我是什么什么公司，我在公司见过你。然后她就吓傻了，看着我吓傻了，我说你是么，她就傻了说是，后来顿时她可能就后悔了。

gogo：拿到沙龙，好多人说你这个有点像化妆品的宣传单就那样，她们就觉得这不是一张东西，你可以叫她是一张报纸，你不能叫一个杂志。……（在西厢房）杂志发的特别好，好多本发的特别好。（但是）我去上厕所的时候，（看见）西厢房厕所里面就扔了好多杂志，好多我们的杂志。那时雪飞还跟我说，把这杂志往里踢踢，别让 sam 看见，sam 看见一定特别伤心。我说不光 sam 看见伤心，大家都会伤心的。

雪飞：去沙龙、去西厢房发杂志的时候，估计 gogo 她们也会说，看到有人把杂志丢到厕所里。我们觉得特别心疼，想捡起来，这是花了那么多钱好不容易印出来的东西。但是也看到别人拿过来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翻，就觉得特别开心。

雪飞说，后来在网上看到一张某超女的照片，拍的是她拿《les+》的第二期在看。“当时就觉得，哇塞，竟然有那么多人知道《les+》，还是挺开心的。”（雪飞语）

而在制作与发行的过程中 les+ 逐渐聚集了更多的志愿者，其中一些成为了后来的核心成员。

sam：（志愿者）建立分两种渠道，第一是她看了杂志说愿意干，然后联系我们，我们建立联系，看看这人靠不靠谱，能力够不够。第二比方说大头，我们认识的时候也挺早的，那个时候大概是好像是第二期出刊的时候认识的，然后就跟她聊了一下。大头是非常著名的知识分子，很适合，所以就开始先约她写稿，都是这样先写稿，然后也看大家最近比较空，悠闲一些，然后又顾得上，就找她。

两月一次的《les+》对于这些编辑来说就像“脱了一层皮”一般辛苦，但是在这个过程中，les+ 开始不断地更新扩展和尝试。2006 年 3 月由一一操刀，les+ 有了自己的网站。网站内容较少，只有一页主页呈现静态裁剪的《les+》杂志。后来因为服务器老出问题，又没有找到这方面专业的志愿者，在更新了几次之后就逐渐搁置了

2006 年 4 月，《城市画报》、疯果网等企业先后开始在北京举办创意集市，在例如中关村广场购物中心步行街、世贸天街等商业地段以小摊位的形式展销个人 DIY 的创意商品和作品。les+ 联合同语、爱白、爱知行等组织在位于中关村的创意集市中一共租用 10 到 12 个摊位，集中形成了一个同志专区，来发放宣传资料和展卖带有彩虹标志的创意产品。那次创意集市之后，《les+》杂志和相关手工产品进入了疯果网在中关村的创意产品实体店中进行售卖。但是后来中关村广场购物中心认为，“所售商品的主题存在社会争议”，而要求 les+ 从疯果网实体店中撤出。2006 年 12 月《les+》从折页改版为 36 开的小开本，由于资金有限，还不是全彩页。2007 年 4 月 les+ 博客建立，之前搁置的网站内容被整合到新的博客中。



从 2005 年下半年开始，北京拉拉沙龙的运行逐渐走上了轨道。不过就在这一年的夏天，沙龙搬离了最初的场地枫吧，并从此开始了它接下来的几年间不断“颠沛流离”的命运。

访谈员：枫吧一直做到什么时候？

安可：零五年的五、六月份。

访谈员：为什么又不在枫吧了呢？

安可：一个是场子老板每周（六）都给我们开一下午，然后她晚场很赚钱的，（下午场）她不挣钱。她不挣钱她要开一下午，而且来的人也就二三十人，然后消费的话也就（不高），这钱她没钱赚。

当时沙龙的运行资金主要从门票收入中获得，根据安可的回忆，当时沙龙按每个人十五块钱收取门票，主要用于场地、沙龙网站以及邀请嘉宾的费用。如果我们以沙龙平均每次来的人数规模——二十到三十个人来估算，沙龙每次的总收入也不过三百到四百元，这实在是有限的。

而根据枫吧老板乔乔的说法，她不想继续为沙龙提供场地，一个主要原因是收入太少、也影响晚上场子的生意，另外乔乔也对沙龙可能引起的安全问题有些担忧。

访谈员：但之前拉拉沙龙不是还在枫吧待过吗？

乔乔：是啊。让我给轰走了。

访谈员：为什么后来你要轰她们啊？

乔乔：我没有轰她们。她们这边，唉呦，太影响我生意了。礼拜六下午在我们这边做，然后结果呢，下午就在这儿待着不走了。十多口子，有的（时候）。然后闲她们散了以后，这帮人，各散不散，吃完饭后还跑到枫吧门口，就到里面坐着去。收门票，（她们说）干嘛干嘛呀，下午就收了我们的十五块钱，晚上还要收我们三十块钱。就说，这跟我们不是一块儿的。什么不是一块儿的？那好吧，算了不收了。每个礼拜都是这样。

访谈员：就当时每个礼拜六都过来？

乔乔：对，我说了我一分钱都不收你们的，你们要下午跑我们这儿来。但这最后发现你们影响我生意啊，影响我晚上的生意啊。关键我们（下午和晚上）不是一起的。（她们说）那不管，你们这样就属于坑钱。这（样说）有损于我们枫吧的什么（声誉）。我一想，算了吧。可是时间这么长也不行啊，一个人三十，十个人是三百，那二十个人是六百。我这儿一天才多少人啊？而且问题她们占地儿啊。沙龙的人后来也找我，我不合作，最后我就不合作。

访谈员：主要是从经济、运营方面考虑是吧？

乔乔：一个是这个，（另一个是）我觉得我不适合搞这种……

访谈员：文化性的活动？

乔乔：对。我跟我女朋友说，咱们不要去接这些（活动），咱们跟这个要离得远一点。咱们就干酒吧的，她们这跟法轮功（似的），万一被逮了。



枫吧

其实即便抛开个人原因不谈，从某种程度上说，无论是闲还是安可，当初能使她们走到一起合作沙龙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沙龙坚持社区活动定位的初衷。但是另一方面，沙龙本身其实很难离开商业运营的场所而独立开办，这样一来，在沙龙与这些以商业营利为目的的酒吧等场所之间，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些利益或目的的不一致或者说矛盾冲突。此外，尽管沙龙最初的创建者们更多地将沙龙定位为社区内部支持，而非对外的宣传，从而使沙龙不显得非常政治化，但是对商业主体来说，它们显然还是非常顾忌这类公共性的活动对自身经营所可能存在的危险和威胁。但不管怎样，沙龙要继续办下去，就必须为自己找到新的栖身之所。而正是在2005年的5、6月间，经过安可等人的努力，沙龙迁到了它的新家，一间位于朝阳门外丰联广场内东南亚风格的餐厅里。

这家名叫“金芭蕉”的餐厅位于朝阳商业区的一栋写字楼的二楼，根据宝贝猫的回忆，这间饭馆“不是临街的，它在二楼，我记得，……有点像新世界的楼上的那些个吃饭的饭馆，但是它不是那种类型，它还是比较没有那么大的菜味，没有那么繁华，那么热闹那种感觉”，更重要的是“因为那是一个商务区，周六的时候反而没人了。你那个工作人员一旦（周末），公司不上班了”。这样一来，这家餐厅的氛围和位置都比较适合周六下午的沙龙。不过，沙龙的“入驻”其实也经历了一些曲折的过程。

访谈员：（地方）都是你们自己谈的么？酒吧老板，场地的负责人？

安可：对，我去谈的么。

访谈员：告诉她们是一个关于女同的沙龙讨论这样的？

安可：去这个金芭蕉，这个老板是香港人，然后他不太同意。



访谈员：他也觉得这个（有危险）？

安可：他觉得这个（女同活动）是不是，怕政府啊，后来我可能去找他谈了两三次吧，包括当时要放片子么，结果我就后来就找了报纸，还是那个《中国日报》的报纸上关于同性恋的报道，然后，反正那篇报道还是挺正面的，呼吁就是说关注这些人群，还说中国有四千五百万同志人群。

访谈员：谁估计的？

安可：网上看到的，四千五百万同志人群。他们可能会进入婚姻状态，都会受伤。后来我就给他看了，就跟他说社会还是有一些人支持这个事情的，你看我们在枫吧做了那么长时间，也没有出什么事情。我跟他说，如果做这个事情可能出问题的话，那我也不可能出来做这个事情。最后还是，他说那好吧，那就做一次试试吧。我想那做一次试试吧。第一次在（那儿）做，来了八十多人，就是那个下午。……就是开场。

安可：（金芭蕉）他那环境还确实挺好的，大家点酒水呀，老板也挺关注这块的，非常关心这一块，因为他觉得不错。然后从那以后，他才开始接受（我们做的这些活动）。

最终，也许是安可的口才和诚意感动了餐厅老板，餐厅老板不仅接受了沙龙的活动，而且对沙龙给予了不少支持，一直到离开，他都与拉拉沙龙保持了不错的关系。此外，从金芭蕉开始，沙龙的活动不仅坚持以往活动时放电影的惯例，同时也开始对一些讨论录音。可惜的是，沙龙在这家餐厅一共做了大约三、四个月，就由于餐厅要关张而不得不又转移场地重新开张了。

安可：又做了几个月，他要关张了。……然后这个老板还不错，因为我们去要放片子么，（就

有些设备仪器放在餐厅里）。因为他跟大楼之间他们可能有点问题，可能最后是不是没交房租啊什么乱七八糟的（要关门），然后他在之前就跟我讲，他们可能要关张了，你要尽快把你的东西拿走，当时他的员工都还不知道的，然后他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他说）如果你不拿走的话，我们走了这个地方就要封起来了，你就拿不走了。还好（我们就搬出东西来了）。……去了这么多地方，还是很好的一个老板。

从金芭蕉餐厅搬出以后，沙龙转移到同一栋楼内的乐杰士餐厅。在乐杰士的这段时间，不仅是沙龙维持时间最长的一段时期，也是沙龙来的人最多的一段时期。据安可和宝贝猫等人的回忆，沙龙在乐杰士期间，之所以能吸引许多拉拉，主要因素至少有两点：首先，乐杰士的环境比较好，很适合沙龙聚会和讨论的要求，比如安可曾认为，“我觉得（乐杰士的）那个座位啊、环境啊，美式餐厅的那个环境，其实可能很多人会喜欢，特别适合聊天，……比较轻松，也比较适合聊天”。第二，乐杰士虽然也会督促顾客消费，但它的总体价格是比较便宜、容易为不少收入并不算高的拉拉所接受的。对沙龙的志愿者来说，在乐杰士的时光无疑是沙龙十分愉快的一段回忆。

宝贝猫：当时那个乐杰士里面，到星期六下午的时候，几乎是三分之二都是参加沙龙的人。（访谈员：像这种快餐店他也乐意拉拉搞活动么？）还是因为那个地方实际是一个商务区，因为它到了周末的时候没有什么客源，而且乐杰士还有一个特点嘛，就是说它是一个快餐店，它有时候会送外卖，它可能周六的时候外卖的服务是不是多一点，或者什么。它如果有大型的活动，一般会提前打招呼，你们这周不能办了，我们有大型活动等等。在乐杰士的那段日子里，跟它关系相当好。我记得当时安可有些时候搞些活动有一些小道具什么的，做游戏的小奖品或者一些什么东西，安可就存在那个柜台里，然

后就跟他说好了。它那儿有一个小服务员我记得，就是好像，我听人家说她是（拉拉），我不知道。她跟我们关系都挺好。有的时候去熟了以后，大家都聊聊天开开玩笑都没关系。

安可：乐杰士是人最多的时候。乐杰士的话，因为它有两个小区域，里面可以作为一个讨论的，然后外面这边还有卡座什么的。如果人特别多的时候，就可以在中间那个位置发起讨论，有那种高脚椅的那种。

访谈员：它的设计，比如说如果它的场大一点的话，它有像什么麦克那些么？

安可：有啊。麦克的话，哦，它本身应该没有，我们自己可以拿，可以接的。然后声音还可以吧。高脚椅坐得高高的，看着大家，然后觉得挺（来劲）……后来在乐杰士呆了两年嘛，我觉得它的那个环境还是挺合适的，包括它那些老的国外的一些歌星，什么詹妮斯啊，卡朋特兄妹啊，由梅啊，还有一些老的（装饰），很美国的那种。……我特别遗憾就是没有照一些照片，关于那个餐厅的照片，实际上后来回想起来，它那个整体的风格还是挺好的，它的那种装饰和它的那些桌椅摆设，还是挺好的。

从乐杰士开始，沙龙也开始对每一期的话题进行记录。第一个承担沙龙固定记录工作的是小白。

安可：之前几乎没有什么记录，之前只是发布公告做什么，对沙龙的议题都没有记录。……我原来就是想，每次一个议题的话把这个议题记录下来，这是起码的，我开始让人知道你在做什么。……我跟闲商量，她也觉得这块很重要，希望找一个做笔记的人，就找小白商量，小白可以做。然后那时候就做，做完了之后就放在网站。但是那时候的东西，就是一个简单的记



乐杰士餐厅

录。可以说那个时候的东西，我没有那么多要求，我没有想那么多，也不太成样子吧。……我一直想，你做这样一个沙龙，你要把沙龙能体现出来，让更多的人知道，来的人是什么样子，可能这是能看出来，至于其实真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话题我感觉并不重要——也重要、也不重要，更多的是通过话题看到你社区里的人是什么样子的，她们发出不同的声音来，我觉得这个可能很重要。所以呢，我一直在想这个东西是不是……我觉得有的时候不能小看每个人，她们自己的思想和想法……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想法的，我不在乎她说的水平如何，不一定要说出一个至理的名言，让人有多深刻的东西，她说出她的看法就可以了。

当沙龙在五周年纪念时出版《足迹》一书时，上面已经密密麻麻地记载了这五年间沙龙的话题、嘉宾、活动以及透出此中的变迁。可以说，每一次沙龙的记录尽管是简单的，但简单的日积月累却也产生了一种水滴石穿的效果。



2007 年的 9 月，乐杰士餐厅因合同到期也要关张了，因此拉拉沙龙也不得不迁到丰联广场南侧一层的百万庄园餐吧里面。与前面两个餐厅类似，百万庄园在周六下午也是客源稀少，因此商家同意让沙龙在这里做活动。但是这一次与百万庄园的沟通经历，似乎却远不如此前愉快。

首先是沙龙与商家的沟通。由于沙龙不是包场，并不会给餐厅一笔固定的费用，商家的收入依赖于来沙龙的客人的数目和消费情况。这样一来，沙龙与餐厅需要沟通的地方也比较多。比如，百万庄园与乐杰士餐厅相比，更为“安静”和“商务化”，消费也更高一些，因此与乐杰士餐厅顾客较大的流动性不同，百万庄园经常出现客人不愿离场的情况，就是当沙龙下午两点钟开始活动时，需要清一片区域作为活动场地，而这时如果出现原有的客人不愿意走，就需要请餐厅协助跟客人沟通解释。但百万庄园的服务人员并不积极，使得沙龙有时不得不临时搬动桌椅等以腾出必要的空间。此外，安可还谈到，“关键是他们（指百万庄园）老换人，……领班啊、服务员啊，会经常地换。他可能不熟悉以前的情况，那就需要重新去跟他们沟通，沟通关系呀这些”。也就是说，沙龙在百万庄园运行的期间，遇到了较之以前更高的沟通成本。



百万庄园餐吧

其次，在消费的问题上，餐厅与沙龙也一直摩擦不断。一方面，有些参加沙龙的拉拉由于某些原因而不太积极消费，从而引起餐厅的不满。另一方面，餐厅有时候也使用一些变相的欺骗性手段来强制顾客消费，这也引起沙龙里的一些人的不满。

安可：还有一个，我们每个人争取消费一点，那这个问题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有的时候，有的人在消费这块，不是特别的积极、特别的主动，那有的时候也会有些麻烦。他们餐厅的人会说不消费或者怎么样。那作为我们的话，首先呢，我会主动地消费，然后客人我会给他们去讲，大家可以消费最便宜的，尽量消费最便宜的，这样的话人家也是做经营，没有免费可以提供你能坐一下午的地方。那就是能消费就尽量消费最低的消费，一般人还是说能接受的。

安可：有些人会有些冲动。……会跟人家餐厅里的人会有些冲突。

访谈员：怎么办呢？遇到这种情况？

安可：这种冲突，……我或者说，不是一定要冲突。（服务员应该）跟我说，让我、不要你（服务员）去跟她来解决。……让餐厅的人跟我说，她不消费，如果她不消费的话，如果你实在劝阻不了她不消费的话，你来跟我说，我会把一些情况告诉她。要跟她讲道理，因为餐厅要经营，我们找一个这样的场地，你（客人）应该做一个支持。当然有的时候你真的不愿意消费，或者消费不起的话，那好我来给你这钱。

宝贝猫：百万庄园他其实挺孙子的，因为什么，他挺坏的，他会过来跟你说，这都得点个什么，他蒙你，其实这不是都得点个什么，他没有最低消费。

访谈员：百万庄园的服务员会管？

宝贝猫：对，他坏着呢，他会看你是生面孔，因为每周都来么，他一看是生面孔，他就过来跟你说，这都得点一个东西。但有的人她不知道她就点了。但是实际上他挺坏的，因为我们到这里来，时间长的人，你像安可，她每回下午两点钟就来了，她真的可能在这里吃饭，她点东西，其实那餐早出来了，他又非得从你那，可能跟他自己的收入有关系，但是以前在乐杰士，没人管，你点不点是你的事。

在百万庄园的时候，沙龙的话题也开始有所变化和拓展。在沙龙最开始的半年多时间里，话题一直很文化。这从安可和闲对沙龙的定位以及追命的回忆中都能够看出来。后来，可能在半年的时候沙龙的举行遇到了参与人数越来越少的瓶颈，从而促使安可和闲反思，如此文化的讨论议题是否贴合当时北京拉拉社区的实际情况。沙龙在05年夏天搬家之后，开始逐渐引入生活类的话题，并邀请更多元化的讨论嘉宾。之前沙龙的讨论主要邀请的是相关方面的专家或者专业人士，而在沙龙搬到乐杰士餐吧之后，沙龙主持人就开始由原来闲一人主要承担变成了由闲和宝贝猫轮流负责，并邀请社区里的普通人来作主持或者特邀嘉宾。

安可：（沙龙的话题）实际上我们就是慢慢地拓展，比如说像就是说更需要我们在拉圈里发现一些新鲜的话题，那她们可能谈一些话题，同时呢，我们在发现新的话题请她们来做主持。

另外，从乐杰士以后沙龙开始做一些重复的话题，比如“身份认同”、“跟父母的关系”、“创业择业”以及“心理咨询”等内容。同时从法国回来的心理师穆老师，由于发现来沙龙的不少拉拉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因此她经常来沙龙，并加入了主持人的行列。此外，沙龙还拓展了诸如讨论“拉拉的美容”、“T的造型”、“拉拉个人的职业经历”以及包括“宗教与女同志”在内的一系列话题。

在沙龙逐渐成熟的同时，自2007年下半年开始，闲逐渐淡出了沙龙的活动。

访谈员：你是08年几月离开的沙龙？

闲：其实这是一个渐渐的过程，也不是说一下子就离开，因为你也不可能一下子全离开。就开始，你会少一点去，就比如说，最开始你要一个月主持两次，宝贝猫两次你两次，后来我就逐渐说我能不能一个月一次，然后包括议题策划这部分能不能就交给别人来做，然后我只是说我一个月负责一次我这个部分的议题策划，然后真正的比较少去沙龙可能也就是将近08年下半年了，好像时间上是这样的。07年就逐渐减少工作量，然后到08年可能下半年就基本上我不太管沙龙、参与沙龙的工作。当然有时候会有合作的，有时候我们会有嘉宾，然后会去沙龙去做讲座。

在谈到自己离开沙龙的原因时，闲说，是因为04年回国时为自己所定下的五年的规划，就是前两到三年做社区内部的活动，后面几年则重点转向社区外的公众活动。



2007年，北京拉拉沙龙三周年的庆祝活动



访谈员：那你为什么离开沙龙？

闲：我觉得（离开）沙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说实在的，我原来个人的计划做沙龙这样的活动是做两到三年，因为如果同语一直做沙龙，我觉得对同语来说，即使沙龙做得非常好，对于同语来说也是一个失败。像我说的我有我的计划，我有我的时间的计划，前几年、几年之后应该怎么怎么做，那在时间上当时已经超过我原来定的时间了。我觉得我原来定的最多三年，那 05、06、07，其实已经三年多了，然后那时候真的我还没有从沙龙脱身。但是沙龙在做了一年之后，基本上就扶持起来了，而且就逐渐稳定，我觉得在 06、07 年的时候真的还挺好的，发展得挺好的，然后那时候在沙龙，我也一直包括我相信安可也是，就是我们想要吸引更多的人参与沙龙工作嘛，然后我也是一直希望有更多的人一直就做我的工作，然后我可以做别的工作，所以后来也确实有比较成熟的主持出现。

然后从我个人来讲，就说在沙龙如果都是我策划议题和主持大部分，那些同一个话题我都恨不得都讲了很多次了（笑），这是为什么在沙龙之后我很少去接主持类的活儿，因为我觉得我受够了（笑），真是有点做太多了，我得做点别的了。因为主持我觉得，其实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如果你要想当个好主持，因为你需要自己有很多东西你才可能真的去讲，我觉得我做了沙龙三年的主持，我已经把我原来积累的东西已经说得差不多了。……可能是 05、06 年间吧，我们开发了第二个主持（宝贝猫），那个主持跟我一直干到 06、07 年，甚至 08 年，但那个主持现在也很久不见了，我不知道是不是做了两三年，她也觉得都被掏空了。（笑）

虽然渐渐离开了沙龙的活动，但闲却并没有停下她和同语的脚步。

闲：然后沙龙呢，就是和安可的合作，她也是非常棒的、非常出色的一个人。我向她学习了很多东西，所以跟她在一起就一直做了 3 年，真的投入很大，但是后来转型，我觉得从某个角度上来说，也是有点遗憾，不继续做沙龙或者怎么样，但是我觉得也差不多了，就是我做了我的贡献，我确实向她也学了很多东西，因为从我的角度，无论是从我个人还是从同语这个组织，我都不希望停留在一个地方太久，因为我觉得停留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种退步，就是后退，所以一定要去发展，要去开发。

至此，北京拉拉社区在酒吧、私人聚会之外，有了沙龙聚会，有了定期出版的杂志，有了专注于运动的组织。在 2007 年这三个部分有了新的发展趋势：沙龙的讨论主题逐渐从以文化为主过渡到以生活类话题为主，闲逐渐减少了在沙龙的主持工作；les+ 开始在杂志制作之外参与其他文化类的活动；同语开始涉猎面向外地的拉拉社区和公众的活动。

从 2007 年同语开始运行拉拉小组小额资助项目，“扶持全国各地的拉拉小组建设”。

闲：从 07 年开始同语还有一个项目是小额资助，就是资助外地的女同志小组，给别人小额资助。也很有趣，因为 07 年其实我们还没有真的像 08 年那样有钱雇自己的员工，但当时我们有一些个人捐款，然后我们得到了个人捐款之后，我们跟志愿者商议觉得现在同语有点钱来做活动但外地的女同志一点钱都没有，我们觉得这个钱是应该分一分给大家，因为对于我们来说外地女同志做的工作跟我们在北京做的工作同样重要，如果有资源应该大家尽可能地分享。

于是同语从 07 年所获捐赠中拿出超过一半的部分用于其他小组（主要是北京之外）的建立和活动。每一笔小额资助大约是 3000 元左右，由北京之外的小组或者个

人提交项目申请，具体每一笔的数额也会根据申请的项目的具体情况而调整。最后地方小组在完成项目之后需提交项目报告和财务报告。可以说，整个流程与申请国外基金的流程相似。但是地方性小组在起步阶段一般很难有机会和渠道向国外基金会申请项目，所以对于申请资金的流程以及相应的项目运作能力都是欠缺的。小额资助的项目无疑能够帮助他们很快地熟悉这套流程。而更为重要的是：

闲：我们希望培养她们怎么用资金去运作一个项目的这样一个能力的锻炼，所以也起到了一个把我们的管理经验和外地的小组分享（的作用）。虽然我们也很不成熟，也是摸着石头过河。

也就是说获得资源、组织活动、取得项目成果固然重要，但是相应的能力和经验的获得、激发主动性或许才是小额资助项目（甚至于其他基金）的真正目的。例如 sam 和 gogo 在 07 年的时候，以图片展为项目申请到一笔小额资助。但是在筹办的过程中，项目的理念和框架不停地变化，到 09 年做成了一次规模较大的艺术展。这些成果已经远远超出了小额资助项目的框架。

单单讲小额资助项目，也许会带来这样的印象，即只要有钱，拉拉社区的活动就会做起来。但是历史和经验告诉我们，人的因素是拉拉社区发展不可或缺的部分。也就是说，建立与其他组织的联系，摸清其他地方是否有人想做社区工作以及告诉其他地方或者其他小组他们能够获得的资源（例如小额资助）和帮助在哪里。这一次同语选择的形式不再是全国性的拉拉大会，而是具有更多技术支持和培训色彩的拉拉营。

拉拉营，也称为拉拉志愿者骨干培训营，在大陆、香港、台湾和北美的拉拉组织联合筹办下于 2007 年 7 月在珠海开幕。同语负责大陆区域的工作和培训的承办。那时候的情况是，大陆的拉拉社区和拉拉组织逐渐开始“欣欣向荣”，但经验不足，需要听听其他地区的经验，而大陆之外的地区也需要多了解大陆的情况。拉拉营的经

费来源于向基金会申请资金、个人捐款和义卖所得。这次拉拉营主要以讲座、培训、互动式活动为主，面向全国公开招生。

闲：（大陆方面的参与者）我们原来是预算了 24 个人，后来来了 50 多个人，所以后来有一个方式就是有一部分人是自费的，因为报名的人实在太多了。我们说真的我们资金有限，那些人就说没有关系我自费我真的很想去看看，其实后来即使是这样的人我们都拒绝了一些人。有的人自费我们觉得她比较有诚意，然后她真的可能会比较会是对同志运动感兴趣的，但我们还是要经过严格审核，然后才会批准她。因为有的人呢我们会觉得，嗯她来了她说不定就真的很想看女人，看不同地方的女人，虽然她可能真的会帮我们干些活，但她主要的动机可能不是很明确（笑）。因为我们确实是需要控制人数，要不然就真的没办法做某些活动。

追命：（访谈员：当时的甄选标准是什么？）其实基本上是看报名表上，看你是不是特别想来做事情。就是想成立小组的更好，如果当地（拉拉社区）不发达，也是比较偏重没小组的地区的人来。

几天的活动下来，虽然追命认为这次拉拉营还是有“包括了太多想谈的议题”从而主题不突出的缺点，但是几位营员都对 07 年的珠海拉拉营印象深刻。

闲：所以我觉得就那次对整体的社区促进非常好，给很多人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就是去拉拉营回来恨不得赶快大干革命的那种。

追命：07 年它（拉拉营）没有什么突出主题，它是各个部分都有，它主要是让大家了解，然后人数又众多。当然气氛比较好。



Lala Camp 2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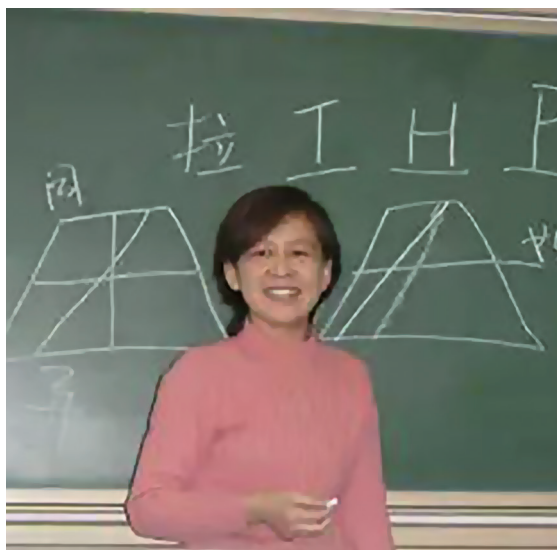
凌：特别感动我的还是拉拉营最后结业的那个场面吧。挺感动的。因为那个时候的结业场面就是，上一个，它不是说有固定的人给你发结业证书，二百来号人嘛（实际为将近一百人）。比如说就是我，别人给我发证书，然后我就从里头抽一个出来，抽出来是谁我给她发证书。然后，特别巧的是，我抽的是我女朋友。我给她发证书，她当时也挺激动的，眼泪都下来了。……你见证了那个时刻，居然还有这个时刻，这么多人聚在一起，然后来讨论怎么来做这个事情，然后就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样，那个是在有这样一个革命氛围的时间和空间里头，那个让我挺激动的。

Eva：很好玩，就回忆里面就非常。（访谈员：对你以后的工作，未来有什么影响？）肯定有啊，说实在话我是在同一个场所看到那么多女同志，就除了夜店，然后还有那么多女同志希望为我们的权利而努力去做一些事情，所以还是觉得挺鼓舞吧。因为不是独自的觉得自己，只是我在呗，在做白日梦，就算做白日梦也有人

跟我一起在做白日梦，就觉得不那么孤军作战吧。然后也看到很多，就主要是每个，尤其是那些资深的女同运动的人们，就像她们台湾的香港的那些，你看到人家坚持那么多年，也做了不少很辛苦的工作，然后就觉得，反正做事情能做起来的，就看你，看个人的坚持，还是有很大的鼓舞吧。

拉拉营无疑是成功的，它首先直接加强了当时各地拉拉小组的联络，其次分享了尤其是香港、台湾等已经发展了十几年的华人社会拉拉社区的运动经验，甚至直接催生了地方性拉拉小组的诞生，例如南宁和广州。当然，前面讲到的小额资助项目的推广和进一步的落实，也得益于这一次拉拉营的顺利举行。

相比于社区内部活动的大规模推展，面向社区外公众的活动，在几次电影节和文化节的失败之后，同志活动的组织者在方式和策略上更有经验，在活动设计中，“规避风险”作为一个独立和专门的部分出现。有了失败的经验，组织者更加的聪明地“包装”活动。这比较典型的体现在了 2007 年 2 月 14 日的情人节送花活动中。



白咏冰



情人节送花活动宣传单



情人节活动的想法最初来源于白咏冰，即在李银河于两会期间再次提交同性婚姻提案之时做一次面向社会公众的活动，来为提案造势。也就是说，在李银河连续三年提交同性婚姻提案之后，北京拉拉社区才对其有了一个积极的回应。而这个积极回应的主导者就是白咏冰。在许多人认为当时提同性婚姻还太早的情况下，白咏冰的想法是不一样的。

白咏冰：在中国，因为是中央集权控制之下的国度，政府的力量是最大的，以立法的力量去推动一个群体的权益的时候，这种力量是很大很大的。可能在西方社会，还不如这种力量大，我觉得。先推什么立法呢，先推同志婚姻，我当时就觉得。我当时考虑的就是说，在中国这个社会背景下，婚姻的地位、价值特别高，特别是价值，受到人们的肯定，当你以这种被人们肯定的价值的面貌出现时，人们比较容易接受这个群体。当人们看到同性也可以作为一种婚姻状态的时候，他就很容易认可你了。……同性恋的这种身份问题就被提到另外一个层面了，也是一种策略吧。所以我当时是想做同志婚姻的立法。

之所以定在2月14日情人节之前搞一次公众活动是因为情人节正好在两会之前，但是本身又是一个节日，既可以缓冲掉两会之前紧张的气氛，也可以规避一定的风险。一开始白咏冰提议到地铁里发传单。

白咏冰：能不能找几个人去地铁里发同性婚姻的宣传单。我说如果你们觉得透露身份不方便可以蒙面（笑）。她们说这样会觉得很怪异。我当时为什么考虑在地铁里，因为我觉得很安全，一个封闭的车厢里不可能对你做什么，可以立马换一节车厢，换另外一个方向的地铁，很难去报警或者抓到你，很容易消失。

但是其他人认为这种计划不太可行。

石头：她这种方式其实适合在那种西方的那种开放的国家，干什么都可以，打扮的怪一点也可以，但是你在中国（不行）……我就跟她聊，那个发单子很容易人家以为发广告么，我们要不送花吧。

闲：同志活动本身就有风险性，那就要选择一个活动方式。就是那个活动方式本身它是不违法的。像同志发传单，就是发别的传单在地铁里都可能被抓起来对吧？就是被禁止的。那这个就等于增加了活动的风险性。

追命：开始听说发传单我可反对了，后来听说发花我觉得还成。

白咏冰：好像有一个规定不可以在地铁里散发传单。那我们不如送花吧，石头提议的。特别的提议。

作为一次计划在公共场所做的同志活动，对于公共场所的选择和勘察必然成为筹办过程的重要环节。事后证明，这也是送花活动能够顺利进行的关键因素。

白咏冰：我说那我们在地面上做吧。我还和闲一道在五道口、西单勘察地形，看合不合适。当时本来很想在西单做，因为人流量很大，而且也很容易混入人群。但是去了之后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当时有卖花的人，警察直接就把花没收了。当时就想，哇塞，幸亏我们来看一看，不然这个事情会很糟糕。

发花的地点最后定在了建外Soho。建外Soho是北京著名的中心商务区，有众多的写字楼。人流量较大，但是因为附近没有大型购物区，人群聚集量小，所以警察不会十分严密地监控。2月13日，活动的前一天，发现玫瑰花价格太高，花的品种临时改成了200朵康乃馨。使用事先制作的同性婚姻传单包裹，从而达到了宣传支

持同性婚姻的最初目的。活动前夕，冰蓝通知了《新京报》的记者和一些国外媒体，希望通过这些媒体的报道，能够将这次“送花又不带刺”的活动的公众影响力扩大。

白咏冰：记者就跟着我们，还帮我们提花，就差帮我们发了。呵呵。当时就去了建外 Soho，在白领中午下班吃中午饭的时候就去发，很快就发完了，200 朵康乃馨。……当时老人、小孩都发了，还给环卫工人发，给保安发，给路过的白领发。活动很成功地举办完了，还采访了一些路人。

关于情人节送花活动的报道 2 月 15 日刊登在了《新京报》上。石头和明明当天所拍摄的片段则出现在了后来的纪录片《誌同志》中。从这之后，在 2 月 14 日做活动就成了北京拉拉社区乃至北京整个同志社区的惯例和传统。而白咏冰的计划也正是这样。

白咏冰：刚开始的时候我就想做成一个传统的，就是每年两会前都做，所以会给提案造势，我就希望的是，第一年在北京做，第二年就可以在更多的城市做，甚至在台北、香港做。



2007 年，《新京报》报道了送花活动

如果说情人节送花是在争取平等的结婚的权利，那么中国女同（双）性恋反家暴调查项目则是争取免于受到伤害的权利。

根据国外的社区发展经验，将女同性恋者运动与妇女运动相结合是前者发展的一种比较成功也比较典型的模式。所以在建立同语之后，闲一直致力于寻找与那些社区之外的妇女组织合作的机会，从而开发拉拉可以利用的更多渠道和资源。香港政府近年两次修订反家暴法案，香港同志组织从 2006 年开始积极行动和呼吁，终促使反家暴法案纳入同性伴侣关系保护¹³。受到这一启发，当 2007 年 3 月中国法学会反家暴网络小额资助项目开始招标时，闲认为这个可能是一个拉拉小组可以利用的机会，于是找到当时的同语核心志愿者 Eva、魏双双、白咏冰等人讨论这件事。

闲：我觉着立法时候讲（同志议题）比修订的时候容易一些。而且婚姻平等权我觉得不可能在近期获得，所以更重要的是提高拉拉的可见性。反家暴可能是这么一个点，来推动相关立法。

Eva：（访谈员：家暴的项目你是怎么想的？就是你怎么知道，你怎么开始想做的？）是闲开始主动联系我的，她说知道有这样一个资源，然后又结合我以前做《阴道独白》的经历（Eva 在复旦大学上学时曾导演话剧《阴道独白》，该剧的演出后来成为了复旦大学学生戏剧社团的传统）吧，然后问我，因为《阴道独白》也是反暴力的么，主要的信息就是反暴力。我觉得当时我的工作也是蛮可以的，挺闲的，行那就弄弄呗，试试呗。

7 月，中国女同（双）性恋反家暴项目被反家暴网络初审通过，并名列初审名单第一。同语的第一次反家暴项目讨论会也在此之后召开，讨论项目的调研部分和推广

13.2009 年修订时纳入。



拉拉反暴力发声

我们 需要 你！

你知道什么是“暴力”吗？你知道什么是针对妇女的暴力吗？你知道“暴力”并不单单指拳打脚踢，语言上的侮辱、精神上的控制和行动的控制也是暴力的一种吗？你是否曾遇到过身边的拉拉朋友遭受暴力却无处可诉呢？女朋友打女朋友的，家长限制同性恋女儿的行动、甚至虐待的，丈夫控制甚至虐待有同性恋倾向/行为的妻子的……其实我们身边都不乏暴力的受害者，或许你的女朋友就曾受过前女友的暴力、又或者你就受过家长的软禁、又或者你的一个好朋友正因为爱上一个女人而被丈夫要挟甚至虐待，甚至，你自己本身就因为社会歧视同志的压力而变得暴力。你有想过，这些情况是应该寻找帮助的吗？可是目前女同性恋和女双性恋社区都没有这样的支援机制、也没有数据支持。其实，对暴力的认识在中国并不普遍，异性恋家暴中受暴的妇女很多时候也是没有认识到暴力的本质和“家丑不得外扬”的观念而选择以忍隐的方式生活，在这样的前提下，对更为隐密的女同志社区来说，要正视暴力和说出暴力，就更为困难了。

女同（双）反家暴项目正式启动

北京同语女同社区工作组为正视女同社区的暴力问题，申请《女同（双）性恋者家庭暴力状况调查及反暴手册编写项目》（以下简称“女同反家暴项目”），项目得到中国法学会反家暴网络的资金支持，并在2007年11月11日召开了项目启动介绍和流会议，女同（双）反家暴项目正式启动。

2008年《les+》1月刊上发布的拉拉反家暴宣传信息

部分的具体操作。Eva成为项目总负责人，而具有社会学背景的罗名成为项目第一部分调研部分的负责人。11月中国女同（双）性恋反家暴项目通过了反家暴网络的最终审核，资金到位。但是通过初步的估算，这笔项目资金仅仅足够完成调查研究这一部分。于是后期的倡导推广部分只能暂时搁置。项目的预计运作时间是一年，但是后来整个项目于2009年7月才最终结束，延长了半年多。

Eva: 我觉得最大的困难分两方面，一方面是这个议题本身不好谈，就是我们都低估了家丑不

得外扬的这种中国传统的观念，所以其实这个议题你去找不认识的被访者，她不愿意谈这个事情，所以就是找被访者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困难，主要是因为议题本身；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团队完全是由志愿者组成，就是完全是志愿者，连管理的人都是志愿者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因为她没有，因为志愿者那个核心的意义，你没有办法去控制她，她完全是志愿者性质，然后可是就很难去，让大家按时按点，有质量地把事情给做出来，就是管理志愿者是特别费劲的。

罗名：首先就是发问卷的地方，像都是什么酒吧那些，其实都是去玩的人，让人家做一个关于家庭暴力的十几页的问卷。……一次回收二十份左右。我们发了大半年，我们整整地发了大半年的问卷呢，然后我看了一下 05 年做的健康调查跟人家几个月回收量差不多。之后就是找访谈，访谈呢确实比较难找，因为这是一个你必须是要有家暴经历的，而且是你愿意谈的人。它（题目）不是一个，比如说你的身份谁都可以谈，谁都有自己的身份认同的过程，或者是你其他的方面你的求学，或者是你的健康或者是你的恋爱史，这些你都能谈，家暴不是所有人都能谈，比较麻烦。

最终反家暴项目一共获得 419 份实地问卷（问卷主要在每周的拉拉沙龙、酒吧和社区活动中进行发放，其中有一半是由外地的拉拉小组在当地回收的）和 472 份网络问卷。调查发现大约有一半的拉拉遭受过来自父母或者同性伴侣或者异性伴侣的暴力伤害。访谈的几位家暴项目成员都表示这个比例超乎了他们的估计，远远高于其他所有的家庭暴力调查数据。这些数据和成果也引起了反家暴网络的极大关注。在与他们一年半的合作中，反家暴网络的相关成员不仅了解和认识到了女同性恋者的真实的存在情况，也意识到了同样作为女性的女同性恋者所遭受到的家庭暴力的严重程度以及帮助她们摆脱暴力阴影的迫切性。

2007 年我们看到了几个拉拉社区小组的发展，它们逐步地拓展开来与其他地方的拉拉社区、与社会公众、与不同领域开始互动。而另一块领域的拓展也发生在 2007 年，即同志在网络上公开上传和传播自己制作的视频节目。从等着别人来做关于自己的电视节目到自己制作和传播媒体节目，这无疑是一项重要的自我发声行动。

2007 年 5 月白咏冰向爱知行申请了 2 万左右资金来做一档叫做“同志沙发”的视频节目，由她负责编、导、



《中国女同（双）性恋者家庭暴力状况调查报告》最终被收录到了同语出版物《中国性少数群体家庭暴力研究报告》中

演。从 5 月到 11 月，白咏冰用这 2 万块钱一共制作并上传了数期节目。但是后来因为摄影师认为钱太少，不愿意再继续做。白咏冰也因为“实在是太累了”而停办了“同志沙发”。但是除了钱之外，白咏冰认为这类视频节目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上传到公共视频网站之后被删掉的问题。

白咏冰：我刚开始想在新浪做，上传，因为新浪的受众特别广，但是节目一传上去就被删了，一传上去，又被删了，很郁闷。后来就通过朋友跟新浪的编辑交涉，新浪的编辑说这是个人行为，就说可能是某个当班的编辑觉得，啊，居然传同性恋的节目？删了！没办法，我只好悄悄地在土豆上上传，没有做任何宣传，但也有很高的点击率。



同样面对这个问题的是《同志亦凡人》的导演小刚。《同志亦凡人》也是访谈类视频节目，从同志活动到同志文化的话题都涵盖在内，相比于《同志沙发》，《同志亦凡人》较为成功地“生存”了下来，并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而对于小刚来说，资金、节目话题都不是很大的问题，最曲折的还是视频上传到网站的问题。

小刚：我们现在有自己的网站，加上我们那时也放在优酷上，我们在优酷上的点击量也不错，但我们点击量最高的其实是在我乐（网站名），就我们能看到的数字，差不多（加起来）有1200多万。有一天我们搜了一下“同志亦凡人”，发现我们的视频被散播到很多地方，最有意思的有一次我搜到日本的、阿拉伯语的一些网站。你一看就知道那是阿拉伯语，但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我们最早放在新浪、我乐、土豆、六间房、优酷，都放。但是最后我们发现对我们比较好的是新浪和六间房，因为我认识他们，我跟他们说推一推我们的节目。以前有一次“我乐”几乎把我们所有

的节目都删了，我们那时在他们那的点击量已经很高了，他们把我们的所有节目都删了，也没有任何的解释，他们就说这个是“敏感节目”，低俗内容、敏感话题什么。没办法，所以之后我们就光在他们那传新闻，我发现传到他们那儿的新闻还是不错的，他们那新闻的点击量是非常高的，每一集点击量都在五万，这一条新闻就会被五万人看到，这对网络来说已经相当不错了。六间房也是因为我认识他们的一个管理层，但是最近都不太好，因为最近……以前土豆是最稳定的，虽然说他们的点击量是最低的，但他们最近一直在屏蔽我们的节目，而且把我们以前的节目也全屏蔽掉了。

从接收网络信息到创造网络资源，拉拉人群在虚拟世界中主动性的拓展会产生或者已经产生什么样的作用现在评价可能为时还早。我们能够肯定的是尽管仍处于压力之下，但拉拉的网络资源正在日渐丰富，包括广播节目、视频访谈节目以及独立电影。



魏建刚（中）

来源：微博 @ 同志亦凡人

四．2008 年之后

2008 年的核心词汇是转型，改革开放三十年、奥运会、金融危机、4 万亿财政投入、大雪灾、大地震……所有这些让我们看到的是全球的巨大变化和全中国的激烈转型。而在回顾 2008 年（包括这次口述史访谈采集到的一部分 2009 年的历史）北京拉拉社区历史的时候，转型又再一次地显著出现。这或许在时间上的巧合，或许有某种必然的相关性，但这需要的是专业性的探讨，目前本文还不能下结论。已经多元发展的拉拉社区的不同方面和不同小组其实在转型的问题上并不是协调统一的，它们的发生各有原因，所处的阶段也不完全相同。

2009 年，北京拉拉沙龙搬到了三元桥的 J 吧（“界吧”）。搬家的原因是沙龙和百万庄园的几次沟通总是不愉快，最终促使了安可下定决心又一次将沙龙搬家：“有几次也是这个餐厅（指百万庄园）的人还是不太合作，我就感觉特别不好，有几个人就撺掇我说，你还是搬过去吧怎么怎么样，那我说那就搬就搬吧”。

其实，在搬到三元桥之前，无论是在金芭蕉、乐杰士还是百万庄园餐厅，沙龙的位置都在朝阳门的丰联广场附近，换句话说，沙龙所处的地段其实一直没有变动过。但搬到三元桥这一次，对它来说却成了一个全新的起点。尽管在安可看来，这间新的酒吧“设施比较齐全”，有全套的投影设备以及台球等娱乐设施，采光上看“也比较明亮”、“空间比较独立”，同时酒吧“老板还比较合作”，但对于更多沙龙的老成员来说，全新的环境和服务却反而使他们感到的是陌生、紧张甚至不适。在他们看来，新沙龙不仅地段偏僻，乃至不少常年生活在北京的拉拉都找不到它的位置，而且这一偏僻的地理位置还使得不少参加沙龙的中年拉拉们感到“不安全”，因为出现在这个非大众的环境中成为了对自己身份的一种“强调”或者说“标识”，而不是像原来那样，出现在一个购物商场的快餐厅里显得那么“自然”或者说具有安全的身份隐蔽性。宝贝猫曾经告诉我们，她觉得以前沙龙的环境是比较开放的，在这种开放的环境里拉拉会感到安全，但新的环境却实际上是封闭的，感觉像是“躲在一个角落里”：

宝贝猫：我在一个商场里，一个咖啡座，逛街逛累了，（在这休息一下）我怎么不能啊，对不对？我到这边办事，我饿了进来吃顿饭，怎么不行啊？（环境）就会变得很宽松，不管是老的还是小的，到那个地方出现都很正常，这是一个除了胡锦涛，人人都会出现的地方……现在有很多三十五岁、四十岁以上的拉，她想出来活动，她跑那个地方去，找一个叫“界吧”的地方进去，如果被人看见，这事不好交代了。……反而她更有压力了，别人觉得她是刻意的去。

此外，除了环境的偏僻以及封闭性，与此前沙龙所在的乐杰士和百万庄园等大型连锁餐饮店不同，酒吧本身实际上是一个小本生意，这也导致了一些拉拉对于新沙龙在消费以及服务上的不满意。

宝贝猫：其实沙龙一直收费，但是到那（指搬到 J 吧）以后，为什么你会感觉到那种收费？——我曾经跟闲说过这个问题，我说为什么他要收这个最低消费这个标准，我说这个其实挺不好的。……可能也有另外一个原因，是服务质量的问题，因为在百万庄园和乐杰士，因为人家毕竟是连锁店吧，人家那服务质量还能够保障的，然后我觉得这个东西好吃，下回来我还点这个，甚至我来了，我得吃个那个对吧。可是他那个地方，三元桥那地方，他的服务质量很差，那的水什么玩意啊，他告诉我说那个最低消费，这让你觉得很不舒服，很不舒服那种感觉。

2009 年，作为沙龙主要主持人的宝贝猫暂时淡出了沙龙。关于宝贝猫离开的原因，客观原因是她告诉我们新沙龙距离自己的家太远了，来回很不方便，时间表也跟自己对不上，所以就不太去了；主观原因来讲，宝贝猫则是认为自己作了两三年的沙龙主持人，也“需要沉淀一下，长时间沙龙里讨论的话题大部分上都是这些，谈来



谈去你需要一个激情。你一开始服务帮她们解决，组织大家互相（帮助），如果一直都在帮助这些事情，她一波一波同样的人……有时候会觉得自己在重复……有一种没有效果的感觉，好像你帮助了一批人，然后这些人她们明白了，不再出现了，然后换成另外一拨人，然后这些人又带着同样的问题又来了”。

在这样一种周而复始的循环之中，宝贝猫发现，在拉拉社区里面存在心理问题的人可能确实相对较多，由此她也总结自己几年在沙龙的工作，认为这些年的志愿工作“简化完了就剩下一点了——我觉得我没有那么多想跟她们谈的话，我就想告诉她们，你得学会做人……最后就剩这一点了。我跟你讲一千道一万，代替不了你自己的行动”。在这样一种夹杂着些许疲惫与困惑的心情下，宝贝猫决定暂时告别沙龙一段时间，让已近中年的自己也能够休整一下。

沙龙地点的变化和主要人员的离开也促使沙龙的主要组织者安可有了更多的想法。安可觉得，从沙龙搬到三元桥这个新地点开始，“沙龙从环境、地点……从做的东西，从我个人对她的期望、要求，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现在她所期望的沙龙应该能够更多地做出一些“像样的话题”，让“来的人明显看到是什么，谈的是什么东西”，做出“一个现实的沙龙，能让更多的人知道，让更多的人看到。如果你就是大家坐在一起聊天，其实没有它的意义……因为你做的时候，你不仅仅局限于平台的，如果那样做的话，我可能没有什么兴趣，也没有兴趣再做——谁都可以建立这个平台，几个人搭这个架子，酒吧不是一样么？”所以安可希望沙龙在开办已近五年之后，能够更多地“做一些更深层意义上的、做一种改变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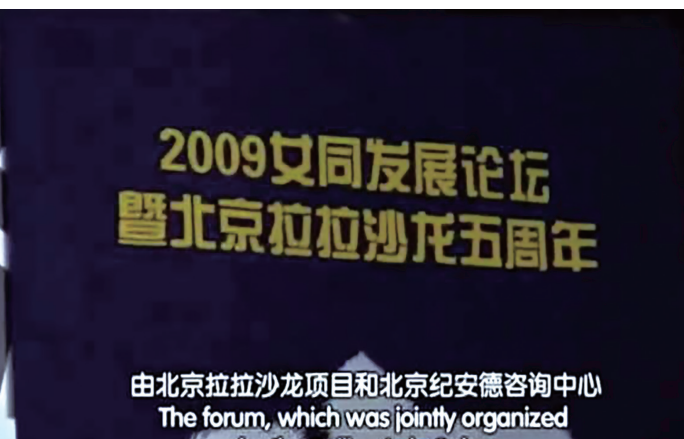
当然，无论个人还是组织，选择做出任何的改变，总都不是件简单顺利的事情。在安可看来，沙龙要想做一些“转型”，还是面临着几个主要问题的困扰。首先是在沙龙的目标定位方面。安可说，自己在最初做沙龙时，其实也希望沙龙能够有更好的记录、留下一些文字

性的东西，但她认为这首先依赖于好的组织者、策划人和主持人，“需要相应的一些真正能够有一些思想的人去参与这样的话题”；但同时，她又认识到，“有的时候，我只能说尽量去做，你想到的可能会应该是这样的，但是你不能拿这个东西去要求每一个人，只能说尽量能够做到就好了。如果做不到的话，那有时候也是没办法，做不到就做不到吧，你不能要求怎么样。但是我觉得，你真的是要做出一个像样东西来的话，有些东西是必须要的——可是这个你不能强求。”

其次是在资金方面。一方面，“同志这一块，NGO这一块，女同这一块，其实资金是很大的问题，很多时候没有钱，有些东西你也做不了，特别是你要做得更专业的时候，做更进一步的时候，那不是靠几个人支个架子就可以做起来的，就真的需要资金的支持”；但另一方面，安可认为自己目前的“路子还不是特别的宽”，另外申请资金这件事情，“其实蛮辛苦的，你要跟不同的人去沟通这件事情，找人来参与这个，找嘉宾、找人来参与这个，那这个耗费的时间和精力很大”，而只靠自己来做这件事情，显得有些不太现实。

安可：这点上我也很矛盾。矛盾在哪呢？就是说，如果做一个项目的话，你还没有，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人单独能够承担一个完整的项目的东西；那你去管人要钱的时候，这个东西……有钱有什么好处，你必须把这个东西做出来，所以的话，你就要掂量着不是什么钱都能要，不是有钱就是好的事情。

与资金相关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人员的管理问题，特别是沙龙志愿者的管理。对安可来说，由于长期以来自己都是利用全职工作以外的业余时间来做拉拉沙龙，因此她本人很难再抽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而对沙龙的志愿者来说，要做得更专业化以达到申请资金和进一步扩大服务范围等目标，那就显得更加困难了，因为这不仅与资金有关，实际上也与组织的制度设计等有关系。



2009 年，北京拉拉沙龙与纪安德合办的
“女同发展论坛暨北京拉拉沙龙五周年”



何小培（左）在“女同发展论坛”发言

安可：志愿者相对来说好找，但是志愿者她是需要对文化的一个很好的理解，她才能把这个东西做好。……还有一点就是你的钱，你没有那么多钱付给人家，专业的东西就要专业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在里面，那谁都在养家糊口，谁有那么多的时间来花那么大的精力和时间去为你做一个不挣钱的很专业的东西？……其实这个还是因为是草根的初级阶段么，它就是这样。然后还有最大的问题就是说，你要有专业的人来去做，做专业了，那么就不是靠个人的东西了，就是大家把这个组织的规模做的非常专业化之后，那你某个人不在，他不在就可以再换一个。……如果我们不专业的时候，那肯定就是靠某个人。那这个专业怎么做，那肯定是钱很重要……就是你真的让她全心的、全职的做一个事情，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她去一点一点感悟你这个企业、你这个组织的文化，然后在这个的基础上，她去做出一些东西。”

因此，由于沙龙面临着目标、资金和人员等几方面的困难，安可觉得自己目前更多的也还是在思考和权量的阶段。不过她仍然告诉我们她对于沙龙更远的期望，那就是沙龙能够发展成为更专业化的运作体系，这样即便她个人有一天不再参与沙龙的工作，北京拉拉沙龙仍然能够继续存在下去。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沙龙作为下午场聚会的功能就会随之减少，相反安可觉得这一点应该坚持下去。宝贝猫也在访谈中表达了类似的看法。

安可深知推动任何的改变都“是一步一步的”，而随着事情发展到不同的阶段，自己的一些目标和想法也会随之“重新设定”——“对于要做什么，会比以前明确、清晰，会想到‘我到底要做什么’。”而对于沙龙和她自己来说，2009 年与纪安德合办的“女同发展论坛”，就是沙龙向前迈出的重要一步。

访谈员：那像跟纪安德做这个论坛呢？算尝试么？



安可：跟纪安德的这次论坛是我想做的。最初他们想做一个培训，因为沙龙五周年么，我说我们是不是把一些小组的代表招过来，以这个书的发布为名，做一个五年的成果的发布会之类的。郭雅琦（纪安德的负责人）说，就找几个专家给她们讲讲课。后来我想，专家都讲什么呀，讲那些东西她们能听么，每次开会都讲，讲一些什么所谓的社会性别呀，多元平等啊，我觉得那些小组真的，真正理解这个，从社会性别角度看很多问题，去理解这个问题的人，真的太少了。这个东西你再让她，还讲这些东西，她也听够了，而且也没有什么多大的意义。后来我说，要不我们分几个议题，去做这样一个论坛吧。其实我觉得我想到发展论坛呢，这个想法也是基于一个沙龙——就是了解很多人的状态，她们的需要，就是从她们的生活层面；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做同志运动这一块，你一定要跟主流的文化结合在一块……如果你完全全去搬国外的东西的话，我觉得有的时候是不太相通的。

在女同发展论坛结束后，安可认为现在沙龙的目标除了要继续坚持做好下午场和一些更多元的社区活动（比如晚会、郊游等）之外，也要努力增加和其他小组的合作，并希望以后每年都能够做一次类似女同发展论坛这样的会议活动。

从 2008 年开始，同语的工作中心逐渐从拉拉社区抽离，转移到公众教育与社会倡导方面。一来这是闲对于同语本身的计划；二来拉拉社区内部已经出现了酒吧、沙龙、杂志、网站、活动等各个部分的活跃现象，社会倡导的工作有了社区基础，从动员社区内部，到促进社会大众对于拉拉和拉拉社区的接受，必然出现在议事日程中。回顾同语在 2008 年和 2009 年上半年参与和组织的活动可以发现有三个方向上的发展。第一，逐步退出北京拉拉社区活动的主要舞台，转型为合作者和支持者；第二，不断加强与社会大众和社区外组织的互动；第三，加强了北京拉拉社区与国内和国外同志运动的联系。

一方面，从 2008 年开始同语尝试逐步淡化拉拉社区活动主要组织者的角色。这比较典型地体现在了 2008 年，





2009 年 前门婚纱照



同语从北京拉拉沙龙中的逐渐淡出和在拉拉营活动中的角色转型。10 月份在五个城市的区域性拉拉营成功举办之后，参与主办的各组织开了一个跨地区的总结会。这一次的总结会诞生了华人拉拉联盟。

闲：所以就是类似拉拉营这样的活动将来都会由联盟来去推动，那联盟的主要的作用就是跨区域的女同志的连接，然后资源的分享，人事的交流，也就是同语和几个组织一直在做的，但现在我们等于是共同组成了一个新的组织。然后新的组织就选了一个委员会，然后会有一个秘书处，这个秘书处去年选的是上海的，这样同语也就可以退下来，我们可以做点别的，作为支持机构。

另一方面，同语开始更多参与公众教育、政策倡导以及与社会大众开展更多的互动。2008 年 2 月 14 日，同语的核心成员参与组织了四名男女同志到北京前门大街拍摄婚纱照的活动。这一次活动在国内外各大媒体上都得到了报道，包括中央电视台网站也转载了相关新闻，造成了极大的社会影响。2008 年 11 月 26 日至 28 日，《朋友通信》十周年庆典会议在北京召开，Eva 代表同语在会议上介绍了反家暴项目。2009 年 7 月反家

暴项目正式完成，成果包括调查报告、反家暴手册、社区内的拓展活动和社区外的宣传，报告和手册作为文字资料保存在反家暴网络的资料中心。反家暴网络的工作人员对中国女同（双）性恋反家暴项目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项目制作的手册成为了反家暴网络希望推广的范本。也许正是因为反家暴网络在这个过程中对于拉拉议题的关注与交流，2009 年由相关专家完成了中国第一份关于反对家庭暴力的年度报告，其中专家在对政府机构的立法建议中提出，建议将同性伴侣纳入反家暴保护法案中。2009 年 5 月 17 日，同语校园活动负责人 Karen 组织了 517 国际不再恐同日（IDAHO）自行车骑游活动，以自行车队的形式在北京几所高校宣传国际不再恐同日和同志相关议题，向学校学生、老师发放同性恋 ABC 常识介绍和国际不再恐同日主题卡片。

在这两方面的基础上，同语更加密切地与港澳以及国外的同志组织联系和交流。2008 年 1 月在泰国清迈举行了第三届国际男女性同性恋联合会（ILGA）亚洲区大会，中国第一次有多达 10 个同志组织参加了这类国际性少数会议。Eva 作为同语的代表被推举成为 ILGA 亚洲区委员会的委员。这不仅能够让亚洲其他地方的同志团体更好地了解北京拉拉社区和拉拉小组的发展，也能够促进北京拉拉社区在区域层面上与其他组织的沟通交流。



2011 年 5 月，同语志愿者在厦门闽台文化节宣传“国际不再恐同日”



“国际不再恐同日”卡片



ILGA（国际男女同性恋联合会）亚洲区

全球层面上的参与则体现在同语、爱白、爱知行等联合组织中国代表团参加了 2009 年在哥本哈根举行的世界同性恋运动会（Out Games）。除了北京拉拉走出去跟别人交流的形式之外，国外同志运动相关人士也有了更多的机会来到北京。2008 年 4 月，国际著名的独立电影艺术大师芭芭拉·汉默尔 (Barbara Hammer) 应邀访问北京；2008 年 5 月西好莱坞市长约翰·杜兰 (John Duran) 携其同性伴侣以及美国圣莫妮卡市 (Saint Monica) 的市长见证了北京同志中心的成立；10 月洛杉矶同志中心 (L.A. Gay Center) 主管访问北京，这次访问直接促成了中国同志社区活跃分子到洛杉矶同志中心实习的项目；2009 年 5 月，加拿大跨性别研究专家戴维尔教授 (Aaron H Devor) 访问北京，在沙龙和同志中心举行专题交流会。

但是在这一转型的过程中，同语也面临了很多的困难，尤其是在与社会公众互动的过程中，遭遇到了来自外界的压力和阻碍。

2009 年 6 月 13 日，筹备了一年左右的多元性别艺术展在宋庄即将开展的前一天，一个名叫宋庄艺术促进会的组织通知艺术展的相关人员，让他们取消艺术展。同语方面的组织者旋即与他们进行沟通。

宋庄艺术促进会（以下简称宋）：这个展览就不要在宋庄办了，因为跟我们这儿的大气候不太一致。你们那个涉及到比较边缘的问题吧，这个可能涉及到同性恋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所以我们就跟 XX（场地提供人）沟通，然后你们如果谁是组织者的话赶紧改变方案。



组织者：宋庄一直都是做艺术的，而且同性恋这个问题在中国这些年应该还好吧。前几天中国日报的英文版还报道说同性恋在中国能够更加被接受。

宋：不想给宋庄留下一个形象，留下了一个形象的话肯定对大多数艺术家不好。我们组织主要是从这个角度来考虑的。

组织者：哦，您是代表政府吗？

宋：我们就是一个民间组织，就是希望你们不要做了。

组织者：那我们是不是能够跟您进一步沟通呢？

宋：我们的大概意思就是这个活动就不要在宋庄办了。

组织者：您如果也是民间组织的话，恩……

宋：我没有硬性的权力。村里也有这样的意见，如果带来什么影响的话，肯定对我们整个园区不好。我们在网上看到的。宋庄的很多展览对于艺术的探讨都可以。但是很多涉及到性的，包括大型展览、公共展览，我们不愿意碰这种说不清楚的事情或者说还没有定论的事情。如果从政府角度，从整个艺术区给政府留下良好的印象上去考虑问题。我们只是从大方向的伦理道德没有大出格的。

组织者：但是我刚才跟您说连中国日报，官方的报纸……

宋：我们这儿是小地方，比较谨慎。没有出过特别负面的消息。我今天就是看完消息以后，也看到了几幅画。我们这个组织对这个的印象就是最好不要在这里办了。

组织者：您看到了全部的作品了吗？

宋：没有，还在布展，我只看到一些。然后说这里面还有行为，还有那个活体的表演。有吗？

组织者：没有，您听谁说的呀。

宋：（如果有）这个东西就会变得特别的敏感了。

组织者：没有，都是油画呀，静态的。我们不会弄特别奇怪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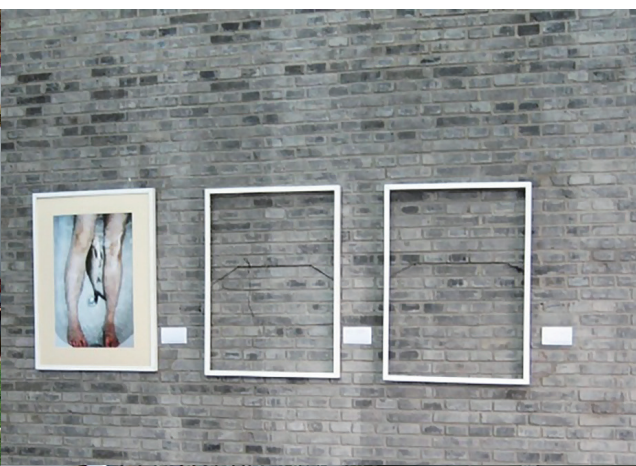
宋：我觉得这是你们肯定也是好几个人攒在一起，所以我觉得你们要沟通一下

组织者：我觉得首先要跟您沟通一下还是比较重要的。

宋：我们这儿结论已经出来了。

……

跟宋庄艺术促进会的沟通没有进一步的结果，由于对方一直声称不是代表政府、没有硬性权力，组织者还是决定艺术展照常举行。6月14日上午艺术展进入最后的布置阶段，警察突然进入展区叫停展览，并扬言要断水、断电、封路。策展人杨紫光和在场的艺术家及志愿者们与警察进行坚持不懈的沟通，后来双方各做出了让步。艺术展方面同意按照警察的要求撤下部分作品，确保了展览的如期举行。6月14日下午三点，“别·性”中国首届多元性别艺术展在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小堡村艺术园区平民电影工作室开展，参展艺术家包括石头、郑波、张一、杨霖、徐腾飞、西亚蝶、孙晓喻、任航、封零、唐子砚、高雅、谭逢、何金安、成涓子、宋嘉宁和《你们看我们看自己》展的全体艺术家。约500人参加了艺术展开幕，这也是宋庄所举行过的同类规模展览中开幕式来宾最多的一次。艺术展一共持续了一周，上千人次到场参观。



2009 年“别·性”艺术展



经过几年的发展，北京拉拉社区已经在多元的基础上出现了合作与联合。这些合作表现在议题的联合。2007年底，何小培、Eva和凌组成了粉色空间性文化发展中心，致力于推动广泛的女性受压迫者的普遍性权益。粉色空间的工作对象包括女性艾滋病毒感染者、女性性工作者、男同志的妻子（同妻）、女同女双性恋者、女变男变性者、残疾女性、单身母亲等等。2009年3月Eva和小黑合作成立了无界限小组，专门从事双性恋和跨性别人群的工作，将双性恋与跨性别人群的要求平权和反歧视的活动与拉拉人群的运动结合起来。这些合作也表现在了具体的活动层面，同语、爱白、爱知行、les+在几次大型活动中的合作已经体现了这一点。而更进一步的，这种组织间的合作在2008年落实到了物质空间上，也就是北京同志中心。

2008年2月14日，在爱知行的倡议下，爱白、爱知行、同语和les+联合组建了北京同志中心。中心租用了位于小马厂的一处办公间，长期向同志人群开放，并负责组织一些社区内的活动。中心所需资金由四个组织共同负担。2008年5月8日中心通过商业注册取得营业执照，在此之后承办组织了多项活动，也负责接待了来京访问的多位同运国际人士。但是好景不长，从2009年开始，中心便问题不断。最主要的也是最先出现的就是资金的问题。2008年中心向基金会提交了几份资金申请，但均未获批准。中心的资金方面出现困难。而当时筹备中心的几个组织对这一情况都不了解，直到2009年底同语接手中心的管理之后才发现，中心光是房租就拖欠了几个季度，其他开销更是带来了不少的负债。其次是中心的管理问题。根据闲和追命的讲述，爱知行当初在召集几个组织筹备中心的时候，并没有明确提出由谁具体负责中心什么方面的工作，从而造成了几个组织认为爱知行会负责中心的事务。到最后发现，虽然中心有两位全职工作人员和一个理事会，但中心实际上缺乏管理、也无人监督，到2009年底才发现中心在资金和管理方

面的巨大问题。于是同语在2009年底暂时接管了中心的整体工作，协调和组织几个组织将中心的现实问题解决，并为中心持续发展谋求新的道路。

相比之下，les+的转型则更多地体现在组织结构上。

从2008年开始，《les+》杂志改版为全彩的五十六开大小，从免费发行转变为义卖，从而使les+在国外基金会支持和社区自行募款（如义卖和举办筹款派对）的基础上取得了经济上的独立运转。《les+》杂志由一一接替闲负责发行，并在全中国征集发行代理点。到2008年底les+在全国一共有30多个代理点，一般为各地小组、拉拉酒吧、个人淘宝店以及拉拉QQ群。到2009年全国代理点增加到了45个，售卖的形式也逐渐多样化，通过淘宝网店、手机、QQ、MSN、邮箱等进行宣传、推广和销售。经过两年的努力，les+在北京拉拉社区里已经建立了比较强的号召力。如2008年年初，les+在画楼西畔酒吧举行了两周年派对，100人左右的场地当天晚上挤进了400多人。在晚会中，一套完整的《les+》杂志被拍卖到了几千元。在此基础上，les+参与甚至主办的活动也越来越多。

2008年年初，les+的gogo以“艺术展”为主题向同语申请的小额资助项目被批准。7月艺术展筹备小组在同志中心成立，主要成员包括gogo、杨紫光、大拿和石头等，开始具体筹划艺术展的各项事宜。2月14日，les+和爱知行、同语、爱白共同参与了支持同性婚姻提案的送花签名活动，这一次的活动除了街头送花之外，还征集了许多支持同性婚姻的签名。这些签名后来在同志中心进行了展览。3月3日，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发出《广电总局关于重申电影审查标准的通知》，将有关同性恋的电影情节列为应删减修改的内容。作为对这一政策的回应，同语和les+决定在北京举办拉拉独立影展，放映中国本土制作的拉拉电影。4月5日影展在

北京的画楼西畔酒吧开幕，两天的活动共六百多人参与。之后影展更是在上海、长沙、郑州、鞍山、成都等地巡回，并发展成为包括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多元议题的中国酷儿影像巡回展。一个2008年3月成立、致力于推动酷儿文化的新小组——中国酷儿独立影像小组，也加入成为巡展的主办方。2008年10月第二届拉拉营开营，这次拉拉营在五个城市（北京、上海、成都、昆明和鞍山）分别同时进行，而les+小组承办了北京的拉拉营。

由于杂志本身的不断发展和参与活动的增多，les+小组的负担越来越重，小组内部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分歧，核心成员sam和gogo之间的矛盾也不断增加。

sam：去年我跟gogo产生了比较大的分歧，我都快忘了这事，我不知道，我觉得也是一个我自己的成长。在07年到08年，往好一方面讲，就是一个年轻人在自己有冲动的时候，特别希望能够去拓展自己的能力，去实现创造成果，从那时来讲我觉得是一个，必然有一个内心的膨胀，这表现的就是，在表面能看到的，更多时候去领导，或者去听到都是我的声音。但其实创意人不是只有我一个，还有gogo，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必然会带来不平衡，所以当时，因为我这人后知后觉，所以我也没有想很多，因为我去拓展去了，然后但是我们半年都不沟通的，我们靠我们后面的人帮我们沟通，就我有什么想法告诉一一，一一告诉雪飞，雪飞告诉gogo，但是这种状态肯定不是很好

gogo：去年确实有一段时间就是每个人都特别累，我记得有一次我们，那是多少期的时候，我们一大群人一块吃饭的时候，突然就吃完饭sam就跟我说不想停几期不做，我当时特别特别生气，……我没有想过sam会放弃，我以为她永远不会放弃，我当时特别生气，我就走了。但是后来真的我发现sam说这话，不是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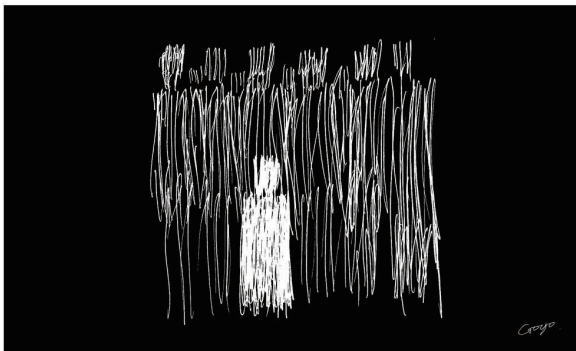
种小孩那种任性那样说的，其实每个人都特别累，每个人都面临很多疑问，很多思考，然后不停地拷问自己，不停摧残自己，而且你做这些未必有人看得到，你的那些痛苦思考别人未必知道，而且你的这种痛苦思考带给别人的意义也没那么大。有好长时间那样，我觉得还好，反正我给自己找到了一条出路，我不知道别人给没给自己找到出路。……我当时是一直觉得是我们两个沟通有问题，其实这话又说回来，说到《les+》背后的两个女人，其实《les+》从最开始都说是sam和我，我们两个做这个杂志。其实说句实在话，《les+》这本杂志背后的两个女人更重要，就是一一和雪飞，我跟sam在做这个杂志的时候有过喜与忧，到杂志第二年的时候，有过相当长的时间，我们俩在沟通上有特别大的问题，就是我知道这个原因大概的原因是因为我，我不太，我在沟通上确实是挺任性的一个人，然后而且从杂志的理念上可能两个人有一些争执，有时候挺长的一段时间我们之间的沟通就是要通过雪飞和一一去做工作。

这使我们不由得想起了2001年北京姐妹小组面临的似乎相似的困境，但是这一次的问题并没有导致les+小组的解散，而触发了小组的转型。2008年10月，拉拉营在北京开营，les+小组成员也为这次活动忙得焦头烂额。在这次拉拉营的活动中，来自台湾的资深社会活动家吴绍文听说了les+的困难，于是建议les+进行组织内部的重建，一方面从单一的组织结构中具体分出负责不同功能的部门来分担工作，另一方面建立一个委员会，以讨论投票的方式确定各项重大决策。拉拉营之后，les+小组采纳了吴绍文的建议，将以前单一的les+小组分为编辑、发行、财务、推广、广告这五个功能性部门，每个部门由一人负责。同时这五位负责人组成核心委员会，对les+的各项事务进行讨论决议。第一次核心委员会讨论决定由sam和大头轮流做杂志主编，减少了每期杂志主编的工作负担，同时《les+》从双月刊改为季刊。组织转型的效果是明显的。



les⁺

27
Jun. / 2012



les⁺

28
Oct. / 2012



les+ 转型后的季刊封面

sam: 这半年核心委员会是很有效的，她平衡了一个组织的一个领导力和，不管是发生还是什么好，至少更公平，然后各自都做了什么，或者各自应该做什么，各自都比较明确了，大家都很清楚自己的位置和分工，然后我们的决策都是共同来决策，还有一方面就是我和 gogo 我们两个人都在成长，每天都在调整和反省自己，所以不管是我们两个人的关系还是杂志遇到的分歧，我觉得到目前来说是解决了。

一一: 没有想到就真的是越来越好了。我觉得。因为很多事情就是组委会么，你必须先，不管任何事情我们都会现在习惯性地会发邮件，大家都知道，然后我们在邮件里进行讨论或者是 MSN 直接讨论，然后最后再做出一个决定。这样的话不管做什么决定都是大家的意见么，会有个投票的结果，就大家都很心平气和地去接受。就不像以前有什么事情就是，比方说其实我觉得之前很多的事就是 sam、gogo 她们俩就互相有时候就不发表意见了，就是我跟雪飞在那说来说去，后来我们定一个啥就那样了，就成这样了，因为她们俩就通常就是没意见，然后现在就好多了。

当然组织结构的变化对于组织内部关系的改变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从形式的改变到精神的培养，这其中必然有一个逐渐磨合的过程。大头就给我们讲了一个很有过程感的故事。

大头: 当时就是闲跟 sam 讲，有一个今年到洛杉矶同志中心去实习的机会，这个机会谁去，当时其实基本上也就是 sam 和 gogo，但问题是谁去，然后大家都开始讨论谁去，你知道大家都是很好的朋友，sam 和 gogo，一一和雪飞也是很好的朋友，在这种情况下谁去都不好意思讲想去，就这种私下里讨论的这种氛围，那当然谁都想去，一一就说你不要去了让

gogo 去吧，因为 gogo 也这段时间状态也不是很好，还是让 gogo 去吧。gogo 的女朋友雪飞就说让 sam 去吧，gogo 不要去了，就变成这样的讨论。首先是因为她们的关系的原因，然后其次是因为我们不习惯一种，就是好我们都想去，但是我们都讲不出来，然后我们大家来判断，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方式都没有。我当时就，那天早上醒来以后，就是一一给我发短信说：大头你快看信箱吧，就是因为这个重要的一个事，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办，有点乱了，你这样让下去其实就是，实际上是事情又决定不下来，大家心里还有点别扭。然后我一看我也有点，哎呀，有意思，然后我当时也是花了一上午的时间来写这封信在邮件组，我觉得这样当然也很好，就是说一一和雪飞其实都是举贤避亲么，这是中国传统上的一种方式，但是我认为，如果以我现在这种方式是不行的，我觉得程序我认为应该是这样的，谁想去，比如说 sam 和 gogo 想去，那还有没有别人想去，都讲出来你想去的理由是什么，这很正常，你想去就是一次机会，告诉大家你想去的原因是什么，你去可以做什么，为这个组织能带来些什么东西，两个都讲，讲完之后我们大家来判断，谁去对这个组织更有意义，然后我们来投票，但是我们都不带成见，你觉得，我觉得当然首先我觉得，这个事情在组织结构的时候，其实按照一般的结构来说，就是这样，一一和雪飞，sam 和 gogo 这种关系是应该稍微地处理一下的，但是在 les+ 没有办法，因为我们就是这样来建立起来的，我们就是一个朋友的一个团体，然后她们也在这个位置不可或缺，所以，但是我们自己的心态要摆正，我们不能在这个事情里面不能变成一个情侣的关系，我说你们要在私下里要稍微地注意一下这点，而且你们不能在公事上也表决，在私事上也去影响别人，就比如一一或雪飞，你们不能在私底下，要不你们就在公事里表态，要不你们就在私底下，你们不



可以这样，就是说既要在这个事情上表态，又要在私底下说：你不要去了，让 gogo 去；或你不要去，让 sam 去，你们不可以这样，然后我们是，我们已经是一个团队，我们是要为这个工作为这个组织，你就要想一下这个组织的未来，不能太多私人感情在里面。然后，对，就是，当时我还印象很深刻，gogo 其实一开始是，她，她觉得这些都没有用，干嘛要做这样的讨论。但这封信发出去之后，包括一一，当时还有蛋挞，现在蛋挞也是我们核心委员会，她是市场推广的主要的人，然后，大家都很坦诚，都觉得这样很好，应该这样做，然后之后那天晚上，gogo 给我发一条短信说，本来我觉得没意思，但是我回家以后把那邮件从头到尾看了一遍，



《欢忧塔》排练，导演萧薇（右）



《欢忧塔》舞台

我觉得特别感动，以后都要我们这样开诚布公的、不带偏见的讨论问题么。我觉得那次事情，确实让我有点，自己也很感动，最后大家都讲出来 sam 也讲 gogo 也讲，然后我们大家投票，讲我们为什么会觉得我们会选择谁，最后就是 sam，所以我感觉比较重要的一个人，一个事情我觉得对大家有改变。就当时我还之前见到何春蕤，台湾的一个女权运动和性权运动里一个特别重要的性别研究的一个学者，她当时就讲说：社会运动，什么是社会运动，社会运动不是提纲里，或者宣言，以及我们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这不是，运动的，它最重要的是主体发生的改变。

组织内部结构调整之后，成为季刊的《les+》杂志继续顺利出刊，并在 2009 年再一次扩大版面，每期印量增加到近 3000 册。而在具体分工落实之后，杂志本身的工作得到了拓展。例如负责推广的成员认为他们在推广方面一直没有自己的一个主体，到处在别人的网站或者渠道里发帖，所以需要有一个自己的主体性网站进行集中

推广。该建议得到了核心委员会的认可，2009 年 4 月 les+ 网站正式建立。不仅如此，les+ 参与以及主办了更多和更多样的活动。2009 年 2 月 14 日，les+ 参与了前门大街的同志拍婚纱照的活动，并对活动进行了跟踪报道。同年 6 月，les+ 利用她们在 19 个城市的代理店和 QQ 群，倡导并帮助当地社区在各地开展骄傲月（六月）的活动（例如在长沙的篮球赛，太原的百人签名以及在其他一些地方的放飞彩虹风筝的活动）。6 月 14 日，由 les+ 等北京同志小组联合主办的“别·性”中国首届多元性别艺术展在北京的宋庄开展。2009 年下半年，les+ 开始筹备中国第一部公演的本土拉拉话剧《欢忧塔》。

当然，作为一次尝试，les+ 在转型之后，成员还是感觉到有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例如有了好的框架之后如何去运作，相关的制度和规范还没有制订，监督机制还没有建立，等等。但是总的来说，就现在的情况来看，les+ 的组织结构调整是一次收到了一定效果的转型。7 年之前北京姐妹小组的解散并没有在 les+ 的身上重演。这也许是姐妹小组的经历教育了后来的拉拉社区“民主”的重要意义，也许是得益于 7 年以来更多的与其他地区的交流。但是正如托克维尔所说，民主的精神是需要培养的。不断变化的外部条件使北京拉拉社区与拉拉小组必然在某个阶段面临转型的问题，但是转型也是困难的。我们收集了这样一些关于转型的思考、努力、尝试与成果，以作为后来同志的前车之鉴。

回顾北京拉拉社区的历史，我们看到了令人振奋的不断壮大的社区力量，不断丰富和多元化的社区活动，积累了一定经验与工作成果的社区小组和社团组织，以及在迅速变化的社会环境和不断发展的社区形势下，性少数人群所拥有的更多机遇和发展空间。然而另一方面，挑战仍然存在。2009 年底，联合国大会通过伊拉克所提交的提案，决定将禁止性倾向歧视的条文从联合国公约中删除。中国政府对这一项提案投了赞成票。这里面可





能牵扯到了更多的政治利益，但是这也意味着中国性少数人群为自身的平等所进行的抗争还要继续，继续努力让中国政府在任何条件下都不会为了任何的政治性目的牺牲性少数人群的平等权益，继续努力让同性恋在中国不再是“说不清楚的问题”。米兰昆德拉曾说“人们抵抗权势的斗争乃是记忆抵抗遗忘的斗争”，从这个意义上讲，也希望我们对于北京拉拉人群和拉拉社区的记忆和记述能够成为一种抵抗遗忘、争取权益的尝试和努力。

北京 >

女同（双）性恋



社区、组织 与运动发展

作者：大拿



一．前言

本文以北京地区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女同志社群、组织与运动的发展为叙述脉络，其间，通过具体的事件与时间点来反思社会运动研究中所提出的各个影响因素在北京地区女同组织发展与运动中所发挥的实际作用，从而拼接出北京地区女同组织与女同运动发展的大致轮廓；同时，结合中国近二十年的



时代变迁、社会思潮特别是政治环境的微妙变化，为目前大陆女同组织与女同运动不同于传统欧美同运发展路线的历史与现状提供一定的参考；除此之外，也会提出一些目前北京地区女同组织与运动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希望可以引发学界的关注与对以上内容的更深入讨论。



二．女同运动萌芽的政治机会

1997年，中国政府颁布了修改之后的新刑法。在这部刑法中，流氓罪被取消。李银河等人认为这是同性恋在中国“非罪化”的标志。因为在1979年的刑法当中，尽管没有专门针对同性恋行为的条款，但在实际的执法过程中，即使是互相同意的成年人之间的同性性行为也会被认定为“其它流氓活动”，从而定罪量刑。例如，1960年代据说有担任公职的女同志因“犯流氓罪”而被撤职并劳改。

参考欧洲同志人权法制化的进程，是由同性性行为除罪化开始，接着是制定法律禁止性倾向歧视，进而才承认同志伴侣的法律关系。然而，所不同的是，中国这一新刑法的颁布并非是自下而上发起的社会运动所带来的，因此也无法将这一事件作为中国同志人权进入到了反歧视与争取合法伴侣关系阶段的标志。新刑法的颁布所带来的直接影响是：中国同志这一群体与其权益，从此被放置在了一个没有明确的准与不准的灰色地带，当然这里会包含着无限的可能性与机会，但同时也存在着未知的危险与“禁区”。北京的女同运动正是在这段时间前后开始萌芽的。

1. 借力东风：中国妇女运动国际化

1995年由中国承办的世界妇女大会使社会性别概念得以涌入中国，在《北京宣言》中，政府承诺：“作为政府，我们特此通过和承诺执行以下《行动纲领》，确保在我们所有的政策和方案中体现性别观点。”而与此伴生而来的，是世界各地的NGO力量，关注这一议题的海外基金会以及大量的研究者和活动家。这些来自外部的力量，为中国女同社区的初步形成提供了信息、人力甚至资金上的支持，更重要的是安全上的保障。如在94—98年间，一位英国的女双性恋者就通过在其私人住宅中召集以女性主义为议题的聚会，促成了北京地区女同之间联络网（称为“圈子”）的初步形成。

近几年，中国内部的妇女运动力量也开始与女同组织接触：2007年3月，中国法学会反家暴网络发出项目征集，为未来的中国大陆反家暴法案提供研究性资料，且表示他们的服务对象是所有女性。同年7月，由北京女同组织同语提交的中国女同（双）性恋反家暴项目通过了反家暴网络的最终审核。2009年7月，反家暴项目正式完成，成果包括调查报告、反家暴手册、社区内的教育活动和社区外的拓展，报告和手册作为文字数据保存在反家暴网络资料中心。特别是，反家暴网络在这个过程中通过与女同社区与女同团体的交流，增进了对于女同（双）性恋议题的了解，因此在其随后完成的中国第一份关于中国家庭暴力的专家报告里，对政府机构提出了将同性伴侣纳入反家暴保护法案的立法建议。

2. 柳暗花明：政府对待同志团体的态度

2001年5月，当时在北京非常活跃的女同组织北京姐妹小组筹划在北京举办女同志文化节，结果，在开幕的当天就因政府的干涉而被迫叫停。警察不仅封锁了现场，对在场人员进行了身份核查，还带走了主要组织者进行问话。政府对于此次行为的解释集中在非法集会上，并未涉及到同性恋问题。在随后的较长时间，此次活动的几位组织者都感受到来自警方的监控，可以说，这一次打击直接影响了当时的北京女同社区发展。然而，仅仅时隔八年，首届中国多元性别艺术展便得以在北京宋庄举行。尽管在这次展览筹备的过程中，仍然遭遇了来自官方的压力，但其干预的方式与态度却容许相关的同志组织可以争取到商榷的空间，最终，在双方部分妥协的基础上，使得这次展览如期开幕，当天共500人参加，成为宋庄举行过的最大规模的展览开幕式，随后艺术展又持续了一个星期，有上千人次到场参观。

政府的这种暧昧态度不仅使得较公开的同志活动的举办成为可能，也为同志群体提供了一定的与政府政策对话的空间：2008年3月3日，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





局发出《广电总局关于重申电影审查标准的通知》，将有关同性恋的电影情节列为应删减修改的内容。作为对这一政策的回应，3月22日，北京女同组织同语、女同杂志les+以及后来参与进来的中国酷儿独立影像小组决定举办中国酷儿影像展，放映以酷儿为题材的中国本土的独立电影。4月5日中国酷儿影像展在北京画楼西畔酒吧开展，5、6日两天的影展活动共六百多人参与。之后便在上海、长沙、郑州、鞍山、成都开始巡回影展，并在影展的过程中义卖展出中的部分电影作品与印有“我们要看同性恋电影”的T恤。

3. 前人栽树：公民社会运动的契机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非政府组织迅速发展，并在这一过程中与政府形成了一种相对稳定的关系：在泾渭分明、不越雷池的基础上，非政府组织承担着一部分政府无法顾及的职责，从某种程度上补充着政府的服务。在此基础上，政府亦愿意为这一类的非政府组织提供一定的生存空间，甚至与其合作，并在不断的试探与角力中对不同组织的发展空间进行调整。生存空间的存在以及发展的可能性，都为女同组织的出现与制度化提供了一定的契机，同时也为女同组织提供了大量与政府博弈的宝贵经验。如北京同志中心¹⁴成立之初，其部分资金和资源便来自北京一家重要的艾滋病非政府组织，而在北京同志中心的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在对危机事件的处理上，都从该组织获得了不少宝贵的意见。

另一方面，中国公民社会运动的兴起，以及较为成功的非政府组织的案例，也为女同组织的自身建设提供了可参考的模式。北京地区的女同杂志《les+》，在2008年曾经因为几位核心成员的个人问题面临着一次停刊的危机，然而委员会机制与决策机制的引入，使得其由原来自发形成的草根组织，平稳过渡成了一个有着明确框架与成员分工的社会团体，基本上适时地化解了这一危机。而近两年，北京地区的其它女同组织，如同

语、北京拉拉沙龙与北京同志中心，也都开始了对组织架构进行调整的尝试。

4. 春冰虎尾：地下身份所带来的问题

近几年，外部环境的改善与政府态度的微妙变化，使得北京地区的拉拉社区与拉拉组织迅速发展。然而，由于政府对同志人群的灰色处理，同志组织的合法性无法得到法律的认可。不能民政注册登记，便会带来一系列问题。首先是由于缺乏有效的制度监督，运作模式很难按照正规的机构来执行；再者，资金的管理无法依照NGO的模式，募款渠道受到限制，而2010年颁布的外汇管理新规定使得商业注册的团体同样面临资金接收的困境；此外，未注册的团体难以雇佣全职的工作人员，因此带来志愿者工作压力大，活动的持续性与稳定性无法保障等问题；即使有些组织有全职工作人员，但其缺乏有效的法律保障与法律约束，从而成为组织安全与稳定的巨大隐患。如，成立于1998年的北京姐妹小组，在2001年组织的女同性恋文化节遭到强行关闭之后，小组核心成员纷纷离开而最终解散，在随后的几年时间里，北京地区的女同社区陷入沉寂；又如，由北京多个组织在2008年联合成立的北京同志中心，在经历了一年左右的繁盛时期后，开始暴露了由于内部管理制度的缺陷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并在资金募集方面出现了严重的困难。

14. 原名“北京同志文化活动中心”，2009年10月启动新名称“北京同志中心”。

三．北京女同社团的动员结构

2004年,美国的“华人性/别研究中心”(Institute For Tongzhi Studies)试图资助一部分中国大陆的男女同志前往香港参加当年的华人同志交流大会¹⁵,但却发现连找到几个大陆的女同志都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然而,时至今日,仅在北京地区活跃的女同组织就有2004年成立的北京拉拉沙龙,2005年成立的北京同语,2005年创刊的北京女同杂志《les+》,以及同时面向LGBT社群的于2008年成立的北京同志中心等。因此,本节希望可以简要介绍2004-2009年间,北京地区女同组织“从无到有”的萌芽过程与“从有到优”的成长过程。

1. 暗流涌动：互联网发展所带来的变革

在一个97年刚刚实现同志去罪化的大文化圈里,同志人群仍然处在看不见的灰色地带,这种看不见,不仅仅是指主流文化对于同志人群的态度,也包括同志人群对自己性身份的态度。互联网的出现与逐渐普及,使得中国的潜在同志人群得以出现在社区生活的视野里,对北京地区女同社区与女同运动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相对于之前北京姐妹小组所使用的电话与信件的联系方式,网络的虚拟性为同志提供了相对安全的保障,同时其快捷性也有利于信息的迅速传播。一方面,国内的女同志可以通过浏览大陆以外的同志网站或者BBS来获得相关的信息,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大陆外的女同社区与大陆内的女同个体开始建立联系,为日后大陆的女同运动储备了资源;另一方面,大陆地区的网络拉拉社区开始兴起:1998年麻雀在大陆建立了第一个拉拉网站——拉拉生活广场。1999年在大陆的“碧海银沙”

(网站名)有了第一个拉拉聊天室。2000年4月一路同行论坛在大陆最大的综合性论坛天涯社区建立,这个以同志话题为主的公共论坛迅速成为大陆同志网民最大的聚集地之一。而2000年以后,随着互联网的不断普

及,一大批的拉拉网站出现,例如深秋小屋、花开的地方、阿拉岛等等。到2002年,拉拉网站达到了30多家,网上的活动也逐步发展出了线下的聚会与活动,有讨论会,也有到郊外的旅游活动。在这一过程中,女同运动者也开始通过网络建立联系。举一个例子,“花开的地方”的站长是后来上海女同小组女爱的创立人,2004年通过这一网站,她认识了当时在北京打算做拉拉小组的一位活跃分子,并向其引荐了同在北京的“花开的地方”的一位版主,后来正是这两人在北京共同参与创立了同语。

2. 草长莺飞：日益成熟的社区与社区文化

网络的虚拟社区由在线转到线下,是自发性的社区活动的开端,而另一方面,自2004年,一度沉寂的女同组织又再次萌芽,开始参与到社区生活中,通过社区活动与社区文化建设促进个人对自我身份认同,进而对同志社区与同志运动产生认同。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成立于2004年底的北京拉拉沙龙。北京拉拉沙龙通过门票分成的方式承包了一个商业场所每周六的下午时间,用来举行与女同相关议题的讨论。沙龙讨论的议题涉及女性主义,同志文化以及同志身份认同,情感支持以及社会家庭压力的应对等多个方面。在过去六年间,一方面,沙龙提供了一个具有强烈个体关怀的帮助女同个体解决自身认同问题的平台,使社区受益;另一方面,这些个体又通过与女同群体或女同社区的互动,与组织和社区建立了紧密的联系,从而被不同程度地卷入到女同社区甚至女同运动中。许多目前活跃在北京地区、甚至全国各地的女同运动者与组织者,均是在北京拉拉沙龙开始了她们与整个女同社区与女同运动的联系。

在北京地区女同社区的发展过程中,社区文化建设一方面不断强化着社区活动的成果,巩固并影响着女同群体对自身与对社区与运动的认同;另一方面又不断拓展着女同社区的外延,使女同社区逐渐走向公共视野。

15. 一个由同志运动积极分子建立的、期望从学术途径切入和关注大陆同性恋运动和大陆同志与性别研究的组织。



2005 年 12 月 17 日，女同杂志《les+》创刊，这是继北京姐妹小组的《天空》之后，又一本专门面向大陆女同的实体杂志，杂志最开始是一张双色的折页，然而发展到 2009 年，已经成为一本 16 开的彩色杂志。2009 年 4 月，les+ 网站正式建立。截至 2009 年，les+ 的代理店已经遍布全国，她们更是利用这些分布在全国各地的网络，倡导并帮助当地社区在各地开展六月同志骄傲月的活动（例如在长沙的篮球赛，太原的百人签名以及在其它一些地方的放飞彩虹风筝的活动）。在此基础上，les+ 又开始开拓面向主流文化的文化传播：2009 年 6 月 14 日，由 les+ 等北京同志组织主办的“别·性”中国首届多元性别艺术展在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小堡村艺术园区平民电影工作室开展。2009 年下半年，les+ 小组开始筹备话剧《欢忧塔》，并于 2010 年初在公共剧场成功上演，成为第一部在中国公演的本土拉拉话剧。

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并被推举成为 ILGA 亚洲分部区域委员会的委员；2008 年 10 月洛杉矶同志中心（L.A. Gay & Lesbian Center）主管访问北京，这次访问直接促成了中国同志社区活跃分子到洛杉矶同志中心实习的项目；2009 年，北京的几个同志组织发起组建中国代表团参加了在哥本哈根举行的世界同性恋运动会（Out Games）。

3. 他山之石：区域连结对北京女同运动的促动

1995 年在北京召开的世界妇女大会和 1998 年由香港、台湾的同志运动者协助大陆同志在北京召开的同志大会，促成了北京地区第一代女同组织的产生。近些年，北京地区的女同组织，更是积极参与并推动着不同区域间的合作。这种交流不仅促进了不同地区社区的共同成长，也为北京地区的女同运动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视野与更为丰富的可能性。

如 2007 年 7 月，在北京地区的同语积极推动下，由大陆，香港，台湾和北美四地的拉拉组织联合筹备，在珠海举办了一次面向拉拉社区内部的，包括拉拉组织与活跃分子在内的，以跨区域交流为主题的培训营，即拉拉营；随后，这一模式被保持下来，并在第二年的拉拉营后成立了由来自港、台、大陆与北美的华人拉拉共同组成的华人拉拉联盟，致力于跨区域的合作；2008 年 1 月在泰国清迈举行了第三届 ILGA（国际男女性恋联合会）亚洲区大会，Eva 作为同语的

四．女同组织与女同运动的话语策略

在中国传统的社会文化环境里，对女同群体的误解与刻板印象长期存在，同性恋更是被划入精神疾病的范畴。直到 2001 年 4 月，在《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中才不再将同性恋统划为病态。因此，如何走出这一隐形化的处境，在主流话语中发出同志的声音，使公众建立对女同群体的健康认识，从而改善女同社区与女同运动的外部环境，这是女同组织必须要处理的问题。

1. 暗渡陈仓：与政府的博弈

自同性性行为去罪化以后，政府对同志议题的态度一直乍暖乍寒。2004 至 2005 年间，中央电视台制作并播出了 3 期有关同性恋议题的节目：《央视论坛·同性恋：回避不如正视》（2004 年底）、《新闻会客厅·我了解的中国男同性恋》（2005 年 3 月）和《新闻调查·以生命的名义》（2005 年 8 月）。在随后的一年中，各地方电视台（天津卫视、广东卫视、南方电视台、四川电视台和南京电视台），包括凤凰卫视，一共制作和播出了 7 期与同志议题相关的电视节目。此外，这段时间有关同性恋的报导与文章更是见诸于众多主流纸媒。同志议题在主流媒体上的破冰，被当时的同志运动者解读为政府的一种放宽政策。然而，发展道路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多种因素相互较量。例如，2005 年 4 月在北京大学举办第二次同性恋电影节的大胆尝试，在放映半天后便被官方叫停。

因此，在这种政府态度不甚明朗的环境下，北京地区的女同组织主要通过其它较温和的方式引起媒体关注，与政府实现间接对话。如 2005 年两会期间，李银河第三次委托人大代表向人大提交同性婚姻提案，这一提案在当时引起了广泛的讨论与关注。为了响应这一提案，为同性婚姻造势，从而引起社会公众，特别是政府的关注，北京的几个女同积极分子，于 2007 年发起，在每年的情人节在北京闹市区向路人发放包有宣传同性婚姻

传单的玫瑰花，并通过国内与海外媒体，将这一事件的影响传播开去。而为了保持媒体对此活动的热情与关注，这一活动形式不断推陈出新，发展到 2009 年，这一活动已经被演绎成由两对同志男女在北京重要的商业区之一——前门拍摄婚纱照并向路人派发玫瑰。此事随后引起了国内外多家重要媒体的关注，China Daily 更是在头版以此事为切入点，专门撰文深度报道了中国的同志社区现状。

2. 穿壁引光：与主流媒体的合作

尽管同志文化建设也具有公众教育与社会倡导的作用，但其影响仍主要集中在同志社区内部；然而，公众媒体却可以深入到最广泛的社会维度。在过去几年，一些女同个人通过媒体走进了公众的视野，客观记录女同生活、反映女同情感的电影作品相继出现，关注女同议题且视角温和的电视节目在主流媒体播出：2000 年中国第一部女同电影《今年夏天》问世，并获得多个国际奖项；2000 年 8 月，石头成为中国大陆第一个在电视上公开出柜的女同志，作为大陆的嘉宾代表参加了凤凰卫视“一点两岸三地谈”节目；2001 年 12 月 20 日，中国内地颇具影响力的湖南卫视《实话实说》节目推出“走近同性恋”专题，邀请李银河、崔子恩、石头等人就同性恋问题展开讨论；2002 年，凤凰卫视共制作并



五．结语

播放了两期有关同性恋的节目，分别为《名人面对面》和《冷暖人生·同志爱人》；2006年，乔乔成为第一位公开出柜的女艺人……

3. 短兵相接：公共教育与社会倡导

在过去的几年间，北京地区的女同组织，开始主动地走入公众的视野，通过与公众和社会的直接对话，来对自我形象进行诠释，向主流社会所塑造的关于女同志个体与社区的刻板印象提出挑战。2005年暑假，北京的女同组织同语与同志组织爱白举办了一届面向全国大学生的同志夏令营，以普及同性恋知识与创造对同性恋友好的校园环境为目的，参与者的身份不限于同志，此后，这一夏令营成为传统；也是在这一年，这两个组织合作，开始深入到北京多个大学的校园中进行同志知识讲座；2006年，在les+倡议下，北京各同志组织在创意集市上租用摊位，用来发放宣传资料和展卖带有彩虹标志的创意产品；2007年，网络视频节目《同志沙发》和《同志亦凡人》开始播出，活动内容主要是访谈，涉及话题涵盖了同志社区的各个角落；近两年，同语还开展了多项反歧视的公开行动，如在每年的5月17日——国际不再恐同日，举办彩虹自行车骑游活动，在北京几所高校和闹市街头宣传国际不再恐同日和同志相关议题的信息。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仅是在同语口述史项目的基础上，对于北京地区拉拉社区与拉拉运动的简单梳理与呈现，因此有很多案例未能提及或者深入介绍，很多影响因素未能涉及，如女性经济地位的提高，城市化的人口流动所带来的婚姻压力的相对减轻等。但由于篇幅有限，故暂止于此，希望学术界会在未来关注本项目的后续成果，并能促成学术界对此的进一步讨论。

感谢接受本研究访谈的朋友们

(排名不分先后)：

安可 宝贝猫 Clear 大拿 大头 Eva gogo 灰烬 Karen

凌 罗名 乔乔 sam 石头 闲 小白 小黑 何小培 雪飞

—— Kim 殷莉 追命 想起 Ana

感谢参与本研究的同语工作人员及志愿者

(排名不分先后)：

大拿 范范 鸽子 金凤 腾静茹 Karen 柯晓 罗名 马姐

楠楠 小汐 小左 小亚 徐玢 追命 宫宇 小燕 王晴峰

典典 大头 (特邀) 小燕 (特邀)

致谢



